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邓小平经济谋略

 **eBOOK**
内容资料 非商业

邓小平 经济谋略

发展生产，巩固敌后根据地

43年前，抗日战争的烽火还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

持久的战争需要经济作后盾。

五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降临晋冀鲁豫根据地。

邓小平感慨地说：“敌后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率领下，根据地军民团结奋战，掀起了生产自救的热潮。

1986年10月的一天。北京中南海邓小平办公室。

身着藏青色中山服的邓小平倚在办公桌旁的圈椅上陷入沉思，左手食指和中指夹着的那枝香烟已燃掉了一半，案前铺开的稿纸上，一行行苍劲有力的毛笔字墨迹未干，跃然于纸上：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

时光倒推到43年前……

那是抗日烽火在中华大地上正熊熊燃烧的1943年。

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关键的一年，也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走出困境、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关键的一年。

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经过1942年以来的斗争，根据地严重退缩的局面已大有改观，但由于敌人连续不断地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面临空前的困难。

除了敌人的破坏，从1942年到1943年又发生了5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晋冀鲁豫一些地区的农业收成只达常年的二三成，有的村庄甚至颗粒无收。全区需要救济的灾民约达160万。

1943年夏秋，发生了规模空前的蝗虫灾害。这次毁灭性的灾害波及了大半个边区。飞蝗来时，一落地就是几座山，几道沟。黑压压的蝗虫，铺天盖地涌来，使太行地区46%的地区受灾严重。受灾面积达3000平方公里，受害庄稼60万亩，其中被吃得颗粒无收的就有27万亩！

这年八九月间，又遭暴雨。太行浊漳河和清漳河两岸冲走了大量滩地，冀南、冀鲁豫的卫河、运河、滏河等河流多处决口，不少县区一片汪洋，淹没村庄三四千个。

这一年邓小平39岁，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共太行分局会议，专门研究太行区的经济建设问题。

邓小平在分析了当时形势后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他提出了克服当前财政经济困难和救灾的办法：一是发展生产，二是精兵简政，三是厉行节约。

在太行山上，刘伯承、邓小平号召晋冀鲁豫边区各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邓小平亲自作了动员报告。他提出：“去冬今春，太行区的旱灾面积占根据地的五分之一，而敌占区流入的灾民还有很大数目。这是几年来最困难的关头。……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

要靠生产救灾！

刘、邓一声令下，全区立即施行。在太行，在太岳，在冀鲁豫，在冀南，

在整个晋冀鲁豫大地上，掀起了生产自救的热潮。

在救灾中，边区政府除了尽最大的能力向灾民发放救济粮款外，还帮助农民逐户制定生产自救计划，有效地克服了他们的迷信观念和悲观失望，调动起人定胜天、战胜困难的积极性，还在有条件的地区帮助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

邓小平亲自抓生产，还亲自带头参加生产劳动。

1943年8月初，久旱之后下了一场雨，邓小平指示边区机关学校全体动员，帮助群众补种改种，并亲自组织和指导机关工作人员帮助群众抢收。

在邓小平的办公室里，支起了一台土造的手工纺线车。他亲自动手，带头学纺线。他的夫人卓琳和其他女同志也都下地种粮，在家纺线，还用纺出的线为部队编织线衣。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带头作用下，仅太行区，各部队于1943年即种地10万亩，其中开垦荒地8万多亩，总收入达1500万元以上。而且自制的香烟自给有余，布匹、毛巾等自产物品还可往外运销。

从1942年以来，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共进行了三次大的精兵简政运动。

邓小平告诫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天灾人祸，生活困难。但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该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打败日本侵略者。

邓小平就精兵简政作出了三条规定：一，调整编制紧缩机关，减少人员马匹，充实战斗连队，并规定了比例；二，调一批相当有才能的本地干部，到地方武委会去，加强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三，安置老弱战士、荣誉军人从事学艺生产，半工半读。

他还带领一个极其精干的小组，到武安、沙河一带的大行军区第六分区具体指导精简工作。

由于邓小平政委身先士卒，从而带动和促进了其他领导，尤其是机关。他们组织机关人员分头下到军分区、旅，进行深入动员。由于刘邓的重视和亲自抓紧，精简工作顺利完成，部队加强了战斗力，基层领导工作的力量得到了充实，机关提高了效率；同时，节约了人力和财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太行山和整个晋冀鲁豫边区，在发展生产、精兵简政的同时，还厉行节约。部队的小米供应，主力部队由一斤半减到一斤，机关人员由一斤减到十三两（旧制十六两为一斤）。从战士到师级干部，每人每月只发一元五到五元的津贴费。办公费、菜金一律停发。由各单位从生产中自行解决。粮食不够吃，以野菜充饥。刘邓二人以身作则，一样节约用粮。

当时整个的部队和干部，都处于半饥饿状态，但是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1943年秋天，太行山满山遍野的成熟了的柿子挂在枝头，红彤彤的，实在诱人，但八路军的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采摘。

入冬了，部队好不容易才筹措到土布和棉花，由于来不及集中缝制冬装，就把土布、棉花发给各单位，动员大家自做自穿。没有染料，就找草木灰和树根染色；不会剪裁，就请老百姓帮忙。一双双拿惯了枪支的大手，此时却拿起了针线……

刘伯承、邓小平也和大家一样，穿的是深一片浅一片的灰土布棉衣。有

一回，供给处的同志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套细灰布的棉衣，被刘邓坚决退回，还被斥责道：这不是对我们的爱护，是要我们脱离群众。

刘邓和大家穿得一样，吃得一样；干部和战士穿得一样，吃得一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军民，心能不齐，劲儿能不往一处使吗？

在刘、邓的领导下，我八路军和根据地的人民发展了生产，战胜了灾害，并在反“扫荡”斗争中努力保卫夏收和秋收，保证了征粮任务的胜利完成。

1943年7月2日，邓小平在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总结道：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在敌人伪摧残之下，人民创伤极其深重，”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入侵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太行区就在这样的警惕下，加强了对于经济战线的注意。”

用严格的税制保证根据地的经济

太行山，一道坚强的民族抗战的脊梁，在华北傲然挺立。

将军能理财否？邓小平不仅会打仗，也会管理经济。

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照顾了群众的负担能力，又照顾了抗战的需要。

“打击伪钞，保护法币”、“对外管理和对内自由”原则。

四年中，“刘邓大军”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却坚持对敌作战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太行山，由北向南，绵延七百多公里，巍峨矗立在华北大地之上。在它的西面，是山西那山岳纵横的高原山地；在它的东面，是河北、河南那一望无际的广袤而丰饶的华北大平原。

在这里，由于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创立、保卫和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籍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减轻了大后方正面作战的负担，使太行山像一道坚强的民族抗战的脊梁，在华北地区傲然挺立。

1943年7月，邓小平说：以八路军这样羸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

那么，创造这个奇迹的秘诀在哪里？

邓小平的回答是：秘诀在于，我们不仅成功地进行了军事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经济战线斗争的胜利。他说：“我们的经验是：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订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

而上述经验中，其中一条成功的做法，就是“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

在太行区抗日根据地，邓小平参与制定的税收贸易政策包括下述一些内容：

第一，实行统一累进税的办法；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

1943年4月，边区临时参议会颁布了《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统一累进税这种税制，把农村同时征收的几种资产税和收入税统一在一种税中，税率按纳税富力分等累进。实行的是“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这种税制，

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扩大了税负的负担面，使负担人数达到总人数的80%。同时，又颁布了“存粮存款不负担”等法令，以奖励发展生产。统一累进税实行后，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调动了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奠定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基础，既照顾了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了抗战的需要。

第二，与实行统一累进税相联系，在税收贸易的管理体制上，把税收和贸易两个部门置于工商管理局的单一领导之下。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

为了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并使对敌斗争容易得到胜利，邓小平制定的税收贸易政策，是采取“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所谓“对外管理”，就是对根据地以外的地区的贸易采取管理的办法。如：禁绝一切奢侈品，限制非必需品的输入，同时组织根据地非必需品和多余物品（如药材、草帽等）的输出，以换取外来的物资；组织群众性的缉私工作，给缉私者以较高的奖励，严惩舞弊营私，等等。所谓“对内自由”，就是在根据地内部实行“贸易自由”的政策，以繁荣市场，保障人民的需要；同时，对于商人的投机行为，则利用公营商店和合作社的力量，加以压抑。

由于在税收贸易上实行了“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地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太行、太岳等地区的物价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保持稳定，而且大大低于其他地区的物价水平。尤其在 1943 年发生严重灾荒的情况下，根据地政府采取的粮食调剂和棉布交易的政策措施对克服困难起了极大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实行这种办法的结果，大大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增加了税收，繁荣了市场，保障了人民的需要。”

第三，实行“打击伪钞，保护法市”的货币政策，使之成为发展生产和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

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全国金融，禁止银元流通、从 1935 年 11 月 4 日起，实行法市政策，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简称“法币”。

抗日战争中，在日寇控制的敌占区，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中国人民的物资和财产，在货币政策上采取大量发行伪钞来兑换法市的办法，以通过掌握法币来大量掠夺中国人民的物资和财产。

为了挫败日寇的阴谋，晋冀豫边区政府采取了“打击伪钞，保护法市”的货币政策。其具体办法是：由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冀南钞票（简称冀钞），作为根据地的法定货币。冀钞于 1939 年 10 月开始在冀南、太行地区发行，以后又在整个华北地区流通，对于保障和促进华北地区生产、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保障冀钞的信用，边区政府要求冀南银行限制冀钞的发行额，因而使冀钞在相当长时期内保证了巩固的信用（直到 1948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人民币，冀钞才停止发行和流通）。由于冀钞的信用是巩固的，边区政府银行把冀钞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因而赢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并给了伪钞以相当的打击。所以邓小平高兴地说，冀钞“实行的结果，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市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以有力的保障。”

由于刘伯承、邓小平正确地领导了敌后军事战线和经济战线的斗争，并有效地抓住了对敌展开经济斗争和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这两个敌后经济战线“不能分离的环节”，因而使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到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已控制了 80 多座城市，拥有 2400 万人口，军队发展到 30 余万人。“刘邓大军”已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

孙中山说：以农为经，以商为纬。

历代封建王朝的开明君主，无不以“扶助农耕”为其治国之基。

邓小平 28 岁当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提出独具一格的治县方略：抓春耕，促革命。

“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

49 年后，78 岁的总设计师对一位外国客人说，要“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都好办了”。

中国是一个农耕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在中国的历史上，早就流传着“民以食为天”的说法……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历代统治者，稍微开明一点的，都无不懂得“以农为本”的治国方略对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重要性。

远的不说，就说近代以来——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就提出过“以农为经，以商为纬”的治国方略。

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提出过“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

邓小平与前两位伟人相比毫不逊色。早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统率千军万马与敌寇作生死搏斗的邓小平，在忙于军机要务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根据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在总结太行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时说，“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

邓小平说这话的时候，时年 37 岁。

历史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点……

那是 1931 年 8 月，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派往以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正值红军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形势尖锐复杂。

不久，邓小平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围剿”被粉碎后，瑞金召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群众表现了很高的热情。邓小平担任一年多的瑞金县委书记以来，成绩卓著。1932 年冬季，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找邓小平谈话。一方面，他们都是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同学，相互都比较了解；另一方面，也由于邓小平在瑞金任县委书记时已经表现出杰出的才华，因而李富春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会（昌）寻（县）安（远）中心县委书记，领导这三个县的工作。

会昌、寻县、安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缘地区，赤白对立很厉害，红军力量较薄弱，每县只有一个独立营，赤卫军的枪支也很少，再加上“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也很困难。这些情况，对苏区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

当时邓小平年仅 28 岁。他从瑞金到会昌后，一切从零开始。他以小学生的态度，不耻下问，调查研究，彻底摸清三个县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经过深入周密的调查研究后，邓小平认为会、寻、安的工作之所以搞不上去，主要是“左”得太厉害，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认

真学习马列主义、正确对待实际存在的问题，才能明辨是非，把革命推向深入。在他的带动下，军分区和中心县委机关学习马列主义蔚然成风。他还经常抽时间给大家讲解，分析，使大家的认识得到提高。

邓小平为了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还领导三县人民办了很多夜校、列宁小学、扫盲班、读报小组等。他不但组织好教员，还亲自去夜校讲课。他在这里工作半年多来，就办起了几百所学校、几千个扫盲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邓小平重点抓了农业生产。他分别主持召开会、寻、安三县的党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策。各县又在后来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再次提出了要加强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各级区、乡苏维埃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根据邓小平的布置，1933年春，会、寻、安三县都成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各村成立了生产突击队，还成立了妇女劳动委员会。这样，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春耕生产高潮便在各县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邓小平不仅领导农业生产，而且还身体力行，经常参加劳动。他亲自犁田、耘禾、耙田、施肥，最艰苦的时候还以人代牛，拉动犁铧。县委书记的举动，鼓舞了三县人民。会昌、寻邬、安远三县所有机关干部在邓小平的带动和号召下。每周星期六下午都参加了义务劳动。会昌中心县委机关除留下伙夫一人看守外，不管刮风下雨，不论烈日当空，一到星期六邓小平都会带领大家去参加劳动。他们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甚至连儿童团的孩子们也跟着学习，主动到烈军属家帮助干活。为此，邓小平还专门写下一首儿歌：

共产儿童团，
实行礼拜六，
做好半天工，
帮助烈军属。

邓小平还专门指示县儿童团书记刘凤祥请人谱曲，负责教会儿童团员演唱。不久，这首儿歌便不胫而走，在会、寻、安三县唱开了。

由于邓小平和会、寻、安三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正确领导，以及广大群众的艰苦努力，三县的粮食产量都大幅度上升，仅会昌县的粮食总产量就比上一年增产二成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革命的积极性也就日益高涨。同时，也因为地方武装在邓小平的具体领导下顺利地开展了剿匪工作，消灭了残存在这个地区的地主武装，红色政权也稳定下来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也更加顺利了。

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在邓小平领导下取得的成绩，引起了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注意。1933年毛泽东一行人到会昌检查工作时，看到这里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不禁诗兴大发，填下《清平乐·会昌》一词。词云：“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也许从那时起，邓小平就从会、寻、安三县工作的成功经验中，悟出了“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的道理。

因此，当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太行山上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短兵相接、艰苦卓绝的抗斗争时，邓小平始终没有忘记粮食生产、农业生产对于坚持抗战，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性。

他在 1943 年 7 月 2 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中对 6 年来的敌后经济战线的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总结道：

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战时粮食普遍缺乏。我们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

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

农业生产是贯穿于全年而又富于季节性的事情，严格说来，无所谓农闲时间。……我们在春耕、秋耕、夏收、秋收的时候，都做了巨大的工作。我们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正因为我们注意了生产的组织和领导，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获得了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的胜利。

39 年后，78 岁高龄的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都好办了。”

如果我们联系到 28 岁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抓农业的经历，联系到 37 岁的一二九师政委亲自抓根据地农业生产的经历，来理解 78 岁高龄的邓小平所说的上面一段话，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段话中所包含的深厚的历史底蕴！

搞不好工商业，解放区经济无法建设

中原形势取决于两座山，一座是大别山、一座是伏牛山。大别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控制大别山。

千里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挥师南下，逐鹿中原。

拿着钱买不到东西，有东西卖不出去，几十万大军怎么维持？

邓小平说：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搞垮了工商业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

邓小平说：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伏牛山，一个是大别山。大别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

刘邓大军挥师南下，逐鹿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邓小平说：搞垮了工商业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

大别山是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它靠近长江，东西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

大别山，那连绵巍峨的崇山峻岭，那郁郁葱葱的山林野莽，既可以成为据守生存的良好天然要塞，也可以成为吞噬军事劲旅的虎口险地。

1947年，刘邓大军从太行山挺进大别山，黄河到长江南进一千里，一下子把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的中原地区。由此，国共两党逐鹿中原之战揭开了序幕。

次年4月，当时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分析形势说：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

要知道，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并且能够在大别山站稳脚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仅在红军时期，共产党的军队就曾先后三次在大别山建立了根据地，又先后三次撤出过那一地区……

对于刘邓大军来说，要想在大别山上站稳脚跟的特殊困难在于：第一，这里与太行山不同，山高路窄，地形复杂。我军从北方到南方，由平原到山地，饮食不习惯，言语不相通，地形不熟悉，穿不惯草鞋。如之常常夜间行军，使部队极不适应。第二，这个地区过去虽然曾经是红军的革命根据地，但红军走后，国民党对当地群众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使当地群众不敢同我军接触。刘邓大军到大别山后，反动势力威胁群众，断我军粮，绝我生存之路，使我部队吃不上饭，找不到向导，常常陷于饥饿、疲劳、迷途之中。第三，我军面临二十三个旅的敌人重兵，连续作战，已极度疲劳，产生了一些畏难情绪。

邓小平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我们逐鹿中原，四面都是敌人！”

当时，刘邓大军远离后方，整天背着几十万敌军在这里转，弹药、粮食、被服得不到补充，战士们不服水土，很多人生病闹疟疾，伤病员得不到很好的治疗，群众基础、物资供给都远不如解放区……

1947年10月的大别山，秋犹未过，但早晚已是寒气袭人，由于刘邓大军远离后方，供应不及，指战员们穿的还是夏天的单衫单裤……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集结大别山北麓的七个整编师的兵力，对我

军进行合围……

战事险，军情急。但在大别山的斗争，又岂止军事斗争！

当时邓小平面临的任務，除了指挥部队作战外，还有复杂的经济斗争。

那还是在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个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共产党的各解放区中开展起来了。

鄂豫皖解放区也不例外，区内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的土改运动。但是，大别山与别的解放区是不同的。在这里，敌情严重复杂，群众疑虑甚多，加之共产党曾三次从这里撤走，如果这次再走，老百姓能承受得了吗？在土改中，一些地区的干部又犯了严重的“左”倾急性病，在政策和策略上发生了失误。这些作法，非但不利于发动群众，反而脱离了群众，甚至侵犯了群众的利益。

邓小平及时地觉察了这些问题。

他说，“‘左’的倾向，表现在土改中划阶级‘左’，把地主富农同样对待，侵犯中农，对中农采取拒绝态度；新区工作中犯急性病，打击面宽，工商业政策‘左’……现在如果不克服‘左’的倾向，就不能把上改搞好，也不能把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好。”

他指出，“新区和华北不同，华北有大批的公营合作社，有将近十年积蓄的力量，六年以上的经验，新区则没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逐渐组织好自己的经济，在群众运动中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不准停业，如群众分了的，要赶快组织恢复生产……组织经济不是一天的事，要不断检查税收标准和工商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人民生活上面。”

他针对“左”倾急性病提出的“不让资本家剥削”的口号批驳道：说不让资本家剥削，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帐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但是一个商号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计。我大军在中原，几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不注意工商业，根本不能维持。在新区，不管哪方面的工作，如果不知道利用私人工商业政策，就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

邓小平还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政策有失误，就会导致革命的失败。

他举例说，如果对工商业的过“左”的错误政策不加以纠正，就会困难重重，有钱买不到东西，有东西（如大别山的木头）出不了口。把油坊搞掉了就买不到油。大别山的锅厂，以及与锅厂有联系的煤窑、小摊贩等，能养活三万人，锅厂一停工，这三万人就立刻无法生活了。像鲁山街上这个小市场，如果倒闭了，起码有一万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伸手要饭吃。我们这个区有三万人靠种植烟草生活，如果纸烟厂垮了，不能出口，这三万人马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

邓小平在例举了大量的事实后反问道：上述种种作法，如果不加以制止和纠正，这究竟是打倒了资本家，还是打倒了老百姓？我看这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

他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所以要解决好工商业政策问题。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他总结道：不要多树敌，应该中立的中立，应该麻痹的麻痹，凡是今天不反对我们的，对我们都有利。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的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

由于邓小平及时地纠正了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左”的作法，保护了包括工商业在内的大别山的经济发展，同时在军事上又成功地击败了蒋介石对根据地的合围，因而使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1948年初，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在搞建设这个向题上。我们还是小学生

1949年，45岁的邓小平第一次到北京。这是他政治生涯的新起点。

7年后，年轻的邓小平当上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全国挂7个人的像；其中一个就是他。

战火熄，江山立，刀剑能否铸犁？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是一个热情多于理智的岁月。

他说：搞建设并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

公元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健步登上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7年后，邓小平进入中国党政最高领导层。他说：搞建设并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

1949年，中国那具有五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一年，邓小平在其45年的生涯中，第一次来到北京。

他第一次到北京，就参加了新中国的两大盛事。

一个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

各界各阶层人士的杰出代表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胜利喜悦的气氛中欢聚一堂。人人脸上挂着喜庆的笑容，个个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万般憧憬的激情。

在会上，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会后，为祭奠在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无数先烈，毛泽东率领全体代表，挥锹撒土，庄严肃穆地为将要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了奠基礼。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这些开国元勋们并肩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注视着广场上那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在阳光下冉冉上升，倾听着《义勇军进行曲》那雄壮有力的乐曲的鸣奏，俯看着广场上三十万欢呼雀跃的人民群众和威武雄壮的游行队伍。在他们心中，领略的，是一派胜利的豪情壮志；感受的，是对未来新的国家、新的事业充满信心的渴望和追求。

……

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邓小平整整45岁。

45年，近半个世纪的时光。

当年那个满脸稚气、年方16岁的邓希贤，从他走出四川广安县的那一刻起，便迈向他漫长的人生旅途。他由一个有爱国心的青年，走进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殿堂。他出洋求学，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回到祖国。他参加了大革命的浪潮，经历了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他走上了战场，和军阀势力，和

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队，整整打了二十年的仗。

在他 45 岁的时候，他的名字——邓小平，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历史，和我党我军建党、建军的历史，和整个中国人民的革命史紧紧相连，密不可分。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邓小平和其他的开国元勋们，在战争年代，为开辟中华民族的新纪元，立下了汗马功劳和不朽功勋。邓小平，作为他个人来说，也由一名青年革命者，成长为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家，成为独挡一面的战场指挥官。

新中国建立了，仗打完了；在邓小平面前摆着的，是搞建设这一新的历史任务。

45 岁，成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

1949 年 11 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为“封疆”大员而坐镇西南。

1952 年，邓小平奉中央调遣，到北京工作，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后又先后兼任过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

1954 年，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 年，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从此，邓小平进入了中国党政最高领导集体。

作为总书记，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成为毛泽东主席的重要助手。

作为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他根据工作分工，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左膀右臂。

正是在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以后不久，他在 1957 年 4 月在西安干部会上明确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

他说：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

邓小平清醒地预见到：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

他提醒大家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

后来的事态发展，不幸被邓小平言中。

1958 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

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三年内超英赶美！”

“亩产万斤放卫星！”

……

在掀起一阵又一阵喧嚣的口号热浪之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句妇孺皆知的四川谚语，表达了邓小平经济谋略的真谛。

在“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时期，邓小平提出“猫论”，开始对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探索。

毛泽东对此不满意：“他这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总是黑猫白猫的”。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的理解是：他是为了使中国在2000年达到技术合理化，准备采纳不管哪里来的技术、办法、发明创造和意见。

1959年至1961年，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工业生产陷于半瘫痪状态。农业歉收。从1959年起，全国粮、棉、油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到1961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1000亿斤，农用役畜甚至低于1949年。1960年城乡人均粮食消费量比1957年减少了19.4%。全民族营养不良浮肿病流行，死亡率上升到新中国建国后前所未有的高度……

导致中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何在？

刘少奇一语中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三分天灾”，指的是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

“七分人祸”，则要从毛泽东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判反冒进说起。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泄了气不得了！”

“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1956年6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

这是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面对九省二市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嘻笑怒骂，激烈地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会上，周恩来、陈云等人因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受到了指责，召来了诸如“右倾”、“促退”等帽子。刘少奇曾指示中宣部起草了毛泽东“不看”的那篇社论，也遭到了批评。

会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5至10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要求在5至8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提出苦战三年使大部分面貌基本上改观的口号。

“大跃进”的号角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吹响。

在一片“层层加码，步步提高，指标修改又修改，突破再突破”的热浪中，一股以高指标、浮夸风为标志的飓风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刮起来了。

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扩大会议。“钢铁元帅”正式升帐。

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实有的开采、冶炼、运输能力所不可能达

到的指标。

“以钢为纲”，为 1070 万吨钢而奋斗！全国 9000 万人一齐上阵，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把“大跃进”推向了新的高潮。原料不足，就砸铁碎铁，甚至连犁头、锄头也投入土高炉；燃料不足，就砍树毁林，千山万岭，扫荡一空；材料不足，就扒民房，拆砖瓦。上层上马，大炼钢铁，群众运动。全国城乡炼铁炉星罗棋布，漫山遍野，炉火日夜不熄……

全国处于一片热昏的海洋中。

生产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更大规模的公有制形式过渡。

8 月，毛泽东视察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一些办了“人民公社”的农村，发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

8 月下旬，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践，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当时风行的口号是：“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竞赛开始了。

全国农村一哄而起。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到 1958 年底，全国 74 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 2.6 万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户的 99% 以上参加了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体制。所有制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分配是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实行平均分配，土地、物资和劳动力无偿调用，生产上实行“大兵团作战”，瞎指挥成风。

人民公社化运动刮起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造成对生产力的大破坏，结果导致了中国农村的大饥荒。而“大跃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 1200 亿元以上！

这就是刘少奇所说的“七分人祸”。

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正式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试图对 1958 年以来煽起的“左”倾冒进狂热有所反拨。

3 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一条例规定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大队，并允许社员有 5% 的自留地。

农业六十条颁布后，一些农村在实际执行中进一步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一级；有些农村开始实行“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要求放松对农业生产的控制。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解了粮食饥荒。

然而，“包产到户”很快受到毛泽东的批判。他认为，包产到户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的修正主义”。

在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广大农民群众遭受饥荒之苦的非常时期，邓小平出于对党和人民负责的考虑，果敢地站出来讲话了！

邓小平积极支持农民群众创造的包产到户形式，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粮食问题，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怎样才能恢复农业生产？

1962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他说：“恢复农业，群众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此道理，意见是好的。……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白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

五天之后，他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提出：农业要恢复，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政策。一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多搞点粮食，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二是工业支援农业。

怎样才能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邓小平认为：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就是要“从体制上来解决”，“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

他主张，应当让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都“合法起来”，只要能恢复农业生产，就应该给以承认和支持。“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他还借用一句四川谚语说明自己的观点：“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的这番话，向全体在场的团中央委员，也向全国的党员、人民群众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以后，邓小平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引导中国摆脱困境、谋求发展的思路：

摆脱困境、谋求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方面和环节。改革生产关系所持的基本态度应当是，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就采用哪种生产形式；哪种生产形式为群众所乐意接受，就采用哪种生产形式。并且要使这种生产形式在理论上、制度上合理合法起来。

当我们立足于当今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来重温邓小平 34 年前的这番讲话时，我们不难看出：二、三十年后，邓小平用以指导中国改革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思路，在这番讲话中已初露端倪。

正如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其所著《天下风云一报人》中所评述的那样：

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他的意思是：为了使中国在 2000 年达到技术合理化，准妥采纳不管哪里来的技术、办法、发明创造和意见。如果这样做要放弃毛的蓝蚂蚁式的公社而代之以个人耕作和个人利益的办法——好，那就这样做吧。我在循着长征路线深入中国内地的过程中，看到了效果：兴旺的市场城镇，而后春笋般新盖的私人房屋，密如柳枝的电视天线，涂红嘴唇的姑娘匆匆来往于稻田之间运谷子，5000 年来，农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钱。如今的口号是：“让农民富起来——让中国强起来”、“致富光荣”。

我是中国第二号：“走资派”

磨难和痛苦是成就事业的必修课。

毛泽东对一位来访的外国首脑说：我的接班人，一是刘少奇，二是邓小平。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接班人成了全国第一、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9年的“一号命令”。被隔离两年多的邓小平被押送江西……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但邓小平当时思考得最多的是：

这场灾难为什么会发生？该怎样结束它呢？

1987年4月30日。

宽敞的会客厅内，宾主在坦率的气氛中交谈。客人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主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邓小平语调平缓、慢条斯理地谈到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一九六二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

那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被打倒……

日历翻回到1969年10月23日。

那天清晨，一辆载着邓小平、卓琳夫妇和卓的继母夏培根三人的汽车，从中南海向首都机场风驰电掣般地疾驶，没有任何人送行，子女一个也不在身边……

邓小平胸中翻动着汹涌的波涛，但看上去仍然沉着、镇静、坚毅。

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就同刘少奇一起，被认为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而受到猛烈批判。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66年期间邓小平在党中央总书记任上的工作，从《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到《工业七十条》，到为在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运动中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干部甄别平反，到支持包产到户、主张“白猫黑猫”，到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都遭到猛烈的批判，被指责为“翻案风”、“单干风”、“修正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现在，1969年10月23日清晨，邓小平在被隔离了两年以后，在林彪发布的1969年“一号命令”的威逼下，正在被押送往江西……

汽车在急速地向机场奔驰着。印入邓小平眼帘的，是一张张“打倒”、“火烧”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叫刘邓永世不得翻身的巨幅标语。可悲可叹，在这凄凉的离别时分，送行的不是亲人友人，而是这铺满京城的大标语……仿佛整个北京、整个中国都被这无边的标语糊满了。

飞机起飞了。

升空，一声声引擎的轰鸣，把邓小平从漩涡的中心牵向激流和浪潮。他坐在靠窗口的座位上，双目炯炯，看着北京远去。他心里有好多话要说，但碍于两个护送他们去江西的解放军军官坐在不远的位置上，不便开口。

卓琳同继母夏培根两人坐在一起絮絮细语。她们心中最不放心的是老二胖胖。去年五月，正在北大物理系读书的邓朴方，被“乱世狂女”聂元梓操纵的红卫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脊椎骨严重折裂。幸有一位工人师傅在逆境中挺身而出，伸出了救死扶伤之手，把昏迷中的邓朴方送进了医院。年仅24岁的邓朴方便开始了残疾人的生活。卓琳一想起病卧在301医院的儿子，大小便失禁无人照看，生活无着落，心如刀割，愁泪涟涟。此番匆匆离京，连告别一声都不可能。老大邓林在大学毕业后还未分配工作，不知是否仍在被迫没完没了地交待父亲的所谓“罪行”。邓楠、邓榕、邓质方也受父亲株连，尚未成年便被下放到边远的安徽、陕西、山西农村，连信也没法写一封。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恨啊！

邓小平此刻似乎没有陷入撩人的儿女情长之中，他稳如泰山般地闭目沉思，在考虑着比儿女情长更大、更多的事情。他在考虑，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起什么作用，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破坏力如此之大的运动？他不理解，他这个“文革”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当年曾指挥过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下江南的党的前委书记，为什么会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究竟犯了什么样的“路线错误”？……个人的灾难，家庭的变故，人民的不幸，国家的动乱，一桩桩，一件件，不停地在邓小平脑海中翻腾。一个国家不搞经济建设，使整个国家如风雨之舟岌岌可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飞机在南昌市郊的向塘机场着陆。

三天后，邓小平三人被安置住进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步兵学校原校长的一座两层红砖的小楼，被警卫人员严密看守着。不久，邓小平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半天劳动，当钳工，直接与工人接触。下午，则到自家院内的菜园里耕作。黄昏时，绕着院子散步。晚上，每每读书至深夜。

1971年，经邓小平夫妇申请，他们的高位截瘫的儿子邓朴方来到了父母身边，邓小平的生活中又增加了照顾病人，为儿子擦澡、翻身等内容。

邓小平这一去江西就是三年。在这三年中，他过着同中国下层老百姓一样的最普通的生活。被“文化大革命”打下去的邓小平作为旁观者，目睹了这段“文化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做法，使他更真实、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灾难。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曾经谈到：“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使邓小平感到最痛苦的，当然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也不仅是当时大多数干部被打倒所遭到的不幸。显然，使他深感痛苦的，是中国人民的灾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痛苦使人思索。邓小平这时不能不痛苦地思考这一切错在哪里，错误从何而来，错误怎样才能得到纠正？对“文化大革命”他不能分担责任，因为他已经不在负责的领导岗位上。但是，他也不能不痛苦地思考“文化大革命”前他应该分担责任的党中央的工作，哪些是搞得好的，哪些是搞得不好的，那时候的哪些错误成为导致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因。——邓小平后来多次与人谈过（例如他在1986年9月2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就谈过），“文化大革命”那件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虽然说的是七十年代末的情况，但是可以想见，“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西劳动的邓小平，不能不开始了这方面的深刻思考。

1971年，发生了林彪叛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自我爆炸后，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立即进行了传达。邓小平和卓琳以普通职工的身份同工人们一起听了厂领导的传达。邓小平端端正正地坐在全厂一百多个职工中间，身板挺直，两手摆在大腿上，两眼平视，一动不动，与会场活跃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直到文件传达结束，回到修理车间，邓小平一直静静地听着工人们的讨论，没讲一句话。

尽管邓小平在听传达时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的心中已经掀起了巨澜。林彪是少数利用“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阴谋家、野心家之一，对这种趁火打劫之徒；邓小平是极端愤恨的。他们为了达到自己向上爬的目的，不惜把国家搞乱，把军队搞垮，把党的优秀干部往死里整。林彪的自我灭亡，是邓小平心中早已希望的，正如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父亲听说林彪自我爆炸后说道：‘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可见邓小平对林彪的深恶痛绝。

为了庆祝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邓小平全家十分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克，一直玩到深夜。

1971年11月和1972年8月3日，邓小平两次写信给毛主席，表示愿意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1972年8月4日，邓小平给毛主席的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主席。

从此，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开始有了新的转机。

各方面都要整顿

1973年4月的一个夜晚，邓小平戏剧性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

邓小平复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成了“国务院副总理”。与国内报道的低调相反，海外舆论对此事大加渲染。

毛泽东终于发话了：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各方面都要整顿！”他返回舞台的第一句话，道出了的中国人民的心声。

历经磨难的中国见到了复兴的希望。

1973年4月的一天。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正在这里举行……

席间，当毛泽东主席的侄女王海蓉领着昔日那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径直走向座位时，所有的来宾都吃惊得目瞪口呆……

就在这次宴会上，邓小平被宣布为国务院副总理。

匈牙利著名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回忆说：在这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独自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引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思索，也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

“文革”中被林彪迫害的陈毅元帅，在终于看到了林彪的灭顶之灾后不久，于1972年1月6日愤然离开了人世。1月10日，为陈毅元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在接见陈毅的夫人张茜时，不仅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而且表示，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并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同时，利用毛泽东讲的话，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偏差。从此，在周恩来力主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努力下，一些中央领导干部又纷纷被恢复名誉，重新工作。

1973年2月20日，在江西经历了三年多被监督劳动的磨难后，邓小平携全家乘火车离赣返京。3月10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8月，邓小平当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邓小平开始协助周恩来总理进行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

邓小平复出后，面对的是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的局面。

——在“全面夺权”的动乱中，经济工作的指挥、调度和管理系统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使国民经济的运行失控。

——企业内部过去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而遭到践踏。

——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升，劳动纪律松弛，工伤事故增加……

——交通运输阻塞，物资供应困难，协作关系中断，全国大批工矿交通

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

面对上述局面，邓小平心里十分明白：只有从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入手，对交通、工业、农业、科技、军队等各条战线进行全面的整顿，才能扭转国民经济的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才能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然而，邓小平为恢复正常秩序、恢复国民经济所作的种种努力，都遭到“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

邓小平抓整顿劳动纪律，抓恢复正常生产；“四人帮”们就大造舆论说“不要为错误路线生产”。邓小平整顿铁路，要求火车“安全正点万里行”；“四人帮”们就大造舆论说“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邓小平要求学生读书，学习文化知识，提出升大学要考试；“四人帮”就制造出“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要反教育战线的回潮，并利用他们手中的舆论工具，拍摄电影《决裂》，宣传“一双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

邓小平要起用一批有经验的老干部，“四人帮”就大搞“反经验主义”，“批林批孔”，说什么“还乡团回来了”……

“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丑类，成天实事不干，专门摇唇鼓舌。邓小平所做的每一件利国利民之事，在“四人帮”那里一经他们的“政治分析”、“上纲上线”，就成为“复辟资本主义”或“搞修正主义”的“事件”。

请看——

“蜗牛事件”、为了发展我国的彩电工业，1973年经国务院批准，准备从国外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四机部派代表团去美国考察。美国康宁公司赠给我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蜗牛工艺品作为纪念礼品。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四机部第十设计院一个名叫许文彬的人就此事给江青打了小报告。江青借题发挥，一口咬定美方送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狂叫：“那个蜗牛在哪里？拿来我看，中央要它作展览！”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并责令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驻华联络处去，提出抗议。她还信口开河地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了。”

“‘风庆’轮事件”：“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1974年5月4日，“风庆”轮首次由上海港远航欧洲，战胜艰险，胜利返航。交通部派遣干部李国堂、顾文广到船上协助工作。他俩分别担任政委、政治干事。“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对李、顾二人歧视打击，提出要他们批判国务院、交通部在造船问题上的“洋奴哲学”、“崇洋卖国”，被李、顾拒绝。“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整理了近万字的诬告材料，江青等便借此将所谓“李、顾事件”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

在“风庆”轮返航后，把李、顾二人扣留在上海，进行批斗，并且扩大事态，扬言要“揪后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

……

这一期间，接踵而至的“张铁生事件”、“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黄帅事件”，“《三上桃峰》事件”……等等，件件都是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

为什么？

因为当时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周恩来因病情恶化住进医院，“四人帮”想置邓小平于死地，由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并待周恩来去世后接管国务院

的大权。

毛泽东对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有所察觉，并对他们多次进行批评。1974年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眼看决定国家领导人的四届人大就要召开，“四人帮”一伙认为，决定人选的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首先发难。她拿出“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说：对这个材料要调查一下！江青进一步逼问邓小平，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批驳江青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完，愤而退场。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早就知道他要跳，果然跳出来了。

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进一步尖锐。

1974年11月邓小平到长沙看望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汇报前一段的工作。毛泽东首先说：邓小平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坦率地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他们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他们强加于人，我也是不高兴的。”

“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我这是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可见邓小平斗争的决心和意志。

面对“四人帮”对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种种干扰，毛泽东终于发话了。

1974年12月13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月13日到17日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更加沉重。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

铁路必须整顿

“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到处都是混乱。

铁路运输——国家的动脉，在混乱中艰难地维持着。

当时的高论：“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张春桥讥讽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火车最准点，分秒不差……”

铁路必须整顿，要反派性，抓生产。

邓小平亲率 6000 名军人，前往徐州与“造反派”谈判。

万里受命出任铁道部长。老百姓说，“铁路正点万里行”。

“火车司机不能下车吃饭，要带饭盒在车上吃，这是老章程，是有道理的。现在随便下车吃饭，经常误点。”

“值班不准喝酒，这是历来的规矩，现在也不严格执行了。喝醉了酒扳错道岔，就会造成火车相撞的重大事故。”“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

“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 1975 年 3 月 5 日。复出以后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正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上，发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

当时，由于闹派性、打派仗，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

当时的铁路秩序，许多列车经常晚点；按实际装车能力，每天可装 5.5 万车，可 1973 年每天只装 4 万多车；1964 年铁路只发生 88 次严重事故，但 1974 年竟高达 775 次，邓小平要整顿铁路秩序，要火车安全正点。但“四人帮”却煽动派性，叫嚷“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张春桥还嘲讽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火车最准点，分秒不差，怎么能比那个。”……

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人们搞空头政治搞惯了，空喊政治口号喊惯了，形成了一种“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意识。仿佛一抓生产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斩钉截铁地指出：“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他提出，要敢字当头，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要坚决扭转铁路秩序混乱的局面。

对于闹派性，邓小平毫不退让地说：必须停止派性斗争。对那些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教育得过来，可既往不咎。对少数利用派性混水摸鱼，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坏人，不处理不行。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当然是调头头。调动后又钻出个新的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服从调动就不发工资！

为了扭转铁路运输工作中的混乱局面，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讨论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明确

指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

1974年到1975年间，徐州地区闹派性十分严重，发展成了搞武斗的“内战”，严重地影响了铁路运输和工业生产，以致有一段时间杭州旅游区不能对外开放。

邓小平决定徐州铁路局首先开始整顿。他亲自带领6000名解放军战士到徐州整顿铁路秩序，并同闹派性的“头头”谈判，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了混乱。同时，逮捕了3个破坏铁路运输的造反派头头，对蓄意制造交通事故、煽动哄抢物资、盗窃铁路器材的犯罪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打击。

邓小平对于清除派性是十分坚决、毫不手软的；同时，他也十分注意政策。“文革”中清查“五一六”分子时，徐州市搞了6000多个“五一六”分子。邓小平说：徐州市搞了6000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如果按五口之家来算，再加上他们的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涉及的面就有好几万人。他说：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我们讲落实政策，不光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必须使他们很快把包袱放下来。在落实政策时，还要注意这样的情况：有些人虽然没有戴帽子，但是批评或者斗争过他们，伤了感情；有的地方虽然没有清查“五一六”，但是也干了一些类似的事情。这些问题都要妥善解决。

为了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发展生产、发展经济，邓小平恢复、起用了一批富有实际工作经验、敢抓敢管的领导干部。他把31名老同志安排到部长的职位上，58名安排为司局级领导，44名获得了省级领导职务。他甚至成功地任命7名过去被诬为“走资派”的同志为省委第一书记。

为整顿铁路交通，邓小平任命万里为铁道部长。万里受命出任铁道部长后，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1975年2月下旬主持召开的全国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的精神，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他顶着“四人帮”批“唯生产力论”的逆流，派出工作组，并亲自到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对这些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工作组发动群众批判派性，撤换一批捣乱的、派性严重的坏头头，平反错案，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

由于万里贯彻执行邓小平的指示措施得力，深得广大铁路职工的拥护，铁路运输状况迅速好转。

到1975年4月份：

——堵塞严重的几条铁路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中的19个超额完成运输计划。

——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53700多车，比2月份平均日装车多10000多车。

——煤炭日装车达7800多车，是5年来第一次完成计划。

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1975年前四个月，全国欠产钢195万吨，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大厂欠产严重。中央于5月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立刻显著回升。6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72400吨，超过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日产。

邓小平、万里整顿铁路交通所取得的显著成绩，被老百姓誉为“铁路正点万里行”……

不上班就不发工资

整顿初见成效，却遇到“四人帮”的干扰。“反对经验主义”的背景复杂。

毛泽东又说话了，“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邓小平得到了支持。

邓小平要求干部大胆整顿，不要怕这怕那。

“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

1975年，国民经济在整顿中获得明显增长。

1975年4月，经过整顿，全国铁路日装车数创历史最好水平，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大提高。经毛泽东4月22日同意，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草案的报告》，提出了要制定十年远景规划，进一步研究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报告虽然在某些地方带有严重的“批林批孔”色彩，然而，从总的方面说，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全国各条战线都开始了整顿工作，中国的经济形势眼看着在好转。

但是，“四人帮”不甘寂寞，这时又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口号。他们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目的，是要用这个口号重新把群众“轰”起来，对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进行又一次围攻，从而把中国的局势搞乱。

显然，如果听任“四人帮”发起的这场“反对经验主义”的波澜扩展开来，无疑会对四届人大确定下来的国务院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体制产生巨大的冲击，使中国刚刚好转的经济形势发生逆转。

毛泽东当时看出了这一点。他非常清楚，进行了八年多“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时需要的是安定。他不能让对经验主义的批判过于膨胀。为此，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呈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在毛泽东批示的促动下，1975年4月27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江青作了自我批评。

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的作法。他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毛泽东还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对江青等人的问题，毛泽东说：“上半年解决不了，

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之后，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数次帮助。6月28日，江青给“毛泽东，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的信中说：“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我在四月二十六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表面上也承认了错误。张春桥曾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要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四人帮”利用“反对经验主义”干扰破坏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中心的国务院正常工作的阴谋被粉碎了。邓小平遏制了“四人帮”的猖狂活动，赢得了时间。为了使整个中国早日从“文化大革命”的疮痍中恢复过来，邓小平继续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

在解决了铁路问题以后，邓小平下一步的着重点是整顿工业。而整顿工业的重点又是整顿钢铁工业。

邓小平认为，要把钢铁生产搞上去，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二是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三是必须认真落实政策；四是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1975年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厅会议上和5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的两次讲话中着力强调：

——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这样的班子，“一不是软的，二不是懒的，三不是散的。”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条件是中央支持他们，省委支持他们”。

邓小平还风趣地作了这样一个比喻：“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他鼓励干部要敢于坚持原则，大胆进行整顿，不要怕别人抓辫子。他传达了毛泽东最近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条重要指示，指出“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搞生产”。要求大家加强对生产的领导，把钢铁产量搞上去。

——要把生产搞上去，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

邓小平语气坚硬地强调，“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有的人把党的事业闹得乌天黑地，你还等他觉悟，你能等得及吗？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他说，要发动群众斗派性，“寸步不让”，造成一个强大的声势。

——必须认真落实政策，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邓小平特别强调；在落实政策时，“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到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摆到适当位置上”。

——必须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

邓小平指出：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

最近武钢就发生了一天跑两次钢水的大事故。有些事故发生了，还分不清是谁的责任。有的工厂纪律很松弛，职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制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哪能随便不上班，马马虎虎呢？不上班就不发工资，不工作就叫他离开嘛！”他强调，“一定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

经过几个月来对工业的整顿，我国工业生产情况日益好转。1975年7月，国务院关于当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6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也超过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达到72400吨，开始补还欠产。

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这表明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大包干”，中国农民的发明

惊人的历史巧合？

1978年12月18日。这是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日子。

这一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

这一天，安徽凤阳县的21个农民，在一张土地承包的“契约”上按下了鲜红的指印。

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兴衰的严峻历史转折点上，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低层的农民，共同翻开了历史的新一页。

一年多后，四川广汉县向阳乡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震动了全中国，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1978年12月18日。

落日的余晖辉洒在苍凉的黄土地上……

21个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得不到温饱的庄稼汉，含着眼泪在这样一张“契约”上按下了鲜红鲜红的手指印：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今后能干好，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行，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这是在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队长严宏昌把18户农家召集到一块儿，他神色凝重、悲怆：“俺们得自己救活自己”，“把土地分了！”他们一起对天盟誓立下了这份“契约”。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庄稼汉们按下手指印的同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的日子。

在关乎国运昌盛的严峻历史关头，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的新一页。

正是在这次扭转乾坤的至关重要的会议上，邓小平明确地提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然而，历史沿袭的惰性力量是巨大的。

1979年春，正是局势犬牙交错时期。安徽滁州地区一位县委书记，每天清晨必怀揣一小收音机，一字不漏地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一天，当他得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读者来信”，严厉指责农村“包产到户”是复辟倒退时，急如星火地找到了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

万里心中也揣着一本帐：1978年，凤阳县逃荒要饭的人由六七千人猛增到二三十万人，几年内全县农村人口骤减了十万。被穷困压得直不起腰来的小岗生产队，1978年这个队打下的粮食只有1955年的三分之一，76人离乡逃荒要饭。这种状况并非凤阳仅有，在安徽全省，到处都可以看到拿着介绍信讨饭的饥民……

当时的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吃不饱饭。

万里以坚定的口吻对地、县领导干部们说：“报纸不种田，报纸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有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干……”

农民要种田，种田要吃饱饭，这是 $1 + 1 = 2$ 的最简单的道理。但在 1979 年，却成为一个举国上下反复争论不休的严重政治问题。

邓小平坦率地指出：“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他还说：“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这是一场由饥饿而引发起来的革命。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试验，先后在安徽省凤阳县和四川省广汉县取得了成功。

1979 年，广泛流传于凤阳农村的一首顺口溜，最为生动、形象地表述了农民们喜不自禁的心情：“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十年内乱，四川省广汉县田畴不事稼穡，外地人只需用几十斤粮票就可以换走当地的一个大姑娘。广汉人以对饥饿最痛切的体尝和最果敢的实践勇气，在丰腴的土地上成为全国第一批用“包产到组”的形式种地的庄稼汉。

1980 年 4 月，当广汉县向阳乡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将原有摊子一分为三：乡党委、乡政府、农工商总公司时，马上成为轰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

这一举措无情地宣告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大锅饭体制在中国农村的寿终正寝。其后不久，中国农村被取消了二十多年的乡、村建制得以恢复，它适应了新的生产形式的需要。

农村改革的潜流，日益在峡谷冲撞中迸发出巨大的反响，汇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洪流——

安徽、四川、贵州等地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传播并实施起来。

到 1984 年，中国广大农村 569 万个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落实联产承包的农户达到 18397.9 万户，占总农户的 96.6%。

从凤阳小岗一个生产队到全中国的 500 多万个生产队，短短 6 年时间，中国农民的前进步伐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迅猛推广，消除了原有人民公社体制中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各种弊端，极大地解放了农民们长期受压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农业开始从自给半自给的小生产模式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大农业转化。

随之，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金开始涌现，从而刺激农村的多种经营迅速崛起：兼业户、专业户、重点户如雨后春笋遍布乡村城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终于开始挣脱“黄土地”的束缚。

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8 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 6495 亿元，相当于 1978 年的全国社会生产总值。——这意味着在农村改革兴起的十年间，乡镇企业走完了新中国建国三十年所走过的漫长路程。

从 1982 年到 1986 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下达“一号文件”，向全国八亿农民郑重宣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

土地是最容不得糊弄的——荒芜了就荒芜了，耕耘了就耕耘了。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崇拜比得上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崇拜更虔诚的了。

一旦像农民尊重土地一样地尊重了农民，广袤的田野上便收获了顺应生产规律的硕果。

正是在这一年——1986年，中国粮食生产创造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纪录：全国粮食总产量高达4200亿公斤，人均粮食达到400公斤，第一次跃上世界平均水平；棉花人均占有量则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至此，中国人有资格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告：“一个饥饿的时代基本结束了！”

所以，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总结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四个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在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周恩来向世界宣告了一个宏伟目标：中国要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主政中央，宣布实现“四化”是全党的大局。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对邓小平如是说。

毛泽东能让邓小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吗？

邓小平在“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伟人征途多磨难。

历史巨轮不会后退。被打倒的邓小平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他获得了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政治基础。

终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

1975年1月13日，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周恩来总理，强撑着病体走出北京医院，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的代表们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出席会议的2864位代表噙着热泪，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本来是由毛泽东创议，由周恩来于1964年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的。但是，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却被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干扰。

在“文革”中，江青一伙散布“实现四个现代化之日，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之时”，“四个现代化计划就是不讲阶级、不讲路线的发财计划”之类的谬论，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思想混乱。

1975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九个年头。当时，“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再次造成了全国形势的严重混乱。“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但是，由于党和人民的斗争，也由于毛泽东态度的某种变化，在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四人帮”“反周组阁”的阴谋遭到了失败。这次大会不仅选出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而且在时隔三届人大十年之后又重新提出了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因而得到与会代表雷鸣般的掌声，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和热烈欢迎。

四届人大之后，由于劳累过度，周恩来总理的病情继续恶化，常住医院，在医院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则由邓小平主持。

邓小平主政中央之后，顶住“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的严重的政治压力，旗帜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振聋发聩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什么是当前的大局”的问题。

在1975年3月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邓小平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就是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他说，从现在算起，实现“四化”目标只有25年时间了，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邓小平要求各地书记们不要怕，要敢于抓整顿，敢于抓生产，解决问题不能拖，搞社会主义不能等。

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清晰：当时国内局势一片混乱，生产必须有秩序，社会必须有秩序。有了生产秩序，社会秩序，生产才能恢复正常，社会生活才能恢复正常。只有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下，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所以，明确了“四化”目标后，邓小平先抓“整顿”。

在王洪文主持的中央读书班上，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鉴于毛泽东处在全党全国至高无上的位置上，邓小平巧妙地借用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说过的话，力图把发展经济也提高到指导纲领的地位。他强调：“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革命”、“造反”、“阶级斗争”至高无上，“四人帮”一伙又挥舞着批“唯生产力论”的大棒，而邓小平却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作为纲领的口号，这无疑需要超人的胆略和气魄。

在“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全面整顿中，邓小平以整顿铁路为突破口，继而向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技和文艺各个领域全面推进。

经过一年的全面整顿和大力治理，1975年国民经济迅速扭转了停滞下降的趋势，呈现出上升的势头……

1975年9月，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几十斤。在病痛折磨下，他连散步几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9月20日，不得不进行手术。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治疗。为此，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寿命。”

就在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的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再度发生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各部门。10月下旬，医生们对周恩来再次进行了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询问邓小平来了没有？当邓小平靠近手推车时，他握住邓小平伸过来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各个领域积累的“左”倾污垢的全面清洗。“四人帮”为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而猖狂反扑，毛泽东也不能容忍邓小平彻底否走“文化大革命”的势头继续发展下去。

1976年2月间，毛泽东发话了，说邓小平“他这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总是黑猫白猫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说不翻案，靠不住呀！”毛泽东还认为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以目乱纲，再次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泽东这些谈话公布后，全国开始公开批判邓小平。在一阵阵“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喧嚣声中，“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被搁置一边了……

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才作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再次提到党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从此，“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成为“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

有利还是有害，才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我愿结教育科技部门当后勤部长

践踏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惊世骇俗。

一个孩子责怪不能辅导他做作业的父亲：你小时候怎么不用功念书？

“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了恶运。

科学知识也有阶级性？“样板戏”却要用“西洋”乐器伴奏。

教育和科技是民族竞争力的关键。珠海用奥迪轿车重奖知识分子。

美国总统布什发誓要当一名“教育科技总统”。

邓小平却说“我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两句意思相同的话，邓小平比布什早说10年。

90年代初，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区不断传来令人震惊和羡慕的消息：别墅和汽车成了科技人员的奖品！重奖科技人员、员的消息被善于捕捉兴奋点的新闻媒介炒得十分火热。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这些科学家、专家拿到属于自己的汽车、住房和高额奖金时的兴奋，但不一定能体会到他们对个人的知识和价值受到社会承认时发自内心的激动，更少有人思考这一新闻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

曾几何时，中国大地盛行这种看法：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于是，学生停课闹革命，交白卷、反潮流成为时尚，“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口号响遍神州大地。

“各方面都要整顿”，“文革”中复职不久的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后明确提出了这一主张。整顿当然包括科技和教育，胡耀邦同志被派往中国科学院工作。

1975年9月，胡耀邦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小平的具体指示，主持制定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大声疾呼：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要尽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邓小平在听取耀邦同志汇报时，心情十分激动，“这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国家么，科研不走在前面？”，“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这不是复旧！教师地位问题，只挨骂，几百万教员，怎么调动积极性呢？”

然而，毛泽东同志否定了邓小平的这一见解；否定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此后不久，小平同志又一次被打倒。但历史不会倒退。

1977年8月，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有3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座谈会正在举行。邓小平身着白衬衣，绿军裤、黑布鞋来到会场。会议整整开了4天；小平同志静静地听了4天、记了4天。他在会上讲的话不多，但他的话使在场的专家学者激动不已。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我自告奋勇管科学教育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赶超从何着手呢？就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我这次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短短几句话，温暖了在场每一个专家的心，也唤起了全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一腔报国热情。

邓小平知道，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整整落后了20年！

日本战后的迅速崛起靠的是教育和科技。

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也是以科技教育为基础。

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上显现出巨大的力量。重视科学技

术，重视教育的基础作用，已成为各国政治家的基本国策。“硅谷”是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基地，一度享誉世界；日本不甘落后，高科技密集城市——筑波城的崛起，使“硅谷”黯然失色。发达国家你追我赶，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不亚于政治和经济战场上的斗争。微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宇宙开发、海洋开发，科技革命巨浪波及之处，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泉涌，足以让任何一次产业革命相形见绌。

精明的政治家、企业家都在算账：科学技术因素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上升到70%左右！

形势逼人，时间紧迫。

科技发展必须以教育为基础。邓小平明确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在全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他对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1978年6月，他对清华大学一些负责人说“不搞好大学，就提不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邓小平是一位注重行动的政治家。“非要增加教育经费不可”，一言既出，落地开花。1979年中国的教育经费是70.11亿元，1981年增至101亿元，1982年又增至114亿元。对一个百废待兴的大国来说，拿出这笔钱是不容易的。虽然这笔钱并不多，也不够，但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开端，它标志着一个古老而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又开始重视文化教育了。

1978年3月18日，这是一个将在历史上留下重重印记的日子：中国科学界的第一次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邓小平在大会的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科学工作者是劳动者”。

用朴素的语言表达的普遍真理，在全国引起空前热烈的反响。几天中，科学大会秘书处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电报5000多封；收到学术论文、设计图纸、规划建议等600多件。这些科研成果大都是作者冒着危险，躲在“牛棚”里，借着煤油灯，凭着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前途的责任，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

邓小平深知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苦辛，深知中国科技事业百废待兴的艰难，他在大会上用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成功地赢得了“愿为知己者死”的知识分子的心：

“我愿做你们的后勤部长！”——全场掌声雷动。

“后勤部长”是说话算数的。

此后几年中，国家科委重建起来；科技人员的科研时间和职称评定工作得到恢复；新的发明条例正式颁行；许多中、青年科技专家开始享受科研津贴。到1982年，全国获得国家发明奖的项目多达642项，数量超过此前20年的总和，质量也要高出许多。

由此，1978年的春天成为“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

大力发展“第一生产力”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今天小学生也接受的道理。

如果说，最可怕的落后是科学技术的落后，你同意吗？

不发射卫星，不爆炸原子弹、氢弹，就没有中国的大国地位。

人的强大不在于他的物质质量，而在于他的大脑和他的智慧。用一块殖民地也换不了莎士比亚。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战利品”是科学家。

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必须成为科技大国。

《中国，醒来的科学巨人！》，美国科技情报所一篇专稿的题目。

读史使人明智。

在人类历史走到封建社会的漫长征程中，人类改造自然靠的是人的体力和人的自然力。从埃及金字塔到中国的万里长城，依靠的是人的自然力。人们无力创造自然中没有的东西，只得靠采集狩猎、畜牧种植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社会的延续。人的自然力是当时的第一生产力。

18 世纪的产业革命把人类带入了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动力机器的时代。使用大机器的工业化生产使人的能力空前增强。机器成为工业革命时代的第一生产力。

进入 20 世纪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 50 年代末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兴起，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力度和深度发生了质的演进。

新技术革命每天都在创造奇迹：电子激光器、人造卫星、航天飞机，宇宙空间站。生物工程。生命科学……。

新技术革命使人类的知识骤增，近 30 年来人类的知识比过去 2000 年的总和还多；到 2003 年人类的知识又将翻一番；到 2010 年许多知识领域将出现爆炸性的突破和扩展；到 2050 年，人们今天运用的知识只能占那时知识总和的 1%。

科技发展使产业结构发生大变：高科技产业群龙争雄，传统农业将变为高技术农业，工业将变为系统产业，服务业将变为知识创造产业。

古老的中国已失去昨日的辉煌。今日中国的腾飞需要科技生产力。

邓小平在思考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

“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世纪，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他老人家的思考是深邃而明确的：在新科技革命的形势下，不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不大力发展科技事业，中国的振兴将无从实现。

· 国家之间的竞争是无情的，甚至是残酷的。日前乃至下个世纪，国家间的竞争将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其中主要是以科技和经济力的竞争。一位学者指出：70 年代以来，国际关系格局不再以战争手段来实现，而是从科技催化经济，再从经济与军事对社会支撑作用的位移，经政治产生强烈的作用，导致国家关系的变异。于是形成了当今世界以科技为导向、经济为基础、以

政治为目的的多极世界格局。各国之间正在展开一场以技术、贸易、金融、人才和教育资源为对象的全面的综合国力竞争。

落后就要挨打。而最可怕的落后是科学技术的落后。

从现在抓起，从小孩子抓起，寄希望于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寄希望于年青一代。

1992年春天，他老人家在视察珠海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公司时，握住一位复旦大学毕业的年青人的手说，要握一握年青人的手，科技的希望在年青人。与公司科技人员一起合影留念后，他再次绕到后排，与站在那里几位年青人握了手。然后，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对我们国家要爱哟！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是改变这种面貌的时候了。他希望在这一代年青科技工作者中，能再涌现出像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这样的优秀科学家。

在离开亚仿公司后，小平同志仍然在思考着“第一生产力”。他说，真高兴啊，我真高兴看到这样年轻的队伍。当年钱学森搞导弹的时候，给他100个中学生。高中生，就这样带出来了，现在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在这个公司差不多有100人，学历比那个时候高多了。珠海这个地方就容纳了这么多高科技人才，从全国来说，就更多了。在听到珠海市委领导介绍准备用轿车。住房和现金重奖科技人员时，小平同志竖起大拇指说：“我赞成。”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短短十几年中，我国科技发展初步形成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加强基础性研究三个层次的纵深布置，一系列的科技发展计划先后出台：

“科技攻关计划”

“星火计划”

“863计划”

“火炬计划”

“攀登计划”

“重点科技推广计划”

“丰收计划”

“燎原计划”

.....

还有各省市及行业制定的科技兴省、科技兴市、科技兴行业等发展计划也在实施中。

我国的科技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据统计，1992年底，全国科技人员数已达1763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1.5倍，而且大批中青年科技人员已成为研究开发第一线的骨干力量。

科研成果数量逐年上升，质量不断提高：1992年相当于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占世界总量的比例，由“六五”期间的5.3%上升到10%以上。

美国科技情报所为此发表一篇报道，题目就是：“中国，醒来的科学巨人”。该文说，从1982年到1991年，全世界科研论文增长了18.2%，而中国的论文增长了448.2%。

科技体制也在改革中得到完善，一位美国学者参观了“联想”集团后，感慨他说，要知道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成果商品化的进展，看看“联想”集团就够了。1993年我国技术市场的成交额已达150亿元。

国际科学技术交流和合作也在迅速扩大。我国现在已同世界120多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同 80 多个国家签订了政府科技合作协议书，参加了 280 多个国际科技合作组织。

成就是巨大的。但我们却不可忽视存在的问题和差距。

最大的问题和困难是对科技的投入不足。中国科学院 1994 年的经费是 2 亿元，全院有 2 万人，人均经费 1 万元，除去工资便所剩无几了。

一次，江泽民总书记接见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李远哲教授时，李教授对总书记直言道：“中国从 1978 年到 1984 年的科技投入还可以，可是从 1984 年以后，科技投入在下降。”总书记非常重视李教授的意见，明确表示一定要增加对科技的投入。

为了作好“科技第一生产力”这篇大文章，江总书记已经发出号召：“全党必须增强科技意识，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把科学技术切实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统筹兼顾，真抓实干。”

发医高科技，该花的钱就要花

神州大地商潮骤起，卷走几多文弱书生。

中国的科技人员都下海了吗？把科技馆改成歌舞厅，等于农民卖掉自己的种子。

社会主义大国不能只靠引进技术，中国必须有自己的高科技。

海湾战争。萨达姆的导弹成了“瞎子”，司令部无法向地面部队下达指令。萨达姆输给了布什，不，他是输给了高技术。

高科技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硅谷”是用美元堆起来的。要花点钱搞高科技——邓小平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

李政道向邓小平进言：“中国还需要‘博士后’”。

耗资 2 亿 4 千万人民币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在北京诞生。国际科学界称：世界高能物理的中心在北京！

1988 年 10 月 20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突出位置，报道了我国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的消息，“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项重大突破性成就”。

1990 年 8 月，新加坡。某四星级饭店内。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从会议厅传出。这里正在举行国际高能物理会议，有来自世界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物理学家出席。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郑志鹏的报告激起了刚才那阵热烈的掌声。

掌声未落，美国斯但福直线加速器中心主任里克特教授就发表评论道：这是一个新的高能物理实验室——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向世界宣布他们取得的可喜成果。“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目前世界上这一能区运行的唯一加速器，而且亮度高于以往的同类机器。”

台湾代表向高能所的代表热烈祝贺：你们的成就使每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

许多海外华裔学者说：中国对撞机的成功，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的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成功和取得的初步物理结果，标志着中国已在国际高能物理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这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总设计师用政治家的远见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1986 年 10 月的北京，金风送爽。在中南海的一间会客室里，邓小平与李政道教授正在亲切谈话。李政道向小平同志陈述了有关培养中国新一代科学家，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使中国成为领导世界的科技强国的一系列主张，都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

邓小平对李教授说：“对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前几年有的外国科学家问我，你们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搞加速器？我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

从长远考虑！这是总设计师的战略眼光和深谋远虑。

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穷国。

高科技离不开高投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4 年 2 月发表的《世界科学

报告)指出,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知识的差距”,强调“没有科学知识的传播就不会有经济的持续发展”。但是,由于经济基础的差距,目前世界80%的“发展研究”活动集中在发达国家,它们每年用于科研的经费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2.9%,日本平均每人科研经费700美元,美国每人600美元。欧共体国家每人300美元。而拉美国家人均科研经费仅为10美元。这种巨大的科研投入差距无疑使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困难重重。

怎样将有限的钱用于科研发展,是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家的一大考验。

中国的科技人员是很有能耐的。一个美国评论家说,美国的钱在犹太人的衣袋里,美国的科技在华裔学者的脑袋里。李政道教授曾十分骄傲他说,在美国的许多高等学府、高级研究机构和科学实验室里,大部分拔尖的学生、杰出的科学家和优秀的科研人员都是华裔!

然而,我们怎样使优秀的科技人才有用武之地呢?

商品经济的大潮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许多科技人员也随波逐流,纷纷跳进海中,以知识换取收入,在社会上寻求知识价值的实现。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如果科学家们都去当电脑经销商,帮专业户勾兑白酒,对其本人也许是一条致富之路,但对一个大国却很难说不是一种资源的巨大浪费。

李政道教授尖锐地指出:把科技馆改成歌厅、舞厅是很成问题的。这相当于一个庄稼人把种子都卖掉了,把本钱都输掉了。科技力量是一个国家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是谈不上民族振兴的。

中国应该有一些认真做事的人,中国政府要为这些认真做事的人提供更好的条件。中国的发展要靠一大批认真做事的人。

认真做事的科技工作者需要的是机会和条件。但在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拿出一大笔钱来搞基础科学研究是需要有战略眼光的。

1980年底,由于国家进行经济调整,压缩基建规模,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被中止了。这在国内外高能物理学界引起巨大反响。

搞不搞?邓小平同志说:结论产生于科学论证之后。于是,一个个由中外专家和高层领导人参加的论证会召开了。结论在1981年5月得出:高能物理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科学,中国应该发展。

邓小平尊重科学家们的意见,明确指示:“要下决心,不要再犹豫了”,“经费要放宽一些”。

邓小平说:“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现在不花钱,“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

1984年10月7日,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支持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破土动工了。邓小平同志参加了动工典礼,并为基石题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

1988年,耗资2亿4千万元的对撞机工程顺利建成。从1990年开始,对撞机实验开始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成果。

1992年4月,通过这台对撞机的实验,确认了三代轻子普适性这一基本物理规律,推翻了国际科学界公认的当年世界粒子物理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1993年,对撞机实验又获得新的重大发现。

国际科学界惊呼:“世界高能物理的中心在北京!”

李政道教授在世界各地自豪地宣称：“北京电子正负电子对撞机在全世界是第一流的，取得的成就是永久性的，它将发展成为世界性实验室，领导全世界高能物理的发展。”

作为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小平同志注重考虑大局，考虑中国的长远发展。

正负电子对撞机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有一大批高科技人才。人才是国家持续发展的基础。

邓小平喜欢向科学家请教。

邓小平问：什么是博士后？为什么要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李政道回答道：大学教育是教师教学生，学生回答教师的问题，回答对了就毕业。博士生阶段就不同了。教师给博士生出的题目，教师自己并不一定知道如何解答，待研究生把题目做出来了，教师就请同行们来评判做得对不对，如果做对了，就给学生博士学位。再进一步，就是学生自己找题目搞研究，这就是“博士后”。

邓小平听后明确表示：这个倡议很重要，很合理，国家是要支持的。

于是，中国大地上逐步建起了一套较完整的博士后流动站制度，至 1994 年，已经有了 2700 多名博士后人员。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骨干，是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生力军。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中间技术战略”对发展中国家最适用吗？

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可能吗？

日本人趁美国人还没反应过来，用廉价买“无价之宝”——新技术。运气真好。

“巴统”给社会主义大国造成的困境。日本东芝公司真大胆，竟然把“联动九轴机床”卖给苏联。美国杀鸡给猴看。

“速作决断，不可拖延”，邓小平毅然批准“863”计划。

国际技术合作的实质是什么？就是珍珠换玛瑙。

1986年3月5日，初春的北京万物复苏。

中南海一间办公室里，邓小平同志凝视着书桌上一份报告，这是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的呼吁：世界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中国不能再落后了！小平同志的思绪翻卷，他想得很多，想得很远：当今世界的竞争是高技术竞争啊！西方大国想用技术卡我们，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高科技！

小平同志毅然提起笔来，在报告上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总设计师支持发展高科技，因为高科技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1985年初夏，冷战的乌云笼罩在大西洋上。美国海军一艘猎潜舰的官兵处于临战状态。它已经跟踪一艘苏联核潜艇十几个小时了。但这次跟踪比以往要困难得多，这艘苏联潜艇发动机的噪声很小。难道苏联已经掌握了高精度船用螺旋桨制造技术？这个疑问迅速传回了五角大楼，对苏军技术装备了如指掌的美军情报机关大为惊奇，立即组织力量开展调查。在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年代里，一方在高技术上领先，就意味着在军事竞争上取得优势。

这个谜语很快就得到答案。“巴统”（全称为“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给美国政府发来电传，声称接到日本一公司职员举报：日本东芝机械公司违反“巴统”的禁令，擅自向苏联出口了“联动九轴机床”。这种机床可用于加工高精度的大型船用螺旋桨。真像大白：苏联从日本获得了新的螺旋桨制造设备。

“巴统”成立于1949年11月，是一个旨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和禁运的机构，是冷战的产物。它的成员包括美国、日本和西欧发达国家。名义上，“巴统”不对任何政府或高一组织负责。实际上它直接受美国政府的影响和支配。它对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列了一份“禁单”，详细列出禁止向该国出口的所有货物和技术。凡是“禁单”所列物品，“巴统”成员国的贸易部门便不能签发该项物品的出口许可证书。违反禁令者将受到严厉的经济和贸易制裁。

1986年6月，美国正式要求日本政府查处东芝公司的越轨行为。日方一开始试图“护短”，装模作样地调查一番，便对美国说：此事没有发生过。但美国的态度十分强硬，以美日关系的前景相要挟。几经周旋之后，日本终于抵抗不住。1987年4月，日本通产省以违反外贸管理法为由，控告东芝公司，并逮捕了公司高级领导人，查抄了部分高级职员住宅。随即作出禁止

东芝公司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一年的行政处分。但美国并不就此干休，由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禁止东芝公司在 2 至 5 年内向美国出口任何产品。

“东芝事件”是美国对所有与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的商人的一个警告：谁卖给社会主义国家不该卖的东西，谁就要受到惩罚。

“巴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一大障碍。

在封锁和禁运中求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特殊困难。克服困难，打破封锁，从根本上说要靠自己，要发展我国自己的高科技事业。

然而，在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大潮中，发展中国家正确的科技发展战略是什么？

西方学者曾为发展中国家开出了各种“药方”。

“药方”之一：“中间技术”战略。这是英国经济学家 E·F·舒马赫的杰作。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差，资金不足，人口众多，失业严重，所以不能追求高新技术，而应尽量采用“中间技术”——即“介于先进技术和落后技术之间的技术”。其优点是：较简单，易于掌握；较廉价，不需太多资金；吸收劳动力多，有利于解决失业问题。

“药方”之二：“同一起跑线”战略。这是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高见。他认为“中间技术”战略是失败的战略，是富国企图使穷国政治上更软弱，依赖性更强的阴谋。他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当把眼光放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上，借助先进技术跨越某些发展阶段，实现“跳跃式”发展。因而应当优先发展包括卫星技术、光纤技术在内的信息产业，发展微电子工业和生态农业。为发展中国家描绘了一幅相当乐观的前景。

这两个“药方”是相互矛盾的，正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面临的“两难困境”。

如果采用世界先进科技来实现“跳跃”，所需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教育和人才培养怎样解决？

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能与西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本国教育目标过分超前，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不能被不发达的国内市场所吸纳，结果不是用非所学，人才浪费，就是外流到发达国家，为他人作嫁衣裳。据统计，印度 1990 年在国外谋生的科技人员有 41 万，而到 2000 年将达到 50 万。由于人才外流，印度已损失了 150 亿美元。

如果以中间技术和适度教育为目标，则可能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形势下，进一步拉大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许，一个非社会主义的中小国家，走中间技术道路有较大的可行性。因为西方大国不会对它们存有戒心，甚至会出于其世界战略的考虑，给它们提供一些十分重要的支持和援助。然而，社会主义大国没有这种“福气”。

邓小平同志的视野十分宽阔，思路十分清晰，他明确地指出：

“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有雄才大略的邓小平，有视祖国富强为己任的一大批科技人才，中国有自己独特的高科技发展战略！

1986 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中国与世界

高技术领域的差距开始缩小。

这是一个直接决定中国下一个世纪国际竞争力的神圣计划，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维护中国的大国地位的重大决策。

没有高技术，我们的腰硬不起来。

广东一家空调器厂前几年一直从日本引进生产技术和设备，双方的合作颇为顺利。然而，去年该厂向日本方面提出引进一些高新技术时，却被日方拒绝了，甚至连参观也不让他们去。该厂决策者一气之下，拿出2亿元，请“863”计划的专家帮忙解决难题。一个CIMS专家组承担了这个攻关项目，帮助工厂建起了新的自动化生产线。于是，情况顿时发生了变化，日本厂商自己找上门来，主动要求与该厂合作。

国家科委的一位官员说得好：国际技术合作的实质是什么？就是珍珠换玛瑙。你没有珍珠就不可能得到人家的玛瑙。

只要有自己的高新科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科技合作的大趋势下，尤其是在“信息高速公路”的作用下，就可以发挥自己在市场、资源和人力等方面的优势，直接利用先进技术，尽量少走弯路，加快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大潮中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要摸城市改革这个“老虎屁股”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

城市是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法律于一身的综合体。

中国的城市集结着共和国 80% 以上的财富。

“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成功之路。它还能是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之路？

农村改革生机勃勃，城市改革没有活力，“四化”

怎么能实现？

邓小平下决心了：“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要摸城市改革这个“老虎屁股”！

在人类发展史上，国家的出现是以城堡为标志的。

城市的诞生——象征着人类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

城市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文化、教育、科技于一身，是生产关系最完整最集中的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总体形象的窗口。

在中国，城市集结着共和国 80% 以上的财富。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已有了很大增强。1986 年的我国企业个数已达到 44 万个，职工人数 12700 多万，工业固定资产总值达到 13500 多亿元；工业总产值 1949 年我国仅有 140 亿元，1986 年已达到 11157 亿元，增长了 79 倍；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也由 1949 年的 3000 元，增加到 1986 年的 15300 元，增长了 4 倍多；我国每一职工所拥有的固定资产已由 1949 年的 3510 元增加到 1986 年的 11000 元，设备和生产能力已大大增强。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经济效益方面，我国不但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且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每一职工所拥有的固定资产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 4 倍，接近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200 美元），然而我国制造业职工的净产出只比一般低收入国家高 50%，而不及中等收入国家的二分之一。如果把占用的流动资金计算在内，我国的产出水平将会更低。

——我国经济效益低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太大。有关资料表明，我国每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能耗已跃居世界第一，国民生产总值新增一美元的能耗比日本高 7 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近 3 倍。据统计，我国每亿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1979 年为 17.8 万吨标准煤，比“一五”时期的 9.18 万吨高 89.5%，比 1965 年的 13.6 万吨高 27.9%，1980 年的相应数也比 1965 年高 21.5%。1984 年我国每生产一美元价值所消耗的能源相当于印度和美国的 2.7 倍，日本的 5.8 倍，联邦德国的 4.2 倍，巴西的 6.5 倍；消耗的钢材相当于日本的 2.1 倍，联邦德国的 3.9 倍，美国的 2.3 倍，巴西的 2.2 倍，法国的 3.4 倍。从总体上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跟日本差不多，而国民生产总值 1986 年仅相当于日本的六分之一。

——我国经济效益过低除了突出地表现在这种惊人的高投入、低产出外，还表现在产品质量低下，大量充斥市场。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机械工业 80 年代中期拥有的 31000 多种机电产品中，需要更新换代或改进的就有

26000多种，占84%；我国轻工专用设备中有36%亟待改进，24%应立即淘汰。1980年，我国拥有金属切削机床283万台，居世界第二位，但“文革”期间生产的机床约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多数属不合格产品。这种陈旧、过时、粗笨的设备，使质量低劣的产品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80年代中期，我国机电产品性能达到国外70年代水平的仅有百分之十几，达到60年代水平的占35%，相当于50年代水平的占55%。由于我国的工业制成品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因而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极差，出口产品的大都是初级产品和矿产品，工业制成品占出口产品的比例，尚不如印度、印尼等经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占出口总量的比例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进出口总额尚不如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台湾，同我泱泱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我国同国际先进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不仅很大，而且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我国许多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只及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到几分之一。虽然我国实行低工资，但某些产品成本却高于先进国家，如小汽车成本比日本高约1至3倍，半导体分立器件高约6至10倍，大规模集成电路高约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我国国民经济的这种超常状态的高投入，低产出状况，造成了一个总的结果，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在很长时期只能在一个低水平上徘徊。1983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352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的1/40，瑞士的1/50，日本的1/30，新加坡的1/17，阿尔及利亚的1/7，苏联的1/14，名列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之后，与索马里、坦桑尼亚相近。社会劳动生产率低下还使我国的综合国力难以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在124个国家和地区中处于倒数第48位。

因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后，他睿智的目光又瞄准了城市。他在1984年提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要摸城市改革这个“老虎屁股”！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有一句名言：“理解现实总是准备变革的第一步！”

旧体制的弊端在哪里？

通过指令性计划统揽企业的人、财、物和供产销大权，以及多层结构的行政管理，是我国原有经济管理体制的两大支柱——这种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政拿不分，条块分割，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排斥、限制市场机制，漠视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在经济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因而窒息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生机和活力。

历史不容等待。

北京，终于拉开了大幕——

1984年10月20日，一个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深刻影响和改变城市市民生活的日子——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了。

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口吻告诫全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使社会主义企业和生产单位具有充分的活力。”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兴起于80年代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态势，重又呈现出20年代中国民主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

将农村的“包”字请进城。

承包、租赁、股份、资产经营责任制，以各自不同的切入点进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探索着我国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变革。

据 1990 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占 56.0%，集体占 35.4%，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占 8.6%。

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开始形成。

1992 年初邓小平巡视南方，进一步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次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自此，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攻坚阶段……

军队要支援国家建设

第三次世界大战何时爆发？各国政治家的一个大难题。

八十岁的人检阅部队是个缺陷，邓小平如是说。

兵贵精不贵多，历来是军队建设的重要原则。邓小平说：军队工作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军队要消肿。

震惊世界的中国百万大裁军。西方一些人渲染“中国威胁”论，而中国军人的人均军费仅为美国的 1/68。

世界并不平静，要增强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和应急作战能力。

1984 年 10 月 1 日，节日的北京分外壮美。长安街上彩旗和鲜花交相辉映，色彩绚丽。粉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壮观。这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35 岁的生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

许多国家都有阅兵的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自己的阅兵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每逢部队出征或重大战役前后，大都要举行阅兵。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把阅兵作为国庆大典的一项重要内容，从 1949 年至 1959 年，天安门广场上共举行过十一次阅兵。阅兵仪式成为国庆节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显示了军威，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众的精神。

到了六十年代，“左”的思潮使共和国的经济发展遭到严重挫折，饥饿的阴影使人们脸上很难显出喜悦和自豪。阅兵还合适吗？

1960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国庆阅兵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阅兵”。这也许是当时国内形势下最好的选择。此后，由于“文化大革命”这场大浩劫的发生，全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阅兵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这个巨人开始站起来。国力强，民心悦，阅兵的传统又回来了。

全国人民以兴奋的心情等待着阔别 24 年的国庆阅兵仪式。

凌晨，受检阅部队已经在指定地点集结完毕。

上午 9 时 40 分，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五彩气球升上天空。10 点整，庆祝国庆大会开始，1200 人组成的军乐队奏起雄壮的国歌，28 门礼炮震天动地。

此时，一辆黑色红旗牌敞篷轿车缓缓驶出天安门，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挺立在车上。阅兵总指挥秦基伟乘车前来，大声地报告：“军委主席，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阅兵式，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检阅。”伴着军乐队乐曲，小平同志乘坐的阅兵车缓缓驶向受阅部队。此刻，受阅官兵全部换上了挺括的新式军服，个个英姿焕发。“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小平向指战员们亲切问候。“首长好！”“首长辛苦了！”部队官兵们齐声应答，响亮的声音在长空中久久回荡。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此时，他老人家心中一定感到欣慰：他为军队建设倾注的大量心血，终于使它恢复了昔日的雄威。

一个月后，即 1984 年 11 月 1 日，中央军委召开了有各军种和 11 个大军

区领导人参加的军委座谈会。

大家等待着邓小平同志讲话。

小平的目光往场内环视一遍，像是自问：“从哪里讲起呢？”

这样的开场白在邓小平的讲话中是很少见的。到会的我军高级将领们开始有种预感：今天的会不大寻常。

“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内国际反映都很好。”

大家的注意力更集中了。

小平话锋一转，“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前两年解决了军以下领导班子的年轻化问题，但是高级干部的年轻化还没有解决。”他触及到军队领导层老化这个极为重要又十分敏感的问题。

接着，他切入一个牵动面极大，十分复杂的问题，即对军队进行精简整编，他说，“即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是表现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一个从节省开支看，一个从军队本身提高素质看，都必须消肿。”

减多少呢？在场的高级将领们也在思考。

邓小平提出，再裁减100万，把军队总额保持在300万。他说：“减到3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300万足够应付意外的事件。多了，实际上是增加了吃闲饭的人，实在不需要。”

提出这个思路是不容易的。小平对军队的精简问题已经考虑很久了。1975年他刚恢复工作时，就提出过把“消肿”作为整顿军队的首要任务，然而，当时我国对战争的看法是“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消肿的工作不可能进行下去。1980年3月，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提出要精简军队，“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此后，他在一些场合多次强调这个主张。

正确的决策出自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邓小平一直在进行客观而冷静的观察。他认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推迟、延缓世界战争爆发是可能的。因此要利用不打仗的时间，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经济建设。军队也要尽可能支援和支持国家经济建设。

邓小平对各位将军语重心长地说：“现在还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考虑腾出力量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

“大局好起来，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100万的裁员，涉及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涉及到数十万干部的去留问题，这是多么复杂的大事！但为了国家前途和民族振兴，邓小平甘愿冒风险，甘愿担当这一历史重任。

他知道一些同志心中有顾虑，他坚定地对将军们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裁军是这次军委会议上，邓小平要向将军们交代的实质性问题。

裁军，是邓小平同志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的贯彻所走的一步重要的棋。

几个月后，在我军高级将领们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全军裁减 100 万人的体制改革、精简方案顺利地制定出来。

百万大裁军的进程是顺利的。全军各部队以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为本，或去或留，一切听从指挥。这充分说明，邓小平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军队是具有严格纪律、听党的话的革命军队。

精简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军队的合成程度明显加强，武器装备得到改善，现代化建设水平和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世界战争短时间里打不起来，人类有可能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国面临着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压力，大国对热点地区的争夺仍是世界的不安定因素。中国绝不谋求霸权，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是绝不容许侵犯的。我国辽阔的国土需要人民军队的保卫。因此，国防建设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防建设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基本发展的基本保证。

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

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

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系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兴衰。

要执行原计划的亏损，还是要打乱原计划的扭亏为赢？这竟然是一道难题。

邓小平深知旧体制的症结所在，他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

“兵败”永登的反思：是技不如人，还是体制缺陷？

这是电视政论片《十年潮》中披露的一段往事：

一家每年接受国家 1000 万元巨额亏损补贴的大型企业，向上级主管部门递交报告，要求将 1000 万元补贴款先期下拨，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保证当年扭亏，次年盈利。答复是：要把在年底拨给的补贴款提前到年初拨给，整套周密的计划就被打乱了，你们还是按原计划在每年年底、照领 1000 万元亏损补贴算了。

似乎是一则“黑色幽默”。

可悲的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嗷嗷待哺、患“亏损贫血症”的企业俯拾皆是。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种惰性的病毒已侵入肌体的骨髓，以致于在改革开放十余年后，一些不可思议的怪事仍然在国有企业时有发生。

让我们看看《中国经营报》披露的几个例子。

据对辽宁 10 家亏损大户的调查：

——铁岭有色金属加工厂 1991 年底换厂长清点物资，发现仓库少了近千吨铜，价值 1000 万元。什么时候丢的谁也说不清，反正该厂 7 年来从未盘点过物资。

——沈阳小型拖拉机厂 1990 年进行年终盘点时，发现少了价值近百万元的 182 台拖拉机。其中 20 台是 3 年前发出的货，对方至今未付一分钱货款，但无帐可查。原厂长把企业搞得资不抵债后，却去做了农机总公司东北分公司经理。

——营口洗衣机厂 1988 年购进的零部件，至今仍有近 1000 万元压库。该厂一种弹簧已用了 17 年，还剩 17 万根，还可再用 2 年。同年该厂购进 800 吨美国树脂，耗资五六百万元，企业根本用不上，至今仍趴在库里。原厂长在短短几年任职内使企业亏损 1.4 亿元，可至今也未受任何处分。——营口造纸厂竟然没有销售明细帐，既说不清人家欠他多少钱，也说不清他欠别人多少钱。原厂长任职 7 年，工厂亏损 1.5 亿元，他却安然离休。

这些管理混乱不堪的企业，几年前大都被评为省市先进企业，据说窍门在于帐目报表作了“技术处理”。

——某家用电器厂从 1986～1988 年投资 1.8 亿元，先后上了洗衣机、吸尘器等 14 个项目，结果至今没有一个形成生产能力。他们花 80 万美元购买剃须刀生产图纸，却没有关键部件的工艺图，该厂负债 4.2 亿元。

——某厂进口 4000 万元的铜箔生产线，但这套美国设备千疮百孔，关键的轧辊不能用，从美国来的工程师竟没有图纸，拿着照片照猫画虎！

——某纺织厂花 780 万元从日本进口一次性篷布生产线，据去日本考察

的人说，日本人都用这种一次性篷布。但中国人认为只用一次不合算，因而这个厂生产的一次性篷布至今在国内打不开销路。

这 10 家企业没有一家对引进失败的原因进行过认真分析。企业领导和有关部门应负什么责任，谁也说不清。这 10 家企业有 9 家进行了技术改造，都出现了重大失误。这些项目都经过上级“审批”、“把关”。但技术人员、厂长、上级审批部门都没有一人受到处分。原因是为了上项目争投资，企业都把“可行性报告”变成“可批性报告”，上级很难从报告上看出问题。而企业亏损之后，企业又很容易把责任推给国家行政机构。

我们再看看“‘兵败’永登的反思”。

中国、日本、意大利三国，在甘肃省永登县境内的引大（通河）入秦（王川）工地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国际凿洞大赛”。

这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自流灌溉水利工程。这项工程的投资近一半是世界银行贷款。按世界银行要求，主要工程采用国际招标。日本、意大利两家公司和铁道部第十五、二十工程局先后中标。这样，就在我国的大西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凿洞大赛”的场面。

意大利 CMC 公司的施工队伍，装备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全断面双护盾式快速掘进机。这台机械“穿山甲”开挖、衬砌一次完成，全部自动化，工人的劳动强度很轻，只须按电钮。意大利人以其先进的设备，严格的管理，在这里创造了日进尺 65.6 米的世界掘进新纪录。

日本熊谷组施工队承担的是“引大入秦”工程中最长的隧洞——盘道岭的施工。这条隧洞全长 15.7 公里，也是当时国内最长的隧洞。这段工程常出现塌方、流沙、涌水等险情，地质情况复杂，被有关专家称为“地质博物馆”。日本人在这里使用了捅板法、化学注浆法、超短台阶法等许多在一般工程中不常使用的施工方法，施展了地下工程的“十八般武艺”，终于使该隧洞如期贯通。

铁道部第十五、二十工程局是国内施工队伍中一支打过硬仗的队伍。这支队伍曾参加过成昆、青藏、大秦等铁路线的建设，是国内施工队伍中人数最多、设备最好的一支施工队。然而，这支队伍在这场“国际凿洞大赛”中却相形见绌，屡遭失败。他们承担的“引大入秦”第一组标的施工任务，在时间已过 2/3 时，工程进度却只完成了 1/3，质量也未能达到合同要求，多次受到世界银行聘请的外国现场监理的批评，并曾收到过停工令，限期整顿。

这是铁十五、二十局建局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惨败”。

在铁二十局施工的 8 号隧洞口，可以看到一张施工循环图。图上爆破、排烟、出碴等工序都是以小时为单位进行组合的。而日本熊谷组在盘道岭的施工作业表却是以分钟为单位来安排的。这足见两者间管理水平的差距！

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意大利 CMC 公司的劳务，是由水电部五局二分局派出的职工担任的。他们在意大利人的管理下，操纵着世界最先进的掘进机，创造了世界掘进纪录。为什么同样是中国人，差距却如此之大？一位中国记者曾向承担意大利 CMC 公司劳务的一位负责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也拥有这台机器，能不能创造出同样的纪录？”他沉思了很久方才回答：“能。但是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较高管理水平的经理，并实行真正的经理负责制。经理拥有人、财、物的绝对支配权。二是用工上实行合同制，分配上拉大档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施工的高效率，否则，就难说了。”

看来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即：企业必须真正地拥有自主权。

真正的企业应该是法人，即具有独立的产权，并在产权明晰基础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

但是，在旧体制下，企业只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它根本没有经营自主权，因而它也就承担不起相应的责任。

据 1992 年的一次抽样调查，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的自主权的比例分别是：

投资决策权 41.8%

劳动用工权 43.8%

人事权 45.4%

生产计划权 78%

物资采购权 80%

产品定价权 48%

产品销售权 86%

外贸经营权 22.6%

企业内部分配权 76.2%

在上述诸项权力中，关键的人事权、用工权、投资决策权、外贸权等项权利都很小。因此，我们的“企业”不是完全自主经营的。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邓小平就提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当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以后他又多次指出，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

这就为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关键的环节。

放权让利，给企业“松绑”，成为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

要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

谁对国有资产负责？

令人痛心的黑洞：一年流失七、八百亿元。

“中国的国有企业搞不好，中国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有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一个“用钱规则”：用自己的钱为自己服务，讲舒适也讲节约；用别人的钱为自己服务，讲舒适不讲节约。真是如此？

西方国家的“经理革命”，使经理们兢兢业业，“不是所有者胜似所有者”，“不是老板胜似老板”。

艾柯卡成为克莱斯勒公司的救星，他的年薪 1000 万美元。

西方的两权分离理论可不可以为我所用？学者们在研究代理理论，试图从中找到促进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良方。

中国改革起始于农村，一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阔农村里掀起了致富热潮。人们惊叹不已，还是原来那么一些人、那些地，怎么一下子产出这么多的东西来。这是邓小平的智慧。他对中国农村太熟悉了。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千百万农民手中的“鸡公车”。建国后“割资本主义尾巴”，也割掉了农民致富发家的梦想，扼杀了农村的生机和活力，或者说，摧毁了中国发展的基础。

邓小平成功地用利益杠杆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活了起来。然而中国的现代化也必须以工业化为基础。农村起来了，城市怎么办？从 80 年代中期起，他老人家按捺住心头的喜悦，把深邃的目光从农村转向城市，转向中国的经济支柱——千千万万个国有工业企业。

国有企业，现在仍然是我国经济的支柱。国家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能源交通、骨干企业都属国有；国家的财政收入的 60% 来自国有企业；城镇劳动者的绝大部分仍然在国有企业就业。可以说，没有国有企业，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没有各种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发展。直到今天，国有企业仍然在为全国的改革和发展付出代价，背负着历史的重负。

改革开放 17 年来，虽然其他所有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国有企业始终掌握着国家的命脉。1993 年国有工业企业产值的比重，在电力为 87%，石油天然气为 99%，黑色冶金业为 77%，交通运输业设备制造业为 60%，化工工业为 62%。可见国有经济居于支配地位。金融、铁路、通信等国家经济命脉更是牢牢地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今后几年中，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只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关键行业和领域居支持地位，国有经济仍然会发挥主导作用。

但是也要看到，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的大多数并未能根本改变落后面貌，其中的突出问题是效率和效益不高，或者说相当低下：

国有企业占了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流动资金贷款的 70% 左右，但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国有企业只占了 20% 左右。

国有企业的净产值增长和利润增长量中，靠效益提高的比重只有 12.2% 和 20% 左右，靠资金和劳动力投入得来的部分则占 87.8% 和 80%。

在 1994 年经过清产核资的 12.4 万户国有企业中，已经资不抵债的占 27% 以上，加上扣除挂账和损失以后资不抵债的 21%，共达 49% 左右。这就是说，国有企业不仅仍处于高投入、低产出的状态，而且其中有近一半已经成

了“空壳企业”。如果不下决心进行进一步改革，整个国民经济就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

围绕这一难题，国内的政治家、学者和专家们都在绞尽脑汁，思索良策。然而，高见不少，分歧却很大。有的认为应加大国家投入，有的说加强技术改造，有的力主为国有企业解除历史包袱，还有认为关键是提高经营者的素质和能力……。这些思路都是有道理的，人们的一个共同声音就是：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深化改革的课题很多，解决好国有企业独立自主与无人负责的矛盾是企业改革的“牛鼻子”。

邓小平指出：“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个问题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受老框框的束缚。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

显然，小平同志主张在“两权”关系上做文章，主张吸收发达国家的好的做法。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属性是全民共同占有，但又不能把全民资产平均量化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如果量化到个人，也就是实行全民资产私有化。全民资产既不能分割，其运作就必须有代表者来实施，而国家自然是全民资产的总代表，从国务院领导人到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主管人员、一直到各种形式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都是全民资产的委托代理者。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国有企业逐步走向自主经营，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企业经营者行为合理化，怎样使这些委托代理者自觉地、尽心尽力地致力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这是尽人智知的事实。各方人等都在挖国有资产，一年的流失量高达七、八亿元！

出路何在？

根本出路是通过机制创新，使国有资产委托代表者变成不是老板胜似老板，不是所有者胜似所有者”。

二战后，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经理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使企业从资本所有者在经营管理上的终身制和家族世袭制中摆脱出来，使企业经营者职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中，资本所有者基本上脱离了经营管理者的岗位，由职业的经营管理者承担企业的管理工作。有人称这是一种所有者被架空的机制。但正是这种机制，使企业能够在日益复杂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在和发展。发达国家的实践告诉人们，不是所有者的经营管理人员同样可以把企业经营管理得很好。其中的奥秘在于，这些被聘用的高级管理人员，在丰厚的年薪和奖金、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的作用下，能够像企业所有者一样关心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为企业兢兢业业地出力。

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一度濒于倒闭，董事会无奈之下，以重金聘请艾柯卡出任总经理，结果使公司重现勃勃生机。在克莱斯勒公司，艾柯卡的年薪是1000万美元，而一般职工年薪只有3万多美元，总经理收入高出职工几十倍，丰厚的薪金有利于经营者责任心的增强。

如果经营效果不好，甚至造成企业亏损乃至破产，经营者便会被解聘。一般说来，在西方激烈的就业竞争中，一个经营业绩不佳的经理很难再找到比较理想的职位，有的甚至在较长时间内被挤入失业大军的队伍，没有雇主愿意雇佣他。于是，他必须从头做起，以自己新的成绩让社会承认自己的能力，以获得新的工作机会。因此，经营者一般是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和荣誉的。声誉与金钱联系在一起。

出现了重量大的经营失误，不仅经营者要承担直接责任，董事会也要承担用人不当的责任。美国的所罗门公司是一家著名的金融公司，由于总经理在一笔生意上违法，给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董事会解聘了总经理，董事会全体成员也集体辞职，重新成立新的董事会。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也曾因错用了一个总经理，董事会三分之一的成员自动辞职。这一体制使企业的所有者不可能随意将经营权委托出去，不可能在选择经营者时考虑人情和私人关系。

借用发达国家企业里经营者“不是老板胜似老板”的经验，我们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建立和发挥利益机制的作用，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成为实际上的所有者，真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责任心。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在四个方面进行改革：

实行高薪激励机制，使经营者具有较高的个人收入和社会地位，强化其为保住职位而全力以赴工作的责任感。

建立和健全高级管理人才市场，引入公开、公平竞争机制，实行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新制度。

明确高级经营管理者资格和标准，职责和义务，建立和完善对经营者的录用、考核、解聘和监督制度。

改善相关的社会条件，引导经营者将自身的长远利益与企业长远发展利益内在地结合起来，使他们具有注重长远发展的动力，防止出现经营中的“短期行为”。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需要有一场中国特色的“经理革命”。

发展乡镇企业的路子是对的

工业化一定会造成农村凋敝吗？

斯大林获得工业化的巨大成功，却让农业原地徘徊 30 年。

人口大国的困境——人多地少。据说农民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农闲时间。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

苏州的农民不往城里跑。

因地制宜：发展乡镇企业的绝招。

土地占用太多，污染越来越严重，不能为乡镇企业护短。

社会现代化离不开城市化，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村城市化的希望。

在欧洲大陆上，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农村，到处充满着暴力、掠夺和血腥。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粮食、肉类，也需要工业原料。为了满足这些需求，统治阶级运用政权的强力，把大批农民从世代耕种的土地上驱赶出去，将土地集中经营，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农民成为流浪者，他们携儿带女，背井离乡，挤满了道路和街头，妻儿老小，啼饥寒号，挣扎在死亡线上。

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写到：“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现在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

工业化早期的欧洲，未能摆脱工业发达、农民破产，城市繁荣、农村凋敝的通病。

苏联 30 年代的工业化成就巨大，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但工业化过程的代价也不小，尤其使农民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1953 年斯大林逝世时，苏联的农业生产仅仅达到 1917 年沙皇俄国垮台时的水平。

中国的农村发展该走一条什么路？

我们有三大难题：

一是人口太多，而且越来越多（我国每年新增人口 1500 万），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何在？

二是耕地太少，而且越来越少（1978 年至 1993 年间，我国耕地面积净减约 6432 万亩）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出路何在？

三是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文化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中央和地方都拿不出足够的钱，农村的发展资金怎么解决？

中国农民是十分伟大并富于创造力的。

早在 50 年代，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就出现了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特点的萌芽状态的乡镇企业，只是在“左”的思潮泛滥的年代里，它们没有茁壮成长的条件。

改革开放的大潮给农民一个展示聪明才智的良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农村掀起兴办乡镇企业的热潮，其发展速度之快。让任何一个政治家或经济学家都会惊讶：1994 年，全国已拥有 2495 万个乡镇企业，职工 1.2 亿人，总产值 42588 亿元，创利润 2572 亿元，上交税金 1591 亿元，出口交货值 3398 亿元。显然，乡镇企业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产业，成为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强大支柱，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真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举！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看看事实吧。

华西，江南水乡一个普通的村庄，面积仅 0.96 平方公里，人口 1479 人。它却成为中国农村一颗富庶，文明的耀眼的明星。1993 年，华西村实现产值超 10 亿元，利税超亿元。李鹏同志来华西视察后，欣然命笔：“华西村，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华西村的最大特点是坚持走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走进华西，那一排排漂亮的彩色小楼，一辆辆崭新的捷达轿车，还有那家家户户的彩电冰箱电话空调，无不说明华西人正在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山东文登农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昔日荒凉贫困的土地上，搞起了一大批欣欣向荣的乡镇企业，1992 年，文登已跻身全国农村综合经济“百强县”的行列，工业总产值突破百亿元大关，其中乡镇工业产值达 74 亿元，有 300 多家企业的 290 多种产品打入海外市场。这里有一个山东省最大的乡镇企业——文登通讯电缆有限公司，拥有日本、美国、德国等世界一流的专业生产设备和生产线，产品畅销全国，出口欧美地区及东南亚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的技术、素质和规模均具全国专业厂家之首。

横店，浙江省的一个小镇。长期环境封闭，贫困落后。改革开放以来，横店人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以令人难以想象的能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1994 年横店集团的工业总产值达 10.8 亿元，完成利税 7193.2 万元，出口创汇 100 万元，居全国乡镇企业第 10 位。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几乎占横店工业产值的 50%，日本松下电器集团经过苛刻的质量检验后，决定使用这里生产的高科技磁性材料，并称赞道：“世界的磁都在中国，中国的磁都在横店”。

进入 90 年代，横店已经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硬磁银钙铁氧体生产基地，70% 的产品销往东南亚、日本、欧洲和美国，世界许多著名电器公司成为横店的固定客户。1993 年 3 月，横店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企业集团，成为一支名符其实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出国门的“航空母舰”。他们已在美国、香港创办了 3 家境外公司，有 100 多种产品销往五大洲的 40 几个国家和地区。

在一些乡镇企业发展好的地区，农村的生产建设、社会事业、生活福利，包括农业生产、村镇建设、财政税收、文化教育、社会治安等一切社会生产和生活，无不以乡镇企业为经济依托。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改变广大农民的精神面貌，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壮大，就没有农业的稳定和提高，就没有农民的共同富裕。

邓小平同志感慨地说：乡镇企业发展这么快，这是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小平同志太谦虚了，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壮大，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结果，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农民群众聪明才智的产物。乡镇企业并非完美无缺。但它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巨大的，它也会在实践中完善自身。

能源和交通是我们的一个战略重点

有识之士呼唤“瓶颈”突破。

普通百姓盼望冰箱不再变成“温箱”，乘车能比骑车快些。

能源、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产业的发展滞后，已严重制约我国的经济。经过 40 多年勘测设计和研究论证，三峡工程终于开工了。

“史无前例”的要求：用增加一倍的能源支持增加三倍的经济发展的总目标，这使许多日本人大吃一惊。

专家们提出，发展核电以改变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巨额的资金投入怎样解决？

1994 年 12 月 14 日，共和国的历史将永远记载这个日子：经过 40 多年勘测设计和研究论证，凝聚着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心血的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了。17 年后，在滔滔长江上将矗立起坝轴线长 2335 米、坝顶高 185 米的拦江大坝，电站装机容量将达 1820 万千瓦。

突破“瓶颈”，这是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的一再呼吁。交通、能源、电力、通讯等基础产业的发展滞后，已经严重制约着我国的经济。这一问题引起了高层决策者的重视。1992 年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和中共十四大以后，国家更明确地指出，交通、能源等不仅是我国工业的基础，也是工业的后劲所在。

“瓶颈”的严重制约随处可见。

素有“火炉”之称的山城重庆，许多居民省吃俭用在居室里装上了空调，为的是在炎炎夏日里能够安然入睡。可是，不堪重负的电力供应系统却不能为居民提供凉风。于是，站在空调器下使劲摇扇子，成为重庆都市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川西坝子的农民靠着勤劳的双手和肥沃的土地，早已越过了温饱线，许多家庭都购置了彩色电视机。然而，时有时无的电力经常与农民开玩笑：全家老小正围坐桌旁吃饭，边看电视节目。“停电了！”满室欢声笑语戛然而止。农民只好点上备用的油灯，匆匆做完家务活，把疲倦身子躺在床上，睡觉吧。等待着光明的重现。天亮了，满室电灯通明，电视机正播着“东方时空”。农民不满意了：“这龟儿子电，划不着。”

这些年来，城乡民众谁没有受过断电之苦呢？这就是“瓶颈”制约给百姓的直观感受。

岂止电力，交通问题更是令人苦不堪言。在大城市的上下班高峰期，汽车没有自行车快并不是新闻，居民都说自己所在的城市是全国最大的“堵城”。

到 2000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要比 1980 年翻两番，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没有相应的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保证是不可能的。有学者指出，我国能源结构并不理想，解决能源问题的前景不容乐观，因为我国优质能源的生产严重不足。

世界经济的发展表明，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等优质能源的使用，会带来高得多的利用效率和明显的经济效益。所以，各国不论本国能源资源的状况，几乎都是以消费优质能源为主。1990 年各国的能源消费情况表明，工业发达国家优质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为 72.1%，而我国仅为 23.8

%。因此,2010年中国能源的消费结构将主要取决于优质能源石油、天然气、水电和核电的供给情况。我国的水电资源很丰富,有3.78亿千瓦的开发容量,但目前只利用了其中的7.4%。我国目前的核电站仅秦山和大亚湾2座,到本世纪末核电装机也只能达到210万千瓦,远低于1992年日本(3400万千瓦)、韩国(720万千瓦)。由于核电单位造价高,筹建周期长,另外我国天然铀资源也不十分丰富,因此到2010年装机能达到1200万千瓦已属不易。

加快能源和交通建设已是刻不容缓。

但是基础工业的发展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据计算,建一座100万千瓦装机的水电站至少要10亿元;修1000公里铁路要20多亿元;建一个年产煤2000万吨的露天矿需要30多亿元,如果要使公路能够大致满足需要,到2000年我国必须投入1000亿元用于公路建设。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按1993年5月末的价格水平计算,所需静态投资总额为900.9亿元,其中枢纽工程为500.9亿元,移民安置费400亿元。

巨额资金从哪里来?中国是个大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经过周密策划,力争资金问题的解决是可能的。以三峡工程为例,国家对三峡工程的资金投入主要是两项:一是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二是葛洲坝电厂利润。由于三峡工程一边施工,一边部分投产发电,到三峡工程建设的第11年(即2003年),首批机组发电后就开始有资金收入;第13年(即2005年)达到当年的资金需求平衡;第14年三峡工程出现资金盈余,不再向国家借款,并开始偿还贷款本息;到第18年(2010年)三峡工程收入可还清全部贷款本息。前十年的资金缺口,将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并利用出口信贷、商业贷款和发行债券等方式解决。

一些专家还强调,缓解我国的能源问题,还需要减少浪费,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日本目前的能源利用率已达80%。而我们只有30%左右。80年代以来,我国每50000吨能源所创的国民收入,比1965年还低20%。每年生产的(亿吨原油)大部分在国内消耗掉了。目前我国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三位,与日本差不多,但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左右。显然,建设和开发新能源是重要的,大力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同样十分重要。

近两年,国家的产业政策开始向“瓶颈”产业倾斜,瓶颈正在突破之中。

铁路:全长2538公里、总投资200多亿元的京九线已经铺通,这是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建成最长的铁路干线,对缓解南北运输紧张状况,增强我国铁路运力,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公路:交通部计划到2000年建成贯穿南北和东西的4条国道主干线,形成纵横全国的高等级公路运输大通道,这4条国道主干线将贯穿我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连接100多个大中城市,全长约1.45万公里,基本以二级公路以上标准贯通。这4条主干线的建成,将把我国沿海地区与西南、西北地区联结起来,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很大。

电力:电力部提出,要在电力建设中坚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种资金加速发展。预计到2000年,全国发电量将增至13400亿至14700亿千瓦时。目前除三峡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外,“9511工程”已经实现第一步目标,即北京市向内蒙古提供14亿元开发其西部电力资源,1995年

向北京送电 110—150 万千瓦，实现首都不拉闸限电的目标。国家重点工程神头第二发电厂已建成投产，使山西煤炭大省成为电力大省；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国产单机容量最大的平圩电厂也已建成交付使用。我国缺电的局面正在改变。

可以预料，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两个杠杆的作用，我国一定可以突破“瓶颈”，迎来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农业的出路要靠尖端技术

民以食为天。“口号农业”要误大事。

邓小平告诫：90年代经济如果出问题，可能出在农业上！

酱香型白酒每公斤耗粮5公斤，一年我们喝掉多少粮食？

饥饿威胁着世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表明：世界上只有5个发展中国家能够粮食自给。

中国人必须靠自己解决粮食供应。有钱就能买到粮食，这是天真的想法。

产粮地区的“口粮农业”，使有识之士为中国的粮食供应前景担忧。

专家呼吁：农业再上新台阶，发展农业科技是关键。

一瓶烈性白酒意味着什么？据介绍，酱香型白酒每公斤耗粮5公斤多，一般白酒每公斤耗粮2.5公斤。

1994年我国年产白酒651万吨，产销基本平衡，这就是说一年中我们喝掉了1432.2万吨粮食！相当于北京这个1100万人口的大都市三年多的粮食消费数。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人的吃饭问题是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

要解决好12亿人的吃饭问题，我们该做些什么？

专家提出：到2000年，我国农业生产要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四个一千”：即1000亿斤粮食、1000万吨肉、1000万担棉花、1000万吨水产品，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不容易的。从粮食生产的现状看，1990年到1993年，我国每年平均净增68亿斤，而按六年新增1000亿斤的目标要求，每年至少要增加167亿斤。从粮食消费需求来看，这一目标是必须实现的，因为我国2000年人口将达13亿，按人均年消费粮食400公斤算，粮食产量应该达到5.2亿吨。所以新增1000亿斤还不是一个高标准。

中国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搞粮食？有钱可以到国际市场上去买呀！这种主意有些天真。总体上看，世界粮食市场的形势并不乐观。世界粮食资源的基本格局是经济发达国家生产了世界粮食的一半以上，并拥有世界粮食库存量的60%，而它们的人日不到世界总人口的30%。而占世界人口70%以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和消费水平却很低。世界150个发展中国家，粮食能够自给的国家仅有5个。联合国有关部门分析：有94个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自给率从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末，将由93%降为92%，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良人口数将由目前的5.12亿增加为6.28亿。

显然，从世界范围看，饥饿仍然威胁着人类，世界市场没有那么多粮食来满足12亿人口的中国。

发展粮食生产，实现“四个一千”的目标，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加大投入，尤其是科技投入。

邓小平说，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

农业要上新台阶靠什么？关键靠科学技术。据统计，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增长中，60—80%是靠科技进步实现的。美国近半个世纪中农业资源变化不大，但由于科学技术投入不断增大，劳动力减少了五分之四，农业总产值却增加了一倍多。

然而，专家测算表明，科技进步的 50% 来源于科技投入。这就阐明了一个道理：农业要大发展，说到底要舍得对农业科技进行投入。

国家是重视农业科技投入的。1995 年国家新安排的非经营性投资中，有 40% 将用于农业和农用工业，农业银行的贷款也将增长 26.4%。

投入增长并不等于农业科技的发展。还要选择正确的投入方向，把有限的钱用到刀刃上。要把资金主要用于那些关系全局的，能产生重大经济效益的科技项目进行投入。如以杂交育种为代表的种子革命和以地膜覆盖为代表的栽培革命，都曾给农业带来大幅度的增产，产生了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北京农业大学一位教授说：只要依靠科技，我国的农业发展问题不难解决。粮食中最具增产潜力的是玉米。玉米增产要靠良种。我国目前的玉米品种都已老化，如果全国范围内都换上研制出来的新品种，仅玉米一项就可以增产 200—300 亿公斤。粮食问题就会大大缓解。但良种的推广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现代农业、高效农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种子的系列化、产业化、规范化。我国目前已育成 40 多种农作物的 5000 多个品种。良种覆盖率达 90% 以上，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已接近 30%。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粒种子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建国后曾产生巨大影响的我国水稻产量的 3 次重大突破，都是良种的率先突破，使我国水稻的平均亩产从 200 多斤跃增至 700 多斤。良种在农业生产中的巨大作用是其他任何因素都无可取代的。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投入。科技推动农业飞速发展。

河南新乡县为了稳定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每年拨 100 万元作为经费，巩固了县、乡、村三级科技推广队伍。全县通过推广微机植棉新技术，用微机控制棉花播种、施肥、打药、除虫等环节，有效地提高了棉花产量。

山东省的农业总产值已连续多年雄居全国首位，丰富的农产品不仅满足了全省 8600 多万人的消费，而且全国“菜篮子”、“米袋子”里，山东货越来越多。1994 年山东农业总产值 1300 亿元，农民人均收入 1200 元以上。山东农业何以领风骚？一个重要因素是狠抓了科技投入。据统计，山东农业增产中的科技因素已占到 41% 左右。实用农业科技在齐鲁大地得到普遍推广，主要农作物良种普及率已达 90% 以上，全省 70% 以上的农民掌握了一门或几门农业适用技术。

山东注意调动国家科研机构和民营科研机构两个积极性，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展农业科技，对一些重大科研项目组织联合攻关。1985 年以来，山东省取得农业科研成果 2000 多项：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果树、大蒜、马铃薯的脱毒快速繁殖，在国际上率先获得了 30 个苹果同质四倍体株系；在基因工程方面，成功地移植了花生基因文库，获得了一批特异性强，利用价值高的单克隆抗体等等。莱州农民李登海创办的五米研究所，先后培育出 13 个玉米新品种，5 次创造玉米单产全国最高纪录，有效促进了全省“吨粮田”建设。1994 年，山东省“吨粮田”面积达 1438 万亩。

成绩不能掩盖问题。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的科技投入并不多，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不能再停留在口头上。仅从政府对农业科研的资助看，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科研投资一般占农业总产值的 1%，而我国只有 0.25%。统计表明，“七五”期间我国科技进步率平均每年只有 1.26%，科技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作用由“六五”的 35% 降到 28%，这无疑给我们一个警示：农

业科技的发展再也不能忽视了。

借外债不可怕，但不要借得太多

聪明的人用别人的钱。

“摩根震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大量资金。

邓小平说：要勇于借外债，但不要借得太多。

美国企业把中国列为最理想的投资场所。各国吸引外资的竞争激烈。

巨额外债，中国有偿债能力吗？沉重的外债负担，使一些国家沦为富国的“附庸”，中国会不会重蹈复辙？

各地竞相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专家们急忙分析，中国每年引进多少外资为宜？

江泽民说，要防止外商用一点资本，就把你整个企业利用去。

1993年9月的一个下午，美国著名大证券公司摩根史丹利向外界宣布：香港股票在本公司资产中的比重将由0.2%上调至3%。这一消息在美国各大证券投资商中引起密切关注。几天后，摩根公司再次宣布将港股比重调升至6%。于是，一股投资香港的热潮骤起，国际基金纷纷投往香港，使恒生指数扶摇直上，一举突破9000点大关。一个由国际大金融机构带头投资香港市场的新高潮开始出现。其实，摩根公司并不是真正的带头者，在此之前，美国所罗门兄弟公司、高盛公司、日本野村证券公司等已经调高自己持有港股的比例。

香港驻旧金山经贸办事处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的美国企业大都把中国作为最理想的投资场所，其比例高达98%。1993年，美国商界对中国未来5年投资环境的信心比1992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人们对香港1997年后的形势持乐观态度，有80%的人表示了明确的信心。目前尚未在大陆投资的公司有63%准备在5年内到大陆投资办厂。

新一轮向中国投资的热潮正在形成。

中国的吸引力来自改革开放。十六年来，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国民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封闭半封闭状态已经根本改变，各项社会事业也都取得显著成绩。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良好态势将长期保持，广阔的市场和较高的积累能力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为外商投资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这是外国投资者最看重的因素。

近两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成果喜人。1992年我国引进192亿美元，1993年增至390亿美元，1994年又增加到458亿美元。

国外资金市场的竞争也是激烈的。中国在90年代后期能否保持吸收外资的良好势头，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亚洲各国经济增长迅速，吸引了大量资金。尤其是东盟国家已经成为西方投资热点。为进一步增强吸引力，东盟国家已决定从1992年起用15年时间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实现工业制成品和农产加工品的自申贸易，实行共同的优惠关税，到2008年把关税逐步降低到0—5%，并通过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形成工业产品的水平分工，从而增强其成员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中国与美国之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分歧，经济关系也存在着矛

盾。近年来，美国一再以人权和武器扩散等政治借口向中国施加压力，客观上妨碍了美国商人来华投资的发展。1993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扩大，尽管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港台对大陆直接投资转移而来的，但这种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海外直接投资企业如继续发展，可能会激化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吸引外资的进一步发展。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造成国际资金的分流，并引起国际资本市场利率上升，从而减少了投入亚洲和中国的资金。再加上9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资金相对短缺，据估计，全球每年的资金缺口约为1000亿美元。而且国际投资的区域性特点也使跨地区吸收资金受到限制。这样，中国进一步吸引外资受到了制约。

积极引进外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在90年代后期，我国要大规模吸收外资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努力：

加快改革步伐，创造更好的对外开放环境。调整和完善我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国际收支政策，健全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为吸引外资和管好用好外资奠定基础。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基础产业和完善服务体系，为外商投资提供良好的电力供应、交通运输等条件。

多渠道解决国内配套资金，减少引进外资以后对宏观经济平衡造成的压力。据中国银行测算，新建项目的固定资产每使用1美元外资，即需人民币配套资金8至10元，且不算投产后流动资金的需要量。因此，如果90年代后期我国每年吸收150亿美元外资，则需要配套资金1200至1500亿美元。这样庞大的资金数额，单靠政府是不行的，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多渠道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就不能实现大规模引进外资的目标。

要重点吸收大跨国公司的资金。对外开放15年来，我国吸收外资的70%来自港澳台地区，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大跨国公司的资金较少。国际跨国公司资金雄厚，信誉较高，并拥有先进技术和广阔的销售渠道，且一般投资规模较大。吸引它们的投资，不仅可以弥补我国资金不足，而且可以学到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升级。

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外资又是一把“双刃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从殖民者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国家，争取到民族独立，开始振兴民族经济，走上了现代化进程。由于多少年遭受殖民掠夺和压迫，发展经济的进程十分艰难。于是，原来的宗主国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它们制订发展计划，提供大笔贷款解决资金不足。然而效果并不如想象的那样，许多国家在经济取得一定发展的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包袱，形成了对发达国家经济上的“依附”。

经济依附不可避免会对政治独立形成制约。对此要保持足够的警惕。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要借鉴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方面的经验，“一是要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要注意这两方面的经验。”

中国目前引进多少国外资金为适度呢？有学者提出，我国外资引进每年以200~250亿美元为宜。如果太多，将会使我国背上沉重的外债负担，影响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

江泽民主席对国内利用外资中的问题阐述了一些看法，他说：要与有30多年经验的资本家打交道，往往容易上当。外国人投资只想要厂子里精华的

部分，然后把一堆包袱甩掉。我们往往急着要找出路，饥不择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引进外资，首先要防止外商用一点资本，就把你整个企业利用去。利用外资，通过与外商合作，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这里有很大的学问。

银行要办成真正的银行

资金紧张！企业家和地方官员的共识。

邓小平对我国金融状况不满意，“我们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

货币是一种等价物，货币发得太多就会导致通货膨胀。金融体制改革是一步难走的棋。

中央银行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人们各抒己见，不一而足。

邓小平说：“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

中央银行应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工具。

一位政府官员对当前的资金形势作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概括：现在是农业缺生产资金，企业缺流动资金，基础设施缺建设资金，引进外资缺配套资金，总之，各个方方面面都缺资金。

某省政府官员感受到缺钱的恐慌，做出严格规定：资金不得外流。

各地，各企业的“老板”们，都在寻找可能有用的关系，寻求解决资金困难的出路。

有人说，要是国家多发点货币，日子就好过了。

其实，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其货币投放量都不是随意的。作为一种等价物，货币的投放量取决于经济发展速度，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多少。一旦出现超经济发行的货币，就会造成贬值，发生通货膨胀。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从近几年看，我国货币发行量增加不少，信贷规模扩大迅速：1990年全国贷款总规模力15166亿元，1991年为18034亿元，1992年为21615亿元，1993年为26461亿元，1994年为31602亿元。1990年至1994年年均递增率18%以上，显然，国家的投资规模已经很大了。

这样多的钱到哪里去了？大都流进了“隆隆”作响的基建工地和新建厂房了。1990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4449亿元，到1994年激增为15926亿元，而且各地自筹资金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1990年占42.1%，1994年增至48.6%。大大超过国家预算内投资和国内贷款总和。于是，支出大于收入，收支平衡的关系被打乱，资金能不紧张吗？

于是，人们都把眼光盯在银行身上。似乎银行就是负责提供货币的，银行那里有用不完的钱。其实，银行不是只管发票子的机构，银行有其自身的职能和责任。

要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金融体制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邓小平对我国金融体制的现状是不满意的。1986年他在听取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今后的改革设想时，直率地指出：“我们的改革到底要走几步？多长时间完成？请你们研究一下”。“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

改革在加‘快’，但改革的加‘快’是需要条件的。1988年的经济形势使中央决定进行“治理整顿”，1989年国内出现一场“政治风波”。于是，金融体制改革与其他一些改革方案都只好暂时搁置起来。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新一轮改革热潮兴起。

在中共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从1994年以来，金融体制改革从上而下地加快了步伐。

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的金融管理机构，它的改革进展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成败。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正在调整中进一步完善职能。一是在货币政策上进一步确立了中央银行以稳定通货力目标的方针，其一切宏观调控措施都围绕这个目标制定实施。二是在实施政策上，一方面加强了宏观调控的集中性以改变目前专业银行处于准法人地位的状态；另一方面也在采取措施逐步向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过渡。三是加强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使我国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向法制化方面前进了一步。四是取消了中央银行的利润动机，实现了全额预算制，使中央银行能够在进行宏观调控时不考虑自身利益而考虑社会利益。这些改革措施如果真正到位，我国金融体制将有一个新的面貌，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也将更加完善和有效。

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它是国家整个金融系统的决策权威机构，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它们的主要作法有：

——中央银行通过印刷和发行钞票的数量来控制货币供应量。法国经济局负责宏观经济预测的副局长、经济学家科蒂认为，一个国家货币投放量的增长率减去其经济增长率，剩下的就是通货膨胀率。在通常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基本上应与经济增长同步，如慢于经济增长速度，则易造成资金紧缺，利率上升，抑制经济发展；如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则易造成通货膨胀。因此，美国和英国都曾采用过公布货币供应数量指标的作法，来稳定经济发展速度和遏制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控制货币投放量是治理通货膨胀最主要、最有效也是最起码的措施。目前发达国家一般将其货币投放量的年增长率控制在5%左右，减去目前经济增长率2%至3%，其通货膨胀率大约在2%至3%之间，这是民众可以忍受的。

——中央银行从事公开市场业务来控制市面货币流通量。当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政府债券时，私人或商业银行购买政府债券，必然将其资金流入中央银行，因而减少了市面货币的流通量；反之，当中央银行购进政府债券时，就将资金注入市场，从而增加了市场的货币供应量。西方发达国家在战后多次采用这一办法对货币流通量加以控制。

——中央银行改变利率或贴现率，以控制通货膨胀或影响产业投资方向及数量。但由于银行利率的改变将对私人存款、银行贷款和股市价格都产生直接影响，一般国家调整利率都十分谨慎。通常的作法是不对利率进行普遍调整，而是着重调整特定产业的贷款利率或特定债券的贴现利率来影响产业投资方向及数量。

——中央银行改变银行法定准备金比例来直接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发放量。欧美国家一般都通过立法，规定银行必须保持一定比例的准备金，以确保银行的支付能力，并赋予中央银行以确定和调整银行准备金比例的权力。当法定准备金比例提高时，商业银行的信贷发放量必须减少；反之，商业银行就会扩大信贷发放量。

发达国家的经验能为我所用吗？答案是肯定的。

现代社会管理是一门科学，其中有着许多普遍性规律，不存在姓“社”

或姓“资”的问题。然而，我们的问题积累得大多了、太久了，要想改变旧貌，需要有坚定的意志、强硬的手段、周密的谋划和高超的艺术。

高层人士提出，要使银行真正成为银行，要“三管齐下”。

中央银行：主要是进一步明确和发挥其职能作用。首先要保证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独立于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和企业，不受除国务院之外的其他力量干扰。其次是加强内外币管理和储备管理，认真对待国外净资产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到1994年底，我国已有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118家，代表处400余个，金融总资产124亿多美元，资金净流入58亿美元。其三是理顺利率，建立合理的金融市场，使银行既能利用好内资，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外资。

金融体制：重点是推进专业银行商业化，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首先要理顺五个关系，即地方政府与专业银行的关系，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的关系，专业银行与企业的关系，财政与专业银行的关系及其社会保障制度与国有专业银行的关系。这些关系的理顺的目的，是要使专业银行真正成为商业银行，从而意味着专业银行将成为追求最大利润的企业，其经营方式、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等都必须有相应的重大改变。但这里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的逾期贷款和银行的呆账、坏账问题，这个难关不突破，金融改革将难以推进。

金融市场：这里最大的难题是从储蓄向投资转换这个环节。我国目前城乡储蓄余额达60000亿元，这个数额是十分巨大的，但无论国有企业还是国家银行，却都处于低资本运转状况，国家银行资本补充不足，国有企业资本补充不足。同时，金融市场存在着明显的投机性。在立法不完善和市场严重分割的情况下，市场扩容过速，投机风气很盛。1994年上海股市从年初的800多点跌到7月份的300多点，又在8月份突破1000点大关，年终却在640点左右徘徊，成交量急剧下降。这种投机性的市场很难发挥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因此，创造一个有序、竞争和公平的金融市场是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

要帮助西藏发展经济

“金瓶掣签”，西藏自古属中国。

班禅相信共产党，支持解放军平息西藏反动上层的叛乱。

邓小平对班禅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这一评价使大师的眼眶湿润了。

布达拉宫穿上了新装。“圣湖”正在为西藏人民带来光明。

“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

汉人帮助西藏发展对西藏人民有利。

1980年8月26日上午，夏末的北京已有几分凉爽，班禅大师坐在书房中，一面翻阅藏、汉文字的文件材料，一面注意着墙上的时钟。他今天的心情格外激动，因为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约会。一会儿，杨静仁走进书房，兴奋地对大师说：咱们走吧，去见一位老朋友。

轿车在宽阔的大道上疾驶，不久便驶入一个古朴幽静的四合院，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家。邓小平已迎候在门口。班禅大师激动地走出车门，同邓小平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宾主在会客室落座后，邓小平关切地询问了大师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真诚地对班禅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你同达赖不同，你是爱国的，维护国家统一的，而达赖是搞分裂的。”一句话，说得班禅热泪盈眶。这是多么珍贵的理解和评价呵！大师的眼眶因激动而有些湿润了。

1949年6月，全国解放前夕，当时的班禅年仅11岁。他对形势有敏锐而独特的判断力，他从国民党腐败无能、共产党节节胜利的事实中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顺应人心，顺应历史”。于是断然决定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达赖、班禅三方面，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当晚，毛泽东主席设宴庆祝协议签订。班禅大师在宴会上激动他说：“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大喜事。”充分表达了他的一腔爱国热情。1953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动武装叛乱。班禅大师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中坚持爱国立场，高举爱国、团结、进步的旗帜，拥护中央关于平叛的方针，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平息叛乱。大师爱国家、爱民族、爱宗教的坚定立场，获得了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文化大革命”后，班禅重新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更是日夜为建设繁荣、民主、进步的新西藏操劳，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西藏是祖国的一部分，共和国的现代化不能没有西藏的现代化。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十分关心西藏。

1987年6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会客厅里，邓小平对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卡特说：“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拿西藏来说，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西藏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党中央是说到做到的。建国后，为了帮助西藏解决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中央在财税、金融、投资、价格、外贸等方面一直对西藏实行特殊

优惠政策。在过去 40 多年中，中央向西藏的投资已累计达 200 多亿元。

1994 年，中央又一次集中安排援建西藏 62 个项目，计划投资 23.8 亿元。这些项目大都是农业、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工程。目前这些项目进展顺利，已有 55 个项目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完成投资 3.2 亿元，成果喜人。

羊卓雍湖是西藏信教群众朝拜的“圣湖”。今天，这个“圣湖”正在威力国内外人士注目的一个焦点。这里将建成一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海拔 5000 多米的岗巴拉山把羊卓雍湖与雅鲁藏布江隔断，造成湖与江之间高达 840 米的天然落差。打穿一条 6 公里长的隧洞，就能建成一座装机 11.25 万千瓦的抽水蓄能电站。为了保护湖区原有的自然和文化特色，电站的设计者们想出一个好主意，在用电低谷时，将经过沉淀过滤的雅鲁藏布江水抽回羊卓雍湖以稳定水位，使“圣湖”的水文、地质、生态属性保持不变。此举大受当地僧俗群众的赞扬。中央为这一工程投资 10 多亿元，1989 年起动工修建，今年可实现第一台机组发电，为西藏长期受能源制约的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同时，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群众烧木柴。牛粪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也将大为缓解。西藏自治区主席江村罗布说：不到西藏，不知这 15 年西藏的发展变化有多大！

1994 年，西藏国民生产总值 42.3 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达 23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5 倍多。农牧业耕作的机械化程度也大大提高，每 15 户农民便拥有一台中小型拖拉机。人均农业机械 0.5 千瓦，基本接近内地水平。

有 3 万多名科技人员在西藏工作，在科技兴农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改变了以前遇到庄稼病虫害只有靠喇嘛念经的老办法。

交通落后的面貌已经根本改变。青藏公路、川藏公路、滇藏公路等主干线已经贯通，乡镇都已实现通车。贡嘎机场、邦达机场已成为西藏现代化的空中走廊，旅游业正在成为西藏的支柱产业。

各县有了卫星地面接收站，电视的人口覆盖率达 40%，许多高档家用电器已经进入群众家庭。

教育也在快速发展，西藏现有各类学校 3500 所，在校生 27 万，西藏群众的科技和文化素质正在迅速提高。

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这是西藏的一大优势。目前的西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不断被挫败。

良好的社会环境为西藏的发展准备了前提，西藏的明天会更美好。

两极分化等于改革失败

社会主义中国有了富人和穷人。

一个大款用上万元买了一件衣服，一个农村老人患了病却不敢让医生开药。贫富差距正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拉大。

邓小平观点明确：“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中国已经出现两极分化吗？民众的看法与学者的观点有明显的分歧。

“马太效应”对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例外？

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富，这条路该怎样走？

中国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了吗？民众用各种例子说明着不同的看法。

例一：初秋是北京，傍晚的习习凉风已经驱走了暑热。一辆豪华轿车开到燕莎商城门前，车上下来一对青年男女，径直走到商城内某外资服装公司的女装专柜前。那位男子问售货小姐：“有没有新到的款式？”售货小姐将两人引到一排货架前，“这些都是前天才从法国空运来的。”你选几件吧。”男子对女子说。一会儿功夫，这位女子选好了两套裙服，男子从西服内袋中掏出一叠人民币问售货小姐：“多少？”“一万零二百元”。男子付款后携女子翩然而去。

例二：一位有相当名气的中年医生，接受了一次宴请。东道主是一个私营公司老板，想请医生为他定期做保健检查。赴宴者仅四人。宴毕结账时医生得知，这一餐花了4800元。其中一瓶“人头马XO”的开瓶费即200元。在回家的路上，医生想起了几天前的一件事：一个咳嗽带喘的老太太走进门诊室，他为老人作了检查，开出透视单、血常规化验单，“您先去做检查，我再给您开药。”老人急忙说：“不查了，大夫看着开点便宜的药就行。我没几个钱，不用查了。”稍顷，老人又说：“算了，药也吃不起哟。”转身就往门外走。他愣了一下，“等等！”他想起自己更衣柜中还有两盒“先锋4号”和几颗“止咳桔红丸”，连忙拿出来塞在老人手里，老人的眼泪掉了下来，落在他的手上。

上述例子并非新闻，而是当今国人随时能耳闻目睹的现实。于是，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纷纷议论：认为“贫富差距尚在合理范围”者有之；提出“贫富差距已经悬殊”者有之；宣称“贫富差距已达两极分化”者也有之。

真可谓，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如果中国真的出现了两极分化，中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老人家看问题不仅看现象，更注重其实质。他说，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就注意到，要防止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那么，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这需要人们作一些理性分析。

由于人类个体素质的差异和追求财富能力的不同，即使是在公正的社会里，贫富差距的存在也是难免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能完全没有贫富差距。

按国际上常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的五等分法计算，以20%的高收入户与20%的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比较，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表明，从1978年到

1994年，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从1.8倍扩大到3倍，农民收入差距从2.9倍扩大到6.6倍。若把城镇中20%高收入户与农村中20%低收入户相比，1993年的收入差距为13倍。这一差距仍低于国际上其他国家贫富悬殊几十倍的水平。显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体居民的贫富差距已明显拉大，且呈继续扩大之势，应该引起各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还没有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

还要看到，当前的这种贫富差距，是在民众拥有财富的绝对量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出现的，贫困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正在不断下降。所以，这种贫富差距不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基础上的，不是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而是在迈向共同富裕道路上先富与后富、快富与慢富的区别，是向前发展中的差距。

在先富者中间，大多数人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致富的；靠非法手段获得财富的只占少数。

虽然以不正当手段致富者是少数，但他们的行为和结果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权钱交易。非法经营者的暴富直接导致了社会分配秩序的混乱，并给社会树立了不良的示范；

暴富者对财富的挥霍、浪费、糟蹋，造成一种远远超越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反社会性消费，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

违法经营、非法致富造成分配领域内的严重不公平，使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萌生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和不满情绪，导致社会价值体系失衡和紊乱，给社会发展埋下了动乱因素。

所以，不能因为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还没有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便对它掉以轻心，漠然置之。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目前已经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

社会主义的致富原则应该包括：勤劳致富、依法致富、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遵循这一原则，保持合理性贫富差距，努力缩小贫富差距扩大的程度，缩短贫富差距过大的存在时间，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要对先富起来的个人征收所得税

“不患寡，而患不均”。小农的宣言曾倾倒多少英雄。

搞平均主义，只能是共同贫穷。

邓小平在全国科技会议上说：我们提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也富起来。

大款们注意了，“要对先富起来的个人征收所得税。”

社会调查显示，60%的公民不知道“800元以上要交个人所得税”。15年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流失超过300亿元。有许多人都认为高收入者不会自动交税。

个人所得税是贫富差距调节器，专家呼吁：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刻不容缓。

中国人发财了。中国人都想发财。

新春佳节，熟人朋友相见，最受欢迎的贺词是“恭喜发财！”国人再也不忌讳“钱财”二字，一串带“8”的数字竟然可以卖几十万元。

近年来，在邓小平“先富带后富”政策的鼓励下，中国告别了“贫穷的社会主义”，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一批批富翁从中华大地涌现，更多的富翁正在孕育之中。据统计，目前我国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者有430万人，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者有100万人，其中还有一些是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据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1993年我国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总额里的30%属于占总人口2%左右的高收入者。

另一方面，我国农村还有约8000万的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城市中因企业停产、半停产而不能领到足额工资，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职工也在增多。

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收入也十分有限。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大学某系教师的工资收入情况令人困窘：教授600—700元左右；副教授500—600元左右；讲师400元左右。加上学校和系上给每个教师发放的约3000元的劳务费、奖金，他们的年最高收入也不足万元。这些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大学教授、副教授们只该拿这么多钱？

教师不属于“先富起来”的高收入层。高收入层主要是由部分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大户、国有或集体企业的承包者和经营者、外资企业和外国驻华机构的中方高级雇员、包工头、经纪人、歌星影星及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员所构成的。一般外企或外国驻华机构的高级职员，年薪均在三万元以上；一些歌星影星“走穴”演出一次，收入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拍一次广告片或影视片的收入，动辄几十万元；某地一集团公司总经理1993年收入达120万元，是该公司一般职工的120倍。

个人收入差别如此之大，中国怎么啦？

邓小平没有错！邓小平鼓励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共同富裕。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阐明他始终一致的观点：“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小平同志对“部分先富”政策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他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所以，针对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他老人家也明确提出：

“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

这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税收是十分有效的贫富调节器。这个调节器用好了，政府就可以通过第二次分配来调整贫富差距，缓解利益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据报载，美国一些百万富翁为了能够少交一些税款，纷纷改变国籍，充当小国公民。如著名康波食品公司继承人约翰·多伦斯三世（拥有 10 亿美元）、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麦可·廷曼均加入巴拿马国籍。其原因很简单：美国税法太严格。美国公民居住海外也得纳税，其中尤以遗产税为重：人死后如果遗产总额超过 60 万就要交税，税率从 37% 开始累进，最高达到 50% 以上，也就是遗产越多交税越多，亿万家产连交几代也就所剩无几了。克林顿主政后，主要是对富人增税，更加剧了富人的担忧。而一些小国却不征或征收很少的遗产税，如爱尔兰只征 2% 的遗产税，所以大富翁们争当小国公民。

由此可见，贫富差距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怎样去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自 1980 年开征个人所得税，当年全国个人所得税仅为 16.2 万元，1993 年达到 46 亿元，1995 年突破 100 亿元，比上年有较大增长。但据专家分析，已征收的税款与应征税款的差额还相当大，这 100 亿元最多只是应收税款的一半。

有记者报导：浙江杭州对 181 个单位进行个人所得税专项检查后，查补偷漏税 151.94 万元；

北京，一次个人所得税专项检查，查出外籍人员匿报收入 414 万元，补缴税款 77 万元；

江苏查出某经营钢材的私营老板，采用一票两开、大头小尾的手法，偷逃税款 77 万元；

湖北武汉，几名文艺界人士的一次演出获得收入 33 万元，应缴个人所得税 11.1 万元，但他们分文未纳，扬长而去……

多么触目惊心的流失！如果将流失的几百亿税款收上来，可以兴建多少个希望小学、扶助多少贫困群众啊！

个人所得税大面积流失，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现有税收征管法规不完善、手段不健全；对高收层的收入缺乏有效的监控，难以使他们足额纳税，形成高收入者较为普遍的逃税现象；征管力度不够，尤其是一些地方领导担心，征收个人所得税会影响吸引人才和资金，擅自减免税政策，等等。

有识之士们提出，要加大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力度。要标本兼治，既要公开处理一批偷逃个人所得税的大案，以对此类行为起震慑作用。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法规、充实征管力量、改善税收技术装备，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等，争取尽快改变个人所得税征收工作，更好地发挥税收杠杆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

公民自觉纳税意识薄弱，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据上海零点市场调查有限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知道 800 元以上要纳税的，竟只占被调查者的 40%，也就是说，有大约六成的中国公民不知道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线！在调查中，有 56.1% 的人承认自己月收入超过 800 元，但其中只有 5% 的人缴纳过个人所得税。零点调查公司的研究人员认为，由于物价上涨及原社会福利开支向居民个人转移，目前月收入 800 元只相当居民中的中等或中等偏低的收入水平，因而应适当上调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线。同时，对公民加强纳税意识的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

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

落后，落后，落后！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它年复一年地同中西部地区联系在一起。

解决 8000 万人的温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地区发展差距过大，会不会影响中国的稳定和统一？

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是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

正视一视差距，努力缩小差距，中西部地区人民在“脱贫”的征程上奋进，也在盼望中央宏观调控的“巨手”能够扶一把。

“光彩事业”已经吸引许多民营企业家的参与。“挺进西部”正在成为企业界有识之士谋求中长期发展的大计。

“西进运动”，到荒原寻求财富。美国当年也有地区发展差距。

一百多年前，美国东部的数不清的工人、农民、流浪汉及无业游民们，纷纷变卖自己少得可怜的家产，倾其所有购置一辆马车，带上全家老小争先恐后奔向一个地方——西部荒野，去拓荒，去淘金，去寻找穷人的天堂。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西进运动”。当时美国的东部是富裕繁华之地，但它只是富人的天堂；西部是穷困落后之乡，但它给穷人们带来希望。巨大的地区发展差距在今天已被消除了。但这一进程耗费了上百年的时间，其间人们为社会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是一部血和泪的历史。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种规律。

中国今天也遇到了地区差距问题。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的自然地理条件差别很大，加之人口众多，发展基础较差，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同地区的不平衡是很难避免的。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4 年全国 29 个地区（缺西藏）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较大。在 29 个地区中有 13 个地区的社会发展总指数高于全国 110.5 的总指数，占 44.8%。有 16 个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占 55.2%。位居前列是北京、上海、天津的指数分别为 181、178 和 167，而排在第 21 到 29 位的是河南（96）、安徽（92）、新疆（91）、四川（90）、青海（86）、宁夏（78）等、排在最后的贵州仅得分 54。社会发展总指数包括环境、人口、经济基础、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卫生保健、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社会治安等十项社会发展领域的指标。从中可以看出地区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否使缩小差距、共同富裕的进程快一点呢？

邓小平是一个善于驾驭大局的政治家，他深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他老人家明确指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这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然而，讲究实事求是的他为解决发展差距问题并没有急于求成。

他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这里他十分

慎重地用“要研究”三个字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和重视，但并没有急于得出具体答案。

“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我国还没能普遍实现小康，但东西部差距的迅速扩大，要求决策者将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上议事日程。

怎样正确地解决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问题？从全局看，有两步关键的棋需要着手：一是加大中央权威的宏观调控，二是在落后地区建立新的发展机制。

中央的宏观调控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缩小差距的办法很多，如靠先富起来地区的带动效应，靠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扶持政策，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靠加强落后地区同沿海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和横向经济联合与技术协作，靠先富地区多交税并通过社会再分配来支援落后地区的发展，等等。但这些办法的实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条件，即中央权威的宏观调控。因为上述办法都涉及到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既要防止差距拉大，加剧利益冲突；又要防止行政干预过强而导致发展活力受到抑制。在社会主义国家，保证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的公平，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

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按优化原则向发达地区倾斜的同时，需要借助中央权威的宏观调控，通过社会的再分配调节功能弥补初次分配中的某些缺陷，体现效率优先基础上的兼顾公平。

先富的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共同发展，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按照工业化的一般规律，我国工业化的过程，应该有序地走过轻工业——基础工业——重加工业发展阶段，然而，由于建国初期特定的政治环境，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政权和民族独立，政府不得不在一个典型的农业国的基础上，依靠对农业的自我剥夺来完成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并由此实施了超越前两个阶段的重工业超前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初期是成功的，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其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失衡和扭曲。既然这一结果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的，理当由政府来纠正。这就是依靠政府宏观调控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一大依据。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已经作出部署，提出了包括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立项目、鼓励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等措施，加强对不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

发达地区在解决地区发展差距方面应该有所作为。

深圳一位领导人讲得好：先富地区帮助后富地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先富与共富是辩证统一的。先富是共富的前提和动力，共富是先富的目的和归宿。

要看到，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民，不仅没有牺牲共同利益，而且对发展共同利益做出了贡献。同时，先富帮后富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内在要求。我们搞市场经济，不仅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更要对贫困地区采取有效的扶持和帮助政策，鼓励先富带后富，这是改革和发展的要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因此，先富地区应积极履行这一责任和义务，切实为后发展地区的经济振兴提供帮助和支

持。

先富地区带动和帮助后发展地区，一方面是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主要是与后发展地区进行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也就是说，实现共同富裕也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要通过深化改革，在各地区之间形成稳定的经济联系，才能更好地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实践证明，先富地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与后发展地区的资源优势相结合、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进行开发式扶贫等方式都是行之有效的。

另一步关键的棋，是促使不发展地区建立新的发展机制。最重要的是尽快突破落后地区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我国西部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相对封闭、贫穷落后的一元社会结构，随着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各种先进的社会经济要素的投入，低效益均衡的一元结构为极为不均衡的二元结构所取代，形成了二元结构的明显冲突。在这种条件下，光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是不够的，光是投入可能出现更大的负效应，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指出：“增强群众的市场经济意识，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逐步形成主要依靠自己力量脱贫致富的机制。”这就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关键一环。

正确的决策必然带来巨大的进步！

人们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的致富热潮已经开始涌动。

那些到沿海打工的人群中，一部分已返回故乡，成为兴办乡镇企业的“带头雁”。陕西、四川、甘肃等地的干部到江苏、山东、北京等地挂职锻炼后，已在带领家乡人民解放思想、加快发展上创出佳绩。在云南瑞丽，在新疆伊宁，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中俄边境，日趋繁忙的边境贸易活动向人们展示：中西部地区的人民正在急迫地登上飞驰而来的市场经济的列车。

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援也在加温。这里不仅有政府自上而下组织的支援活动，也有科技人员、企业家和经贸界人士自主参与的支援。在胶东，沿海一家企业主动向太行山地区投资之亿多元，在那里建设一座钢铁厂，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又扩大本企业的规模效益。先富起来的江浙一些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提出“挺进中西部”、“抢占制高点”，分别用自己的资金、技术、人才与中西部一些地方的资源、能源、劳动力优势相结合，进行联手开发，共享利益。这些有识之士的动机，已不仅是“为穷兄弟做好事”，单纯尽义务，而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以双方互惠互利为原则，力求在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的同时，自己的事业也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

多种形式的民间扶贫也在迅速发展。江苏华西村为贫困地区培训人才，已连续举办了五期培训班，还提出到2000年要帮助10万人脱贫，并使其中1万人达到小康水平。

浙江萧山万向集团的董事长鲁冠球提出了“西进计划”，打算投资1亿元以兼并、合资、收购等市场手段去开发西部市场，再造一个或数个万向集团。

1994年4月，在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上，10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向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发出了《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的倡议，提出每年要为“老少边穷”地区培训1000名人才，开办100个项目，开发10种资源。这项被称作“光彩事业”的扶贫倡议，得到了全国各地民营企业家的热情响应。已有不少企业家通过捐赠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愿，有的提供的捐款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

分三步走，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世界舆论普遍认为“整个中国都在前进”。

《纽约时报》承认：“尽管发出种种预言，中国经济在1989年动乱后仍然在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的中国以雄健的步伐登上一个又一个高峰。一位美国评论家直言：“世界最成功的市场改革在中国”。中国经济显现的活力，使外国企业家争相“跳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列车”。

政治家显得冷静些，法国一位政界要员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值得研究借鉴”。

“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邓小平为中国设计的发展目标。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加速发展。

海外人士猜测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两个目标”的背景。

1992年1月12日，美国纽约《亚美时报》一篇文章指出：正当苏联面临大饥荒，美国经济大衰退，1990年世界经济平均零增长的时候，中国大陆出乎世人的预测，自1989年以后经济成长率稳增6%同时维持了最低的通货膨胀率2.1%，外汇储备和外资注入猛增，对外贸易盈余100个亿，外汇储备400多亿美元。造成90年代世界的一个令人费解的二律背反现象。

《香港虎报》报道，中国政府成功地出售1000亿人民币的国库券，这表明“中国普通百姓目前对经济前景十分乐观”。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由于北京自1993年以来实施的计划和采取的一些措施，“为北京开创了新天地”，“呈现了较稳定、持久发展的希望”。

海外舆论都在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的发展。

外国人的观察是有根据的。近十几年来，中国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一步一步地向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这个发展蓝图就是：分三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宏伟的设计，耗费了小平同志大量心血。

多少年来，邓小平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步骤。

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中，大平正芳问道：“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

邓小平“想了一分钟”后，郑重地提出了一个对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都要产生重大影响的设想。

他对大平正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收入平均达到一千美金，我们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就算是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国家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我只能说，中国也还是一个“小康”状态。

就这样，“一千美金”、“小康状态”这一符合中国发展实际和可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开始以定量化、形象化的形式在中国出现，并且逐渐成为激励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

此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沿海地区经济的迅猛增长，使邓小平坚信，本世纪末我国实现小康是完全可能的。他准备为中国描绘一幅

更为完整的蓝图。这个蓝图要对下一个世纪作考虑。

1984年4月，邓小平会见英国客人时，提出了我们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后，还要在下个世纪的30到50年内，达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1987年4月，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时，对这一战略目标作了更加明确的表述：达到小康水平后，“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总产值就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1980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居世界前列的。”

显然，此时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已经形成了。

几天后，邓小平同志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进一步对“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阶段目标作了阐述。他说：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将近九年的时间，算是第一步。“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穷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这段话是邓小平“三步走”战略发展成熟的标志。后来，“三步走”战略写入了中共十三大报告，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89年9月，当邓小平决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时，他再次表示了对实现战略目标的关心，他充满激情地对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说：“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

“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

几年之后，他以政治家的执着，仍然关注着“第二步”的实现情况。他想知道自己制定的“三步走”战略的实施情况。

1992年，他老人家以88岁的高龄，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1月19日，邓小平在夫人卓琳和其他家人的陪同下，乘专列来到深圳。他到达迎宾馆桂园后，稍事休息，便对深圳市负责人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几天的视察，他老人家看到了沿海经济特区的迅猛发展。而这些发展又一次证明了我党路线方针的正确性。他十分高兴地说：“在这短短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他充满希望地对广东的领导同志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邓小平的视察南方的讲话似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北，吹出一个新的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浪潮。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是：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中国在经历 46 年征程后，可以满怀信心地跨向从 2000 年开始的新世纪了。

中国将以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面貌进入新的世纪。

五中全会提出了两个催人奋进的奋斗目标：

“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 年，在我国人口将比 1980 年增长 3 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10 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 15 年的努力，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将再上一个大台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将取得明显的进展，为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目标已经明确，战略已经制定，只要坚韧不拔，奋力拼搏，必将到达光辉的巅峰。

中国是个大市场，要很好利用

中国是一个大市场。这是中国的一张王牌。

1995年开年不利？美国要就知识产权问题“制裁”中国。

九轮艰难的谈判，中美双方剑拔弩张。世人一致认为：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

戏剧性结果出现，2月26日午夜23点57分，新华社发出电讯宣告，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协议！

对此结果，江泽民说“表示欢迎”，克林顿说“表示高兴”。都在庆幸危机的消除。

邓小平说得直率：要很好利用中国这个大市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1995年2月26日，中美关系史上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历经20个月、九轮艰难磋商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终于从剑拔弩张走向了日夜磋商；又从紧急磋商、争论不休，走向了高举酒杯的庆祝会。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如此艰难，美国几度扬言制裁，最终为何又“化干戈为玉帛”？这其中的“奥秘”在哪里？

美国人扬言要制裁中国，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知识产权在中国受到了严重“侵害”。

美国人恼火，也有他自己的道理。

京、津、沪、穗等中国大城市的街头，常见不少地摊向过往行人兜售激光唱（视）盘。这种街头“CD”是假冒伪劣产品，但因其价格确实“诱人”，销路颇好。

这只是被美国人认为侵犯了他们的知识产权的一个小例子。

让美国人感到恼火的还有：城镇录像厅内放映着非法进口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和其他厂家的录像；有些计算机软件被个人复制；还有美国企业的商标、美国人发明的工业产品设计……

美国人为此不只一次地大声吼叫：要对中国实施制裁！

中国“坚决反对制裁”，并非我们不敢面对事实、否认有侵权行为；关键是美国认为中国政府有“纵容、包庇”之嫌，并一口咬定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状况“毫无改善”。这是中国方面不能接受的。相反，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对中外知识产权，一视同仁，均坚决予以保护；并不断采取措施，打击违法活动。

据中国28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仅1994年，全国各地收缴非法侵权盗版音像制品467.3万盒（张）。其中激光唱盘181万张，激光视盘3.5万张。事实证明，中国在保护中外“权利人”的知识产权问题上，态度一向坚决。

1994年12月，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又在北京举行，美方代表以两点相威胁：其一，将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其二，将不支持中国复关。

12月31日，美国政府以所谓中国侵犯其知识产权为由，单方面宣布：中方若不能在1995年2月5日前满足美方提出的要求，则美方将对中国实施贸易报复。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公布的这份报复清单中，开列了中国出口美国的电子、鞋、玩具、箱包等产品，总价值约合28亿美元。其报复方式，主要是向上述中国商品征收100%的高额惩罚性关税。

1995年2月4日上午，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制

裁措施将于 2 月 26 日开始生效。消息迅速传向全世界。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外经贸部发言人在北京宣布：中国将实施反报复！

中方宣布了反报复清单：1. 对原产于美国的烟、酒、化妆品、CD 盘、照相胶卷、程控电话等征收特别关税（税率为 100%）；2. 暂停进口产于美国的电影片、电视片、录像、激光视盘；3. 暂停与美国音像制品、商业软件联盟的合作关系；4. 暂停受理美国音像制品制造公司在华设立分支机构；5. 暂停受理美国化学、药品制造商在华提出的申请；6. 暂停与美国大公司正在进行的大型汽车合作项目；7. 暂停批准美国公司在华设立投资公司。中国这份反报复清单将于美国制裁至日起自动生效。

表面上，美国咄咄逼人、剑拔弩张，其实美国也害怕中国。

首先，美国知道自己也有理亏之处。

北京有专家称，美国专利保护制度就有双重标准：美国的专利申请，对美国人实行的是“发明在先”原则；对外国人在美国申请专利，则实施“申请在先”原则（外国人去申请，他来个不批准；等到美国人申请之后再讨论你的申请，自然可以合理拒绝）。

然而，美国却要求中国修改民事诉讼法第 250 条中的有关规定，要求当知识产权案件的权利要求人是外国人时，其提出的诉讼申请必须在 6 个月内审结。但美国在对同类案件的审理时，并没有规定审结的时间限制；美国不少知识产权的案件也是三年、五年，甚至耗时十年才解决。美方要求中国在 6 个月内审结，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己之不“正”，何以“正”人？

其次，中国这个大市场，实在太诱人，美国害怕丢失。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贸易增长势头强劲，1979~1993 年 15 年间，每年平均以 16% 的增长率上升。其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位次，1979 年为第 32 位，1993 年提升到第 11 位。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也一直呈增长趋势，1979 年到 1993 年间，外商在华投资项目累计已达 17 万个，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 639 亿美元。其中，仅 1993 年中国就批准了外资项目 8.3 万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257 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现在，全世界都在看好中国市场。根据预测，2000 年中国的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将达到 4000 亿美元，从 1995 年起到 2000 年进口订货累计将达到 10000 亿美元。这个大市场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

就中美贸易而言，据中国方面的统计，1994 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 35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8%。其中，进口增长了 30.7%，出口只增加了 26.5%。此外，截止 1994 年底，美商在华投资项目已达 1.6 万个资金实际投入累计为 70 亿美元。

如果美方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措施和中国的反报复措施都同时生效，其受害者将是谁？

据有关人士分析，美方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如果实施，受害者将是：在美经销报复清单中开列的销售中国货物的美国商人；香港或其他地区的中间商；中国生产上述产品的厂家及其工人；希望在美国购买中国货的美国消费者。

如果中方的反报复措施生效，原产美国的万宝路烟、柯达胶卷、好莱坞电影等，都很难进入中国市场了。

更重要的是，美国将失去目前被全世界都共同看好的中国这个大市场。

因此，美国的舆论界对美国政府宣布的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的决定做出

了强烈反应。其中最激烈的意见称：美国没有必要为了保护好莱坞电影厂商利益而与世界上最具有潜在购买力的中国大动干戈；贸易战的结果将使美国的福特、克莱斯勒（汽车），波音、麦道（飞机）等生产企业，受到丧失订单和市场的巨大打击。

2月19日，“阴云密布”的谈判会场终于传出“转晴”消息，中美双方宣布，“磋商已取得进展”。

2月25日，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国务委员宋健在北京会见了美国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

2月26日午夜时分的“23:57”，新华社电讯称：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成功。中国人松了口气，美国人松了口气，全世界松了口气。

2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世界著名电子大公司——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加利·吐克。江主席说，对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同一天，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声明，对中美达成协议“表示高兴”。

3月13日，江泽民会见了坎特，高度赞扬了两国就知识产权谈判达成的协议；算是把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推向高潮，划上句号。

邓小平说得好：“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要加强同欧洲的经济联系

世界越来越小。

强盛与开放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用生硬的方式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

会学习会吸收的民族才是有发展前途的民族。列宁的著名公式：社会主义 = 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邓小平要求中国全方位开放，“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

中国的东海岸如同一张拉满的弓，万里长江好像一支利箭，正在射向太平洋。

面对白热化的国际贸易战场，中国企业的“老总”们说，我们也要走出去。中国企业开始了“跨国行动”，久居农村的“老乡”变成了“老外”。现代文明在相互交流中发展。

资产阶级以其特有的方式开拓世界市场，僵化和封闭挡不住商品货币的大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仅从道德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是不公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这样做。

历史告诉我们，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社会分工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发展成为国际分工。它使地球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地区，为另一小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地区服务。在此基础上，国际交换的范围不断扩大。对先进国家来说，国际交换商品已经是它自身再生产不可缺少的环节。

于是，出现了世界货币，又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

对不发达地区来说，这是不公平的。但这是历史进程中诸要素构成的一个阶段，没法绕过去。历史的结果只有等历史自身的发展来改变。

二战后，随着生产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各国经济对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特别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兴起，使国际分工向新的深度扩展。战前那种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分工，逐渐为工业国之间、工业内部不同水平之间的分工所代替。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已不限于国际商品交换，而且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国际经济联合等渠道，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建立和维持。

这样，一国的再生产不仅要在本国范围内寻求优化配置，而且要在国际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获得快速的发展。

孤立和封闭不可能发展。

邓小平正是在洞察战后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科学论断。

他在 1992 年视察南方时，再一次深刻地阐明了这一思想。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

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作为我党老一辈革命家中的一员，邓小平对中国近代以来长期落后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明朝中叶到鸦片战争的近 200 年的专制统治和闭关自守，是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重要原因。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总之，三十年的经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要开放就要全方位开放。邓小平明确指出：“开放是对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他在这里的“各种类型国家”是指：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一个是指对苏联东欧国家开放；还有一个是指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开放。

因此，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

但客观地说，这三类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实力是大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实力最强，科技水平最高。据统计，占世界人口 15% 左右的西方国家，占有世界产值的 72%、世界贸易的 75%、世界资本输出额的 96%，世界新科技成果的绝大部分，并在各类国际经济组织中居于统治地位。因此，邓小平在强调开放的全面性的同时，明确指出西方国家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点对象国。

美国对中国的开放是十分重要的，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它拥有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发展中美经济和科技交往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但是，美国的政治家们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总是把与中国的交往看作“输出价值观”和“促进中国变革”的途径，常常在经济活动中附加一些令中国难以接受的条件。所以，作为一个政治家，邓小平提出，我们在同美国打交道的同时，广泛发展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策略。

欧洲对中国很重要。战后，欧洲经济稳定发展，在世界的地位迅速提高。欧洲，尤其是欧洲的发达国家可以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东西。

邓小平正确地强调：要加强同欧洲的经济联系。

德国是欧洲第一经济大国，1993 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达 31071 亿马克（合 18797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进出口额分别为 3270 亿美元和 362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中德关系发展迅速，政治上高层互访频繁，经济技术合作迅速增多，在贸易方面，德国已成为我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1993 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 100.1 亿美元，占中国与欧洲贸易额的 40%。

1993 年 11 月，德国总理科尔率 40 多位企业家来中国访问，中德双方签订了约 40 亿美元的合同或意向书。截止 1993 年底，德国在华投资企业已有 569 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大企业十分看好中国市场，纷纷前来投资合作。

成立于 1984 年的中德合资企业——上海大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桑塔纳轿车的产量已经超过 10 万辆，计划到 1998 年突破 30 万辆。

西门子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已超过 20 家，并准备逐年增大在中国的投资，每年新建 10 个左右的企业。

奔驰汽车公司也计划在中国建几个大型合资企业，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

市场。

1994年6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李岚清带领一批高级官员及大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访问了奥地利、德国和罗马尼亚。在访德期间，李鹏总理与德国领导人除就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会谈外，还会见了德国企业界人士，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文件和投资意向书。

西欧的政治家和企业家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了欧洲与中国贸易发展存在的差距。因为与中日、中美贸易相比，中欧贸易的发展还远远不够，双方在经贸合作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西欧一些分析家指出，到本世纪末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将达到一万亿美元。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在这方面，西欧是有优势的。西欧不会放弃这个市场的。

欧共体委员会1994年7月通过了一个题为《走向亚洲的一项新战略》的文件，主张“提高欧洲在亚洲的作用”，“加强欧洲在亚洲的经济存在”。德国外长金克尔也强调，德国和欧洲必须同亚洲地区“接轨”，德国的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德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

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中国与世界正在融为一体。

开放，不仅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也需要中国走向世界。在世界各国的10多万家“三资”企业在中华大地上落户的同时，中国人也在迈出走向世界的大步。

中国经济“跨国界行动”已经开始。

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的决策者们，为了使我国钢铁产量能够满足现代化建设需要，把眼光投向了外国。他们到印度、巴西、非洲去找矿。最后，在澳大利亚的佩斯发现了品位高、投资少的矿山。于是与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公司联合投资2.5亿美元，合营开矿。现在，这个矿山已占我国进口矿石的1/4。

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则是到海外去我市场。他们与船王包玉刚先生共同成立了国际联合船舶投资公司，又在美国设立独资的华运公司，在加拿大设立分公司。目前，该公司已经开辟远洋航线30多条，形成了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全球性运输网，每年接揽其他国家的货物1000万吨以上。

农民也走出国门，把生意做到了外国，“老乡”变成了“老外”。江苏张家港西张乡农民兴办的贝贝制鞋集团，闯入了香港、美国、罗马尼亚、德国和英国，创办了7家跨国公司。山东烟台市新桥村农民在俄罗斯的布拉格维什市中心，购下1万平方米的50年土地使用权，建起了综合交易市场。据了解，目前由农民创办的各类海外企业已达2000家，外国人则在中国人开办的这些工厂、商场、贸易机构、饭店“打工”……

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使地球变得像一个小村庄。各国经济的交往、竞争更使这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在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走向中国。

市场和计划结合起来更有利于发展

活力与秩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中国政府用重金征求国外专家意见，每人每天 4000 美元！

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自由和活力，也离不开权威和秩序。“管得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已是过时的观点。

二战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再仅仅充当社会经济生活的“守夜人”。

邓小平对美国企业家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机场上空的飞机正在播音：“下面是马来西亚政府通告：凡携带毒品进入马来西亚者，将被判处死

刑”。多吓人的警告。新兴工业化国家重视运用“看得见的手”。

“亚洲第五条小龙——马来西亚注重权威和秩序。

1985 年 10 月 2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的会客厅里，邓小平正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的客人。坐在邓小平右边的主宾席上的是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先生。格隆瓦尔德对中国的发展十分关注，对邓小平尤为钦佩，他此次率团访华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深度报导。

格隆瓦尔德以职业记者的方式，直截了当地提问：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要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现在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你们准备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简明地答道：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我们党有信心、有能力逐步消除这些消极现象。

格隆瓦尔德语锋犀利，紧追不舍：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

小平同志淡然一笑，十分明确地回答：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这是多么精辟的见解。

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统得太多，管得太死，束缚了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资本主义模式却又过于分散，忽视了必要的政府干预。多少年来，人们都是在政府和市场两者之间作取舍和权衡，或强调市场作用而淡化政府作用，或是相反。一位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就曾说过：“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当为这一取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人们才醒悟过来，“市场 + 国家”，这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佳抉择。

谁也不会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经济和社会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西方国家普遍从战前资本主义发展所遭到的二系列重大挫

折和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加强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其典型表现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盛行。这种干预的效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通过政府对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直接干预，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三大弊病的危害，即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结构失衡和社会的极大不公。二是各国政府之间加强了相互协调，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可以说，“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并用，缓解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促成了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有一位学者说：“政府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把资本主义从死亡线上救活了”。

罗斯福用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凯恩斯主义，将美国从 30 年代深重的经济危机中带出来，使美国迅速复兴，得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一极力，进而，成为战后世界的头号强国。

凯恩斯主义在 70 年代走入了困境，代之而起的众多学派各抒己见，或主张政府只能充当“裁判”，或力主恢复资本主义本身的“价值”，或要求政府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不管学术理论界怎样争论，西方国家谁也没有回复到原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仍然在国家与市场的结合上进行新的实践。

事实上，1989—1991 年世界在变动后，新的国际形势还进一步强化了国家与市场的结合。在新形势下，各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和科技，谁在高科技领域领先，谁就能在国家竞争中领先；新技术革命使各国实力变化更加迅速，后发展国家有可能借助科技力量赶超先进，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在经济竞争中，各国纷纷推行“本国利益优先”政策，贸易战愈演愈烈，区域集团化和经济全球化两股潮流并行……所有这些，都要求各国加快发展，提高本国竞争力，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仅仅靠“着不见的手”，靠企业的微观基础是不够的。

二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国家与市场结合的重要性。

后发展国家要追赶现代化潮流，离开了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和干预是很难成功的。德国上个世纪的后来居上、日本战后的高速发展、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无一不是重视并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这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因为后发展国家开始步入现代化征程时，世界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所占领或控制，这些既得利益者不仅策划了游戏项目，而且制定了游戏规则，后发展国家要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只有形成集中的力量才有可能，所以必须借助国家的组织和策划。

亚洲第五条小龙——马来西亚在 80 年代的崛起，进一步论证了国家力量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马来西亚近年来的经济成就引起世人瞩目，1988 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 9%，居东盟之首，在亚洲仅次于中国。人均产值从 1988 年的 1830 美元增至 1994 年的 3406 美元，是泰国的 1.5 倍，印尼的 5 倍，其经济竞争力已超过韩国而跃居亚洲第四。

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国际劳工部副部长郭诛镇先生说：政府对社会整个经济活动都进行严格的监督。凡是国家控有股份的企业，都由国家委派的会计主任进行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监督。国家还设立总稽查，“这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机构，从企业到政府机关的事都要管——比如我的司机，每天去接我上班，从他家到我家这段路该不该由国家负担，都得由国家会计主任来决定”。

企业自主经营、政府帮助企业赚钱、企业接受政府严格而有效的监督。这就是马来西亚的市场经济模式。

马来西亚官员的结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需要！不要以为市场什么都能做！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才刚刚起步，应该全面地理解和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应该考虑中国的自身实际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实际，切不可把人家已经修正过的或抛弃了的旧理论当作标准，束缚了自己的发展。

1993年6月，为了少走弯路，中国政府破天荒地耗费300万元，重金征求国外专家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

这次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是层次高的非公开会议，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与市场的作用”。应邀与会的代表是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法国、印度以及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家和组织的高级专家。会议开了三天，各路专家提供了许多很值得中国认真思考或采纳的意见和建议。中国政府为每位专家每天支付报酬4000美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知识和学问是值钱的。

1995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认真总结了1992年以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发展方针、目标和思路。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强调指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二者缺一不可，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照着这样的认识做下去，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一定能有更好更快的发展。

市场经济不是自由经济

市场经济不是“自由”经济。

政府要管好该管的事，搞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需要。

邓小平说，美国和日本都有计划嘛。西方政治家认为“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它们从来没有放弃对农业的干预。欧共体国家对农业付出了巨额补贴。意大利政府把公共汽车票价看作“政治价格”。

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该做些什么？

近几年，有一些人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自由”经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有的地方不顾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肆无忌惮地制假贩假牟取暴利，却声称：只要有人买就可以卖；有的地方盲目搞开发区，结果连外商的影子也见不到，却浪费了不少耕地；有的人对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置若罔闻，见了红灯也往前冲……。

其实，市场经济严格地说就是法制经济，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都应接受政府的协调和控制。搞市场经济，当然主要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还得做它必须做的许多事。

市场机制有其不可取代的优越性。

市场机制也有其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例如，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社会总供需的失衡，难以协调公平和效率的统一，难以保证公平竞争的环境，它还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机制的这些缺陷，需要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干预和调节，否则便难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邓小平同志的观点是明确的，“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

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

日本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任何一个了解日本发展史的人都会看到，日本战后创造的经济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充分运用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正是在政府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指导下实现的。日本政府中有个“部级”机构叫企划厅，主要任务就是制订计划、预测形势，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得力部门，其他如通产省、大藏省也承担着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和干预的职能。

1994年5月，我国沿海X公司与日本两家商社洽谈一笔大宗出口业务，这两家日本商社都很想得到这个合同，于是形成了竞争，使X公司有可能从日本人的竞争中获得更高的利润。谁知几天后形势发生变化，两家日本商社的关系由竞争变成了合作，立场高度一致，反倒使X公司陷入被动。原来，日本通产省获知本国公司的竞争情况后，立刻派员赶到现场，连夜协调两家商社的立场，使其联合起来对付X公司。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是个标榜自由竞争的国家，政府连工业部也未设立。但这丝毫不意味着美国对经济活动放手不管。

概括地说，发达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三项：注重税收的调控作用、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重点调控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

税收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不仅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且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通过增税或减免税等方式来指导产业投资方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控制经济总量平衡。美国政府以所得税为主要财源，1992年政府的税收总额中，个人所得税占43.7%，公司所得税占9.2%。德国政府的税收种类繁多，税率也很高，并通过税收杠杆刺激储蓄和投资，如对加速折旧和公司保留不分配的收入免征税，以鼓励企业增加投资。还对钢铁、煤矿、电力、住房、海运等基础产业实行减免税，刺激这些行业的发展。

中央银行在发达国家一般具有很大的独立自主性，是国家整个金融系统的决策权威机构。政府也注重通过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这方面的主要措施有：通过印刷和发行新钞票的数量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发售政府债券控制市场货币流通量；制定商业银行准备金比例以控制其信贷发放量；改变利率或贴现率以控制通货膨胀和对产业投资方向进行控制，等等。

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战略性产业，西方国家也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最为典型的是它们对农业的态度。

西方政治家们认为，农产品是一种对内稳定政局、保障食品安全，对外占领市场、争夺主导地位的重要武器。因此，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把农业完全交给市场，而是以各种方式给农业以大量补贴。保证农业的正常发展。

美国农业政策的重点是保障食品供应、稳定农产品价格和保证农民收入。美国通过立法规定农产品的保护价，给予农民价格补贴。1992年美国政府的农业补贴为150亿美元，农场主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政府的补贴。

日本政府在农业上也舍得花钱，农业预算占国家总预算的5~7%，有80%的农产品都可得到政府某种形式的补贴。如农田水利补贴、农业现代化设备补贴等。政府对粮食实行价格保护，由政府确定小麦、大米的价格，如果市场价格太低，则由政府将粮食“高价买进，低价卖出”。

欧共体国家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也实行巨额补贴。据欧共体的一份资料说：“发达国家认为帮助农业是必不可少的，以确保农业有一个与其他经济部门类似的收入”，相反。“发展中国家则对农业部门较少干预”。1992年以来，欧共体每年都给予农业补贴，农业方面的预算一直占欧共体预算的大部分，最多时达70%，每年都要为此付出400多亿美元。

为了使这笔数额巨大的补贴能够切实产生效果，欧共体专门建立了一个农副产品价格保障体系，即每年给主要农副产品制订最低价格，这个最低价格其实是生产成本最高的成员国的价格。谁生产得越多得到的补贴也就越多。所以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这项政策实行了10年，到1973年欧共体实现了农副产品自给。此后，随着副产品的积压增多，欧共体对原有政策进行了调整。从1993年起改变了对农业的支持方式，不再补贴农副产品价格，而是把补贴直接落实到土地和牲畜头数上，即以现有的总产量和价格为基数，土地退耕、农副产品价格下降等所造成的损失都将得到补贴，而多生产的产品不再进行补贴。

正确的农业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目前欧共体12个成员国有人口3.4亿，但农民仅有1000万，如此少的农民养活那么多的人口，靠的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扶持是分不开的。

政府要管物价。物价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密切，西方政府对物价问题从来不敢掉以轻心。意大利政府对物价的管理是十分具体的。它把物价分为5类。第一类是自由价格，政府完全不干预，商品有服装、鞋类、水果、蔬菜、家用电器、汽车等。第二类为政府监督的价格，商品包括食品和药品，其价目表必须送政府有关部门备案。一旦发现某种商品价格过高，有关厂商必须说明理由，否则将予以罚款处理。第三类是政府控制价格，如燃料、汽车保险费等，由政府规定最高限价，任何商家均不得超越。第四类是政府指定价格，如电费、煤气费、电话费等，未经许可不得变动。第五类是“政治价格”，包括城市公共汽车、电车和国营铁路的票价和运费，其亏损由政府补贴。

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无不包含着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

马克思看到了这个现实：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1979年，邓小平对习仲勋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出一条血路，冲破封闭。多么悲壮而英明的决策。

中国，终于敞开长期关闭的国门！

中国，从此大步走向世界。

早在一百多年前，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就以他深邃的思想和智慧的语言论断：“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史，无不包容了世界各民族文明的相互渗透。

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的雄汉盛唐，就是以其宽阔的襟怀，去拥抱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地中海文明的。

始自公元前二世纪，出西域、叩中亚、穿越大漠洪荒，直抵地中海东岸长达7000公里、历千余年而不衰的“丝绸之路”，无疑是古代和中世纪连接人类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无以伦比的纽带。

遗憾的是，从清朝康熙年代至鸦片战争，中国长达二百余年的闭关锁国，结果导致愚昧落后。

邓小平说：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

于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再度推开了尘封网结的窗门，去延揽八面来风……

早在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邓小平就顶着“四人帮”掀起的极左狂潮，明确提出中国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

粉碎“四人帮”以后，刚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又明确提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于是，一个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来引进、吸收国外的资金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中国经济的重大决策，在70年代末期制订出来了。

1979年4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广东省委原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谈到要发挥广东的优势时，邓小平提出了办特区的问题。他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在当时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啊！

邓小平，这位历经了人生各种坎坷的老人，心里非常明白要走出这条“血路”的艰难，但他心里更明白：面对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中国经济，必须杀出这条血路，走出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的旧天地，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吸取

国外经济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并通过搞好经济特区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

为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为了中国未来的富强，邓小平——这位伟大的战略家，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谷牧带领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领导共同研究办特区的问题。考察组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确认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具有建立经济特区的诸多便利条件：

——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风景秀丽；对发展旅游、住宅业，对吸收侨资、外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位于东南沿海，港口良好，厦门有通商的基础，深圳、珠海毗邻港澳，对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扩展对外贸易，获取国际经济信息，考察现代资本主义都非常便利。

——华侨之乡，对吸引华侨回国办企业、投资、支援祖国建设影响深远。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当时称“出口特区”。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进一步要求将深圳特区建成兼营工业、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等项事业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

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

1981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广东、福建两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中，规定了办好经济特区的10条政策措施。

1982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广东、福建两省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指明了特区的发展方向。

这样，经济特区终于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为中国经济的起飞杀出了第一条血路。

试办经济特区初战告捷，犹如一股春风扑面，全国为之振奋；更为中央高层决策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理论与实践的依据。

邓小平一再告诫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沿海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对外开放要“放胆的干，加快步伐，千万不可贻误时机”。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由北至南的14个港口城市，从而形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沿海黄金地带。

1985年1月25日至31日，国务院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座谈会。2月，中央正式决定把这三个地区开辟为内外交流、城乡渗透的开放式的文明富裕经济区，使沿海和内陆互为补充，以带动内陆经济的起飞。1988年春，中央开始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开放市县增加到288个，开放面积增加到32万平方公里，开放人口增加到1.6亿人。同时，正式确立海南省办大特区。

尔后，规划350平方公里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力图将大上海建设成太平洋西海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以龙头之势促进长江流域的经济腾飞；与此同时，积极参与东北亚经济圈，贯通连云港至鹿特丹世界第二条欧亚大

陆桥，大力拓展对东欧各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经贸活动；至此，由沿海开放，进一步推进到沿江开放和沿边开放：

——以上海浦东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芜湖、九江、武汉、岳阳、重庆等城市。

——东北，开放黑河等四个沿边城市，积极发展同独联体国家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西南、西北，再开放凭祥、瑞丽等4个沿边县，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1992年5月，又决定对内陆省区的省会、区府城市在吸收外资项目上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加快内陆省区的对外开放步伐。

至此，中国一个全方位、多层面的对外开放大格局已然形成……

第一个层面，是经济特区。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第二个层面，是14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

第三个层面，是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区域，也是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港口城市的依托腹地。

第四个层面，是沿长江线、沿边境线、沿主要铁路和公路干线构成的对外开放地带，这一沿“三条线”的开放带把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向周边邻国和内陆腹地。

第五个层面，是内陆省会、区首府和计划单列市及其开发区。这是广大内陆地区实施全面开放的辐射点。

上述五个层面，在全国构成了由点、线、面联系和覆盖的，有重点、有层次的整体对外开放格局。

中国，终于敞开了长期闭锁的国门！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

特区是个窗口

本世纪40年代，爱尔兰人创办了“香农特区”，这也许是世界最早的特区。

二战后，从欧洲、亚洲到大洋洲，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科技工业区等各类经济特区已达数百个。

“特区赚内地人的钱！”有人这样说。

经济特区该干什么？或者说，经济特区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关系是什么？

邓小平把特区当作中国的同外界联系的“窗口”：它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

纵观一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特区”始自本世纪40年代爱尔兰人创办的香农特区；尔后，从欧洲到亚洲到大洋洲，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科技工业区、自由港等名目繁多的各类经济特区已达600多个。然而，它们都与本国的经济几乎完全割断了联系，一般只是单一功能，仅限于区内贸易或加工，吸引外资开办实业激活区域经济而已。

中国创办经济特区，旨在种一块试验田：对外，既可以走向世界；对内，又可以带动全国——而最终要让这颗种子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邓小平把经济特区的功能概括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

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自从我国创办经济特区以后，它就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国家的前进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所，先行一步，探索一条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道路。所以，邓小平把特区比喻为“窗口”，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它同全国的关系。

特区是技术的窗口。

当今时代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而这恰恰是我国的不足之处。长期以来，我国的企业生产设备十分陈旧，技术相当落后，在国际上，我们的产品打不开市场，无法加入到国际经济活动的行列中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便尽快地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特区正是我们与世界上发达国家联系的窗口，从特区中，我们可以更好地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

深圳市特别注重引进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和各类专业人才。创办经济特区十年来，吸引了各类专业人才4万多人，其中自然科学人才占56%；取得科技成果202项，达到国际同类技术水平的78项，达到国内技术水平的80项，填补国内空白的21项；已有70多种产品被广东省列入替代进口产品，至1986年已引进技术共389项。他们比较注意对移植的科技成果的二次开发（不搞一次开发和基础研究）。为此，从1985年起建立了科技基金会，鼓励科技人员创办民间科技企业，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到1993年，深圳已有注册科技企业130家。据对42家民间科技企业的抽样调查，1988年产值达4500多万元，创汇74.43万美元，获纯利616.8万元。1993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40%以上，为探索科技产业发展创出了一条新路子。

目前，深圳市已初步形成一个以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研究开发机构为主体，以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为依托，以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为渠道，科研一生产一体化的研究开发新体系。

特区是管理的窗口。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必须有先进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大生产的出现，迫切需要先进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与之相适应。因此，管理方法越来越成为一门科学。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适用。我们可以借助特区这个窗口，通过兴办“三资”企业等形式，学习、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方法。

深圳特区率先在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改革的有益探索和尝试。例如，在全国率先组建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探索国有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导，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全国率先形成了国家计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运行机制；在宏观上强化了政府的计划、财政、劳动等综合部门的调控，强化了工商、税务、银行、审计、劳动等部门的监督；在培育市场体系方面，价格基本放开，97.4%的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建立起劳务、房地产、生产资料、技术、信息、证券等市场，基本上形成了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在微观经济的改革方面，到1992年底已有股份制企业150家、上市公司19家。与此同时，还积极慎重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高各级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精兵简政，加强立法，加强廉政建设……这些措施，为开放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增加了对外商投资

的吸引力。

深圳作为“管理的窗口”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其创造的“深圳速度”。创办深圳特区 13 年来,反映国民经济综合实力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增长了 100 多倍,年递增分别为 47%和 46%。工业总产值增长 502 倍,年递增 63.7%;农业总产值增长 8.7 倍,年递增 35%。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中外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其中,体现对外开放速度的出口贸易额增长最快,13 年中增长 566 倍,年递增 72.5%,其增长速度在全国首屈一指。

特区是知识的窗口。

邓小平历来重视知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已采取了派出留学生和引进专家学者的方式来迅速解决我国知识落后的局面。把特区办成知识的窗口也是邓小平的一个战略构想。因为这样一来,特区就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特区,而且肩负着文化、科学、教育等多功能的特区,在特区应该反映出全民族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特区作为窗口,主要地还是要起到内窥外探的作用。借助于特区,我们可以及时地把握住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动态、文化教育发展动态和经济生产的信息,并通过内地迅速地反馈回来,从而使我们与全人类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深圳特区在 1986 年 3 月就开通了国际联机检索终端,与世界上最大的美国戴亚洛(DIALOG)情报检索系统、ORBIT 和 BRS 数据库建立了联系,加快了信息交流,从而发挥了特区作为“知识的窗口”的辐射作用。

特区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特区的出现本身就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产物,表明了我国坚决奉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决心;同时,特区的存在又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活动。由于有了特区,我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在客观上形成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持续稳定的基础,使这一政策不会因意外的情况而被中断。因为经济上的联系一旦建立起来,就必然随着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的运动而发展,任何人为地割断这种联系的作法都会导致“一损俱损”的后果,使双方都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正是通过特区,打开了对外交往的通道,而国际上则通过特区的建设来测定我国对外开放的决心。1984 年以来,我国相继宣布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 14 个港口城市,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漳、泉、厦三角地区为经济开发区,确定海南建省办大特区,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经济区,等等,在这些地方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增强它们开展对外经济联系的活力。这些措施,使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变得更大,进一步打破了我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局面,在更大规模上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并加以吸收、消化、创新,然后转移到内地。这样,就把对外引进和对内联合结合起来,把沿海的开放和内地的开发结合起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振兴。

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

2.5 平方公里。也许是不忍心打破“海上花园”城市的宁静，决策者让厦门办一个“袖珍特区”。

项南对邓小平说：“实在太小了，即使建成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应该把特区扩大到全岛”。

邓小平平静地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杏林、海沧开发区启动了。李鹏指示：打破常规，特事特办。

50 年后，厦门将崛起于太平洋西海岸，成为中国的“西雅图”。西方经济学家如是说。

1984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了第五个年头。

2 月 7 日，大年初六，当人们还沉浸在欢乐的新春佳节之中时，邓小平刚刚结束了对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视察，又风尘仆仆地踏上了旅程。他和王震来到鹭岛，开始了对“海上花园”厦门市和厦门经济特区的视察。

2 月 7 日上午，一位身穿灰色中山装、精神健旺的老人抵达厦门。在火车站到宾馆的路上，这位老人——邓小平不顾一路的风尘，一边看窗外的厦门建设情况，一边听取了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等的汇报。

2 月 8 日，风和日丽。邓小平乘坐“鹭江”号游艇，视察了已建成投产的东渡港 5 万吨位码头、集装箱码头、渔业码头，然后又向鼓浪屿方向驶去。

在游艇上，项南提出了扩大厦门经济特区的想法，他说：“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 2.5 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你们的意思是——”邓小平带着询问的目光注视着项南和其他省、市负责同志。

“把特区扩大到全岛”，项南显然已经深思熟虑过了，因此语气颇为坚决：“使整个厦门岛都开放，这对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都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

邓小平边听边仔细地察看了地图，然后平静地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听到邓小平的回答，在场的省、市领导人都相视而笑，为邓小平对他们的支持而高兴，连王震也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项南的要求还不止特区地域的扩大。他还向邓小平和盘托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设想：“现在台湾人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或者日本绕道来，这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王震率先表示赞同：“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邓小平沉思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可以考虑。”接着，他问项南：“自由港要实行哪些主要政策呢？”

几位在场的领导人议论了一下，回答道：“人员可以自由来往，货币自由兑换，货物自由进出。”

“哦。”邓小平点燃一支烟，默默地陷入了沉思。

显然，这不是一个容易对之立即作出决定的问题。

“鹭江”号游艇绕鼓浪屿环游一周后，缓缓靠岸。邓小平一行健步登上

这个蕉风郁雨、幽静迷人的绿岛。

在步行回船的路上，邓小平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饶有兴趣地问项南：“厦门机场为啥子要叫国际机场啊？”

项南回答说：“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就是为了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通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邓小平挥手朗声笑道：“就是应该飞出去嘛！”

2月9日，邓小平一行视察了基本完成“五通一平”，正在建厂的湖里工业区。

湖里工业区位于厦门本岛西北部的湖里地区，距市区7公里，离新建的东波码头、厦门国际机场和厦门火车北站只有2至3公里。工业区面积为2.5平方公里。它的建设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平整土地工程已基本完成，修建了道路、综合大楼、技术培训中心，以及一大批厂房和住宅楼。在湖里工业区建设中，省七建公司只用国家规定工期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就建成一幢15000平方米的通用厂房，震动了建筑界。闽江水电工程局以不到一年的时间，建成了厦门机场的跑道。省三建公司“冒雨盖楼，三天一层”，建成机场指挥塔楼。——听了这些汇报，邓小平连连点头，肯定了厦门的建设速度。

当福建省委领导人汇报这几年福建集中财力、物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吸引外资、侨资创造条件，讲到搞这些基础建设，主要是利用国外贷款，并采取边借边还的办法，其中向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和休斯顿银行贷款3800万美元已提前还清时，邓小平尤其表示赞赏。在看了厦门国际机场后，邓小平说，要争取和国外通航，让飞机飞出去。

9日上午，邓小平到湖里工业区听取了厦门经济特区委员会主任邹尔均汇报后，高兴地挥笔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通过在广东、福建等地十余天的实地考察，邓小平从特区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更加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回家之后，他在2月24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适时提出把厦门办成中国最大自由港之一的战略构想，无疑预示了厦门向国际性港口大都市转化的宏伟前景。

厦门城市要上水平。

厦门经济总量要上规模。

厦门要建成大城市的框架，产业布局要更趋合理。

厦门要成为闽南金三角、福建省乃至东南沿海经济带头腾飞的龙头。

厦门——这个被誉为“东方瑞士”的花园式海港城市，占天时地利之便，作为中国最早的四大经济特区之一将率先崛起于东南前沿。

一个新的思路就要呼之欲出！

1989年5月20日，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准厦门特区及杏林、海沧为台商投资区，投资区享受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

1990年2月20日，李瑞环视察位于闽南漳（州）、泉（州）、厦（门）金三角地区的海沧，十分赞赏海沧的优越条件，提出行政区划要服务于经济

建设；

1990年2月24日，李鹏总理冒雨考察海沧，指示海沧开发要“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并当即拍板由国家安排若干贷款作为启动资金；

从1991年9月到1992年7月，乔石、万里、朱镕基先后视察海沧，要求有关部门抓紧各项工作，为大规模开发创造条件……

邓小平、江泽民、杨尚昆、姚依林、宋平、丁关根、邹家华、谷牧、王兆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会见海外实业界富商巨贾，为开发海沧运筹帷幄、决策谋划……

1993年4月15日，福建省委、省政府专程赴厦门举行现场办公会议，果断对海沧开发区100平方公里土地布局实行了调整：南部临海20平方公里为“901”项目预留地，80平方公里由厦门市政府全面开发，并打破产业限制，不论石化、钢铁、汽车、电子、机械、纺织、贸易、金融、房地产等支柱产业或第三产业，均属欢迎之列；尤其鼓励投资建设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工程。

省委书记陈光毅指出：海沧的开发开放要推出大举措，造成大气候，立足大厦门，发挥整体启动效应，尽快使海沧这块宝地沸腾起来。

省长贾庆林则提出：要按照建设21世纪新城区和建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总体要求，来设计规划海沧并发的发展战略。

西方经济学家预测：50年后，厦门将崛起于太平洋西海岸，成为中国的“西雅图”。

海沧继海南洋浦开发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作为最大的台商投资区，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又一块热土。

深圳的经验证明，建设特区的政策是对的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人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新认识。深圳，总设计师的对外开放总体规划上的一块试验田。

1984年，邓小平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7年，邓小平又说：经过七年的实践，我们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

1992年，邓小平再次肯定道：深圳的建设成就表明，特区姓“社”不姓“资”。

试验成功了，邓小平很欣慰。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1992年1月19日上午8时许，在深圳火车站月台上，几位省、市负责人和其他迎候的人们，在来回踱步，互相交谈，他们正以兴奋而激动的心情等候着……

来了！远处传来隆隆的轰鸣声。接着，一列长长的火车徐徐进站。时钟正指9点正，列车停在月台旁边。

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木板放在车厢门口。

不一会，邓小平出现了！

他，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神采奕奕，健步跨出车门……

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部一齐投向这位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众所周知，邓小平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者。深圳特区是邓小平亲自开辟的最早的改革开放的试验地之一。邓小平自深圳特区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关注着深圳这颗改革开放幼苗的成长和发展。

深圳兴办特区之前，原是宝安县的一个边陲小镇。“文革”十年动乱期间，这里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社员收入很低，人员外流严重。但这是一块有良好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土地。这里的地理位置优越，毗邻香港这个国际经济和海运中心，与港九接壤的海上边界有107公里，陆地边界有27.5公里。它交通方便，是我国重要的对外经济活动口岸，素有“祖国南大门”之称。它地域广阔，全市总面积为2000多平方公里，可用面积占70%，相当于香港、九龙、新界总面积之和的一倍。它背负青山，面向大海，海岸线长，风景秀丽，宜于兴建海滨游泳场、住宅和其他户外娱乐场所。这个地区常年气候温暖，四季如春，雨量充沛，经济作物和水产资源丰富，在历史上人民有种植和养殖的经验，如沙井的蚝、金龟的桔、龙岗的鸡、杜岗的鱼虾、布吉的柿、南头的荔枝和南山的桃等，曾远销国际市场。

深圳还是我国通向香港和东南亚的交通要冲，是旅客出入境的必然通道和对外贸易转运的集散地及桥梁，是兴办特区的理想之地。

正因为如此，当1979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提出建立特区的重大决策以后，这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正式批准在深圳试办特区。次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从正式宣告经济特区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她

风风火火、沸沸扬扬的日子。一支支建设大军从祖国四面八方开到深圳河畔，一群群年青的打工仔、打工妹从各地涌来。深圳，这个边陲小镇，一下子沸腾起来了……

没有钱，深圳人四处奔走，靠借贷、“滚雪球”支撑起一座座大厦，铺设起一条条马路。“五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初具规模后。外商纷至沓来，“合作”、“合资”、“独资”企业与日俱增。经过几年建设，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的雏形已经形成……

深圳的名声大振，一方面引起了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广泛关注、深切理解和热情支持，另一方面也招来了党内外一些持不同意见者对深圳改革开放的怀疑和指责。

对深圳特区几年来的发展，是肯定还是否定？

深圳特区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是对了还是错了？

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

中国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这块新土地。深圳的“拓荒牛”们在翘首盼望邓小平亲临深圳考察，听一听这里的建设者们的声音，为每一个关心深圳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人排忧解难、指点迷津……

1984年1月，邓小平到深圳来了。他经过三天的实地考察，给深圳特区题了词，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建设成就，肯定了办特区的方针是正确的，给了特区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坚定了人们办特区的决心和信心，使特区的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八年后，同样是春意荡漾的一月，邓小平再次来到深圳。

散步时，邓楠向小平同志提起他在1984年1月26日为深圳特区题词一事。邓小平接着将题词一字一句念出来：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在场的人都很佩服他那惊人的记忆力。

深圳的经验是什么？

——深圳人从改革开放、革故鼎新的实践中，率先提出了极富于哲理意味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他们在兴建高160米、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号称神州第一楼的深圳国贸大厦时，创造出了世界建筑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圳速度”——三天盖一层楼。外国人惊讶地赞叹道：“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深圳速度，是独领风骚于青史的！”

——震惊海内外的“深圳速度”，绝非仅仅表现在建筑业上。深圳自创办经济特区以来，主要经济指标每两年至两年半即翻一番；12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45.36%；国民收入年平均递增44.03%；工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61.65%。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起飞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深圳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正在逐步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共同竞争的局面，使国营、集体、个体、合资、独资企业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百万劳动大军有如一波波狂涛叠浪涌入深圳，逼出了一个“劳务市场”，一次分配定终身已成为昨日黄花。

建筑业的高速度和高效率，逼出了一个“原材料市场”：传统的天经地义的由国家调拨、建材部门经营的“一统江山”局面被打破了，在深圳，钢材、水泥、木材等原材料都可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自由贸易，拍板成交。

特区开发所必然出现的人口骤增，一度造成食品、副食品、日用品等供求关系失衡，逼出了一个“生活资料市场”：始于1984年11月的深圳物价改革，与劳动工资改革配套进行，稳步推进，逐一放开；到1992年，市场调节价格比例已占到97.4%，没有引发人心浮动和社会动荡；在深圳，价格真正遵循价值规律，发挥着引导消费、启动市场、调节商品的杠杆作用。

——深圳人勇敢地打破了“股票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的固有观念。1987年10月，深圳发展银行向社会公开发行了第一批股票。到1992年，深圳已建立股份制企业136家，并有17家企业的股票正式上市。此外，还有正在兴起的“金融市场”、“科技市场”、“信息市场”、“人才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育和灵活运转，远远走在了全中国的前列。

——1985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构想。大胆突破传统外贸管理体制的束缚，从“借船出海”到“买船出海”，直接实现国际间的产销见面。

由此，深圳市出口总值由1980年的0.09亿美元发展到1991年的34.46亿美元，年递增63.71%；工业产品出口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利用外资占到全国的七分之一；三资企业密度居全国首位；出口创汇总量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仅次于上海，排名第二位；人均创汇额名列全国榜首。

到1992年，深圳已在全国率先显示出“小康”的雏型：

人均国民收入达到8000元人民币；12年累计直接或间接上缴国家财政和税收达200亿人民币；同时，安排内地劳动力就业100多万人，向内地汇回劳务费达55亿元人民币；人均生产总值、人均实现利税、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跃居全国首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给人们以什么启示呢？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又说：“经过将近7年的实践，现在看来，我们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证明是成功的。”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进一步坚定地说：“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上海是我们的王牌

某跨国公司董事长说：上海对世界的吸引力很大。1995年上海成功引进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298个。

如何使上海再造辉煌，这是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邓小平感慨地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

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浦东起飞了，1995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411.8亿元，比上年增长22%，完成财政收入39.2亿元。

邓小平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政治家总是能够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地在关键时刻作出英明决策。

上海，这个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在全世界的“超大规模城市”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多少年来，上海都是似经济、科技中心雄踞于中国版图之上。建国后，上海逐步建立起门类齐全、自成体系、技术领先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几十年中，上海人民为全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统计，1950年至1989年的40年中，上海国民总产值达4769亿元，其中有4117亿元支援了全国建设。这几年，上海每年向中央上缴财政收入都是170多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

上海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却落后了。进入80年代后，邓小平英明决策，创办了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些地区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全国许多省市经济建设也在迅速发展。然而，作为“老大哥”的上海，这时却面临着窘迫的处境。

广东、福建沿海城市的大潮，冲击着上海名牌多年来独领风骚的地位；“苏南模式”的崛起、山东和浙江的挑战，中国经济巨擎的称号能否保持？80年代上海工业增长速度仅为全国平均值的二分之一。国民生产总值第一的桂冠已被江苏夺走；外贸出口冠军被迫让位广东。“三资”企业发展速度落后于经济特区。庞大的国有企业队伍困难重重，设备落后，技术陈旧，产品升级换代滞后，城市建设欠帐太多，环境污染严重……

有人说，这是新时期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的结果；有人说，这是一个经济巨人付出太多、元气大伤而导致的悲壮的衰落。

上海，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

发展是硬道理。上海的发展困难重重。但上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上海的相对衰落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阶段性结果，上海为兄弟省市的发展付出了许多代价！但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上海，需要有上海这个“大哥大”来领头！

怎样使上海再造辉煌，这是摆在中国政治家面前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扩大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时，把目光移向了这座拥有发展工业、贸易和金融优越基础的特大城市，这座他十分熟悉并且十分关心的城市。

于是，他老人家伸出巨手，要把上海这只“龙头”引上新的发展道路。

1988年的春节，瑞雪飘飘，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内却春意融融，一片欢声笑语，上海各界正在这里欢度春节。这时，邓小平同志满面红光，神采

奕奕，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江泽民的陪同下，健步走进会场。在场 700 多位上海各界人士激动不已，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邓小平笑容满面，向大家频频挥手致意。这时，两条彩龙从大厅两侧飞上舞台，晚会在“龙灯舞”的欢乐乐曲声中开始了。精彩的节目一个又一个。在这个欢乐的时刻，上海人民祝愿小平同志健康长寿，小平同志也祝愿上海人民富裕幸福。

在上海期间，邓小平听取了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汇报，对上海为全国作出的重大贡献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对上海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进程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从这一年起，到 1992 年，连续 5 个春节，邓小平同志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他老人家在对上海作深入的考察，他在思考使上海再度腾飞的宏伟战略。

1990 年，邓小平在上海过完春节回到北京后，对政治局的同志们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他还特意要求李鹏同志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

1990 年 3 月，小平同志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要抓住机会，及时决策，“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他明确地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在这里，小平同志以一个战略家的雄才大略，十分清楚地指明了上海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这一英明决策，将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高潮。

上海人很聪明，会办事。浦东开发不到一年就获得了喜人的成果。有 20 多个中、外资银行及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在浦东落户；有 180 多个外资投资项目被批准，总投资 8 亿多美元；内资企业新建 700 多个，总投资 9 亿多人民币；10 大市政工程陆续展开，投入资金 140 亿元人民币；重点开发小区已经全面铺开……。

1992 年初春，小平同志南下武汉、深圳、珠海视察之后，再一次来到上海。他在了解了上海经济建设的发展成就后，明确指出：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

当年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在大会报告中正式提出：要“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新飞跃。”

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变成了上海人的近、中、远期目标：

1995 年，为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奠定基础；

2000 年，初步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框架；

2010 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使浦东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区。

目标不是空谈，上海人是办实事的。从 1992 年到 1993 年的一年中，上海的发展步伐大大加快，实现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了新的发展奇迹：1993 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14.9%，超过了全国的增长速度，达到 1509.93 亿元人民币。从 1991 年到 1995 年，上海利用外资大项目逐年增

多，总投资在 1000 万以上的大项目数，5 年累计 863 个，其中仅 1995 年就有 298 个。在外资项目中，工业性项目比重较大，5 年共批准工业性项目 8200 个，占项目总数的 87%。国际上的大跨国公司的投资不断增加。浦东新区正在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5 年中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 3501 个，直接利用外资协议金额 89.41 亿美元。

城市建设发展迅猛：第一条地铁已经开通；市区高架环形路在迅速延伸；上海新客站建成使用；名列亚洲第一的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巍然屹立；城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上海仿佛一下子长高了许多。令世人关注的浦东开发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呈现出起点层次高、开发启动快、大项目和高新技术及三产项目多的鲜明特点，一个充满生机、前途无量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加速形成。

1996 年是“九五”计划的开端年，上海决定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扩大利用外资领域，为此提出了“两个转变”，一是从以税收优惠吸引外资转到提高投资环境质量和外企经营质量上来；二是从注重项目数量转到重点吸引高新技术、新型农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扩大利用外资领域上来。

抓住机会腾飞吧，上海！中国的腾飞需要你的再度辉煌。

放胆地干，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山东发展快。有段顺口溜唱道：“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不到山东不知道胆小。”

1988年1月23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

特别是要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张家港人最知道珍惜时机，胆子也大。他们先请李鹏题字——“张家港保税区”，然后把生米煮成一锅熟饭，争得我国第一个年河港型保税区。

一位领导人对张家港评价道：“地方很小，能量很大。”

学者们在讨论：张家港的经验有多大的普遍意义？

江南春早，2月的苏州，已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1983年2月6日下午，一辆白色面包车缓缓驶进座落在城南十全街的南园宾馆的庭院中。车门打开，走下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小平同志这次来江苏，是要作些调查研究，深入实际了解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情况。

2月7日下午，江苏省领导应约来到南园宾馆新平房的会客室，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小平的第一句话便直奔主题：“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

江苏的领导人作了肯定的回答，“照我们现在的速度，用不了20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

“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邓小平问。这个问题是他老人家十分关心的。苏州的工农业生产发展较好，在全省居于前列，在国内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中有相当代表性。

江苏的同志也准备向邓小平汇报苏州的情况。

1982年底的苏州，工农业总产值已达到人均800美元。从1978年以来的4年中，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10.49%的速度递增。照这样的发展势头，翻两番用十年的时间就够了。“我们可以提前5年时间实现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江苏的同志肯定地说。

邓小平听后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和赞许。

江苏之行使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前景充满了信心。不久之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十分肯定地说：“这样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现在可以告诉朋友们，我们的信心增加了。”

苏州人民没有让邓小平失望。经过十几年的努力，199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00美元，已经越过我国2000年将要实现的小康标准，开始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使苏州成为“苏南模式”的一个典型。

如果说，苏州的发展令人称赞，张家港的崛起则就令人惊叹了。

张家港的名字对许多人来说是陌生的。它是苏州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它的前身是沙洲县，辖有777平方公里的沙滩和222平方公里的长江水面，曾被戏称为没人要的“边角料”。1986年改县建市，在中国地图上第一次有了“张家港市”的地理座标。

谁也不会想到，到90年代中期，张家港会震惊全国。只有82万人口的张家港，199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52.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8600

元。城镇职工人均收入 5800 元，农民人均收入 3600 元。1995 年跃居全国“百强县”第二位。由苏州各县市的老幺一下跃升为老大。

张家港奇迹的奥秘何在？市委书记秦振华一语中的：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他说，我的运气好，一上任就赶上小平南巡讲话的传达贯彻。小平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力争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张家港就是按邓小平的指示干起来的。

1992 年 5 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到张家港视察，听取了张家港准备建立保税区的设想。也许，李鹏被张家港人真抓实干的精神打动了，他为张家港题了六个字：“张家港保税区”。

中央领导的支持，更加激发张家港人抓住时机上台阶的信心。一个用高速度、高标准建设我国第一个内河型保税区的热潮在张家港全面掀起。20 个昼夜构筑起 8 公里长的铁丝网隔离带，90 天建成一幢 8000 平方米的港务局大楼，半个月拆迁 1284 户农民住房，同时建起 60 幢 20 万平方米的新住房，160 天建成当时长江流域最大的万吨级化工码头。这样，当 1992 年 10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张家港的保税区项目时，它已经把保税区的雏型展现在国人面前了。

张家港人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到 1994 年底，张家港保税区已实现“七通一平”，进区企业达 376 家，投资总额 11.6 亿美元，到帐资金 5.7 亿美元，招商引资数在全国 13 个保税区中名列第三。

有一位领导人说：张家港的发展是高速度的，也是高质量的。这个“高质量”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在张家港得到了明显体现。

张家港人认为，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它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总产值和利税上都占 95% 的份额。在分配问题上，他们既适度拉开档次，又坚决控制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张家港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客商星期天到张家港一样能够办事。到外地出差或出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带头住简易旅馆，办完事就返回，绝不在外多逗留一天。他们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令许多外商感叹不已。

张家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高度重视社会发展。他们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在市区先后办起了一流的县办大学、中小学、幼儿园、文化馆、体育馆、公园和敬老院。改造了市区的街道和马路，搞了高标准的城市绿化工程。他们说，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人民造福。他们获得的全国先进真多：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百强县（市）”第二名；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创办全国第一所县办大学；全国文化先进县（市）；全国体育先进县（市）；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全国绿化造林“百佳”称号，等等。

也要看到，张家港的高速发展是一定条件下的产物。张家港人在特定的条件下抓住机遇，促成了超常规发展，是可喜可贺的。但是，张家港的经验并不是可以照搬的。比如，人们很难像张家港那样也去办保税区，很难像张家港那样以超常规的巨额投入去换取超常规的高速发展。要学也有可以学的，张家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真抓实干的艰苦创业精神应该学；两个文明一起抓，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双丰收的思路应该学。而更重要的是把张家港人的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搞好自己的工作。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不仅经济要上去，精神文明也要搞好

增长不等于发展。这已是发展学家们的共识。

下个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民族思想、文化和道德素质的竞争。

几乎没有铁矿和煤资源的日本，建起世界一流钢铁工业。有学者指出：资金和资源的优势是流动和变化的：只有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才是持久竞争力的基础。

“繁荣‘娼’盛”？现代化难道必须以道德和秩序的崩坏为代价？

邓小平说，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改革是一场整体性的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改变着人们经济生活的方式，而且也将改变与改革的目标相冲突、相摩擦的旧观念。

观念的动荡、冲突和变革，既是改革实践的产物和结果，又是构成改革深化所不可忽视的条件。

转变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旧观念，确立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观念，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问题。

电视镜头：深圳、石狮的街景。

这两座城市，同样处在沿海开放地区，同样开发展商品经济之先河，同样兴建起许多具有现代化气派的高楼大厦。

但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一座城市的商业场所秩序井然，卫生整洁；而另一座城市则大相径庭，无论是宾馆饭店还是娱乐场所，到处烟雾腾腾，铺设的地毯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烟头烫成千疮百孔，令人感慨唏嘘。

平心而论，石狮这座新兴城镇的商品经济不可谓不活跃，物质环境不可谓不现代。但透过千疮百孔的地毯这一细节，反映的是精神风貌和文化素质方面的缺陷。

随着我国改革的日益深化，日益面临着人的素质问题。

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一切现代化的科学理论，现代化的技术设备、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只有通过现代化的主体——人及其创造性的实践，才能化为现实的、物质的力量。离开了人，离开了人对于这些理论、设备、方法的掌握，离开了人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推动和控制，现代化的实现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化的人，而现代化的人的标志就在于其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化。

然而，我们民族素质的现状却令人担忧：

——我国居民文化程度构成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

在我国，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居民只占全部人口的 0.6%，高中文化水平的居民只占 6.6%，初中文化水平的居民占 17.8%，毕业和肄业的小学生占 35.4%，文盲占 23.7%。而在美国、日本，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居民分别占总人口的 31.9%、14.3%，高中文化程度居民占总人口的 40%左右，文盲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新加坡大学文化居民占总人口的 3.4%。韩国已达 9%。

——我国居民文化地理分布极不均衡，形势严峻。

我国文化程度高的居民基本上集居于少数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生活在内陆和边疆的居民，文化程度低下。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不足 9000 万，约占

全国人口的7~8%，而少数民族中文盲则有60%左右。但这文化素质低下的9000万人却分布在60%左右的国土上。在他们居住的地区蕴藏着60%左右的自然资源。如何把这些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关键还在于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在各种不文明的文化消费中急剧滑坡。

现在，我国农民和城镇工人的基本“文化”消费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迷信。神州大地遍地佛踪，不绝香客，修坟造墓、敬鬼神已成为一种“时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在香火旺盛的寺庙、道观已达千数，每年香客逾千万，进香费用累积10亿人民币（这还不算在家立坛、村头建庙）。除拜佛进香外，修坟造墓敬鬼神也成为中国一大“公害”。如温州的坟近千元一座，漫山遍野，几成景观，出现了大量的修坟专业户，专门印刷冥钞，制作随葬品的专业户。中原、江浙一带，有的农村迷信专业户几乎占乡户的10%。

赌博。现在群众中流传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麻（搓麻将）”。此话虽有夸大之嫌，但确已道出目前赌博成风这一事实。现在，赌博之风愈演愈烈。不但农民赌、工人赌、机关干部赌，甚至执法的公安人员也赌，大学生赌不起现钞也赌饭票。不但暗赌，聚赌，甚至公开设赌。车站候车室、马路边、长途客车上都成了赌博场所，机关办公室、大学宿舍、工厂车间、建筑工地也无孔不入。有的甚至乘出租车跨省市流窜聚赌。现在每场超过万元的已不属罕见。首富之地一次赌注竟达百万元，创下新中国赌博之最。据有关部门透露，全国赌博案件每年增加20%左右。

挥霍。目前，大吃大喝，公款消费，奢华无度已成国忧。尽管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狠刹公款吃喝风，但顶“风”违纪的案件却一发再发。东北某县并不富裕，一年工业总利润只有500万元，而县统计部门对这个县一年公款吃喝费统计竟也是500万元！华北某省比较有名望的宾馆、酒家、饭店、招待所达千家以上，据统计，这个省一年公款吃喝达六、七亿元，相当于该省一年财政收入的1/10还多。

联合国按人均国民收入的多少，将世界各国生活水平划分为6个档次，我国列在倒数第二档——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而我们的超前消费、奢侈豪华却在许多发达国家之上，公款豪吃豪饮已成世界之最。

陋巷文化消费。现在，充斥书店、书摊的书籍杂志基本上是一种陋巷文化。有人对全国17个大中小城市的300多个书摊做了调查，发现涉及性、武力、警匪、迷信、秘闻、发财术题材的出版物竟占73%。另据一项对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中学生、大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在这些读者群中，有三类书籍崇拜：一是黄色崇拜。有性描写的就抢手阅读。有人到一个体书店调查，看到30多个中学生在读香港禁书。二是暴力崇拜。武打枪杀是许多中学生和市民的主要阅读内容。三是秘闻崇拜。历代宫廷轶闻秘事，不辨善恶真伪，皆被兜售出来，更有随意捏造宫廷秘事的“作者”的信手涂写……如此低级庸俗的陋巷文化消费的泛滥，必然会降低公众的文化素质。这是一种降低人们文化素质的文化异化现象。

我们说，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所以，在我们的全部工作中，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然而，不能肤浅地、庸俗化地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要求一切领域、一切部门都追求经济价值。这就像虽然大脑对于人体来说非常重要、却不能要求四肢也发挥像大脑一样的功能那样，对于教育、文化、卫生、公

安、司法等单位 and 部门，不能要求它们把追求经济价值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

邓小平说，思想文化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无限制地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教育、卫生、公安、司法、福利领域，必将把社会人文引向单一经济取向，而失去对经济的人文约束。”——这也是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取得的共识。

所以，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思想道德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他多次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邓小平认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这“四有”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具有丰富的内涵——

有理想：理想是一种信念，不过它不是任意想象的，而是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的信念。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也搞不成功。这种信仰是一种动力。”因此，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候，邓小平把理想建设放在突出的地位。

有道德：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规范行为的总和。它包括道德意识、道德活动、道德关系。邓小平所指的有道德，包括这三方面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是“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

有文化：邓小平认为，四化建设必须抓紧智力开发，以文化“化”人，否则四化建设得不到智力的支持，必然大大延缓其进程。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必须在全国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必须在文化领域贯彻改革开放政策，学习国外的一些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必须加强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文物、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的建设。

有纪律：纪律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规范，是社会或集体对人们日常行为进行约束、监督的手段。革命的纪律是保证我们的队伍团结一致、增强战斗力的有力武器。邓小平指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

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纪律。”

邓小平在谈到培育“四有”公民时一再强调理想和纪律这两条。他说，“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即使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世界倒数第二！

据统计，1990年世界151个国家中，按人口平均的教育经费，依数字大小排列，我国居于第150位。

每5个中国人中有1个是文盲，而全世界每4个文盲中有一个中国人……

再援引日本教育立国的例子已是老调重弹。但官员们的急功近利足以使每一次振兴教育的大计成为泡影。

经济建设是中心。但“中心”绝不是“唯一”！

“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需要教育的支撑。

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千方百计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教育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后备力量。现代社会的任何进步与生产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因而离不开教育。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都把科学和教育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认为教育是生产发展的首要因素。

然而，我们却无法回避：

建国后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虽有长足的进步，我们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和艺术家，但是从总体上讲，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尽管经过近十几年的努力，全国共扫除文盲6000多万人，使15岁至40岁的青壮年人口的文盲率降至7%以下；每年培训青壮年农民400万人次左右，岗位培训职工3000多万人次；其他成人教育和大学后继续教育，每年也都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人结业，但是，统计表明：每5个中国人中，仍有一个文盲；而全世界每4个文盲中，就有1个中国人。

——目前，我国人才资源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同经济上的差距一样明显。我国（大陆）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人才仅2000余万，仅占总人口的2%；科技人才则更为缺乏，仅为全部就业人口的1%，而台湾的这一比例是大陆的4倍，德国的这一比例是我们的10倍。我国的科学家则更加“稀缺”：目前每一千名日本人中有4.7名科学家，每一千名美国人中有3.8名科学家，欧共体则有4.9名。我国每一千人中只有科学家不到0.5名，仅为西方国家的1/10。美国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而我国的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15%，仅为美国的1/5。

——我们全国居民的平均文化程度只相当于受过5.5年的小学教育。也就是说，全国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尚不够小学毕业水平！而日本1975年从事农业劳动的生产者平均文化程度已经达到11.7年的教育，即接近高中毕业文化程度。

——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拜金主义、弃学经商、忽视教育等消极、短期行为的社会化，导致低素质人口的继续产生。1980~1990年，中国约有4000多万中、小学生失学，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成为文盲大军中的新成员。目前，我国每年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约有100万！

——我国人口中的“科盲”比例比文盲比例更高。据90年代初中国科协对不同职业、年龄、文化程度、18岁以上公民的抽样调查统计，在接受调查的公众中知道地球绕太阳转的人占78%，但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圈需要一年时

间的人只有 50%。知道世界著名科学家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的人分别占 31%、25%、21%；在中国科学家中最著名的是祖冲之，知道他的也只有 25%。对科技基础知识的概念比较模糊，初步了解水银温度计工作原理的占 23%，只有 7%的人能说出电话、照相机的简单原理。在 46%的自称了解科学方法的人中，竟有 1/4 的人认为“算卦至少有一点科学”。这一调查的结果说明，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亟待提高。

列宁早就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我国如此众多的文盲、“科盲”，不仅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反而是现代化进程中十分沉重的人口包袱。

我国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也令人担忧。

1990 年，我国人均教育经费只有 52 元，约合 10 美元，列世界倒数第二位，而在发达的工业国家，有的人均教育经费已以千美元计。

再看我国用于基础教育的经费。小学生约为人民币 60 元，这笔经费一般只能保持教师的“人头费”。据国家教委有关人

士介绍，一些农村小学教育行政经费只够发教师 10 个月的工资。用于教学活动的公用经费，中学生每人每年 5 元多，小学生仅 1 元多。

如何解决基础教育经费的不足，这个问题摆在了党和政府及全国人民的面前。

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关心教育、支持教育，是解决贫困地区教育问题的最佳途径。1989 年 10 月 30 日，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了通过社会集资，让千千万万因家庭贫困而辍学的孩子们重返校园的“希望工程”。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希望工程”四个大字，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等也为“希望工程”题辞。

199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我国教育工作的奋斗目标和工作思路。

1994 年 9 月，国家教委负责人就努力增加教育投入问题提出了以下政策和措施：

——重申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应达到 4%；切实保证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应占的比例；并使年度教育拨款实际上有大幅度增长。

——改革教育经费管理体制，教育经费实行年度预算单列，建立定期公布各地教育经费支出状况的制度，实行社会监督。

——城乡教育费附加一律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 3% 征收；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5% 的个人负担中教育费附加应占 1.5~2%。——建立中央和省的义务教育专项基金，扶持贫困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用于农村学校危房改造、修缮和新建校舍以及教学基本条件改善的农村教育集资的审批权放在县一级。——中央从 1994 年起开列“211 工程”启动资金，并逐步建立扶持“211 工程”的专项资金。

——同意建立教育银行，运用金融手段融通教育资金。——国家对校办产业继续实行减免税政策，逐年增加低息贷款。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只有教育得到振兴，国家才能振兴，民族才能振兴。

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中国还不富裕。

我国人均国民总产值还不到发达国家的二十分之一。“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

法国酒厂的老板喜出望外：世界上最大的白兰地市场在中国。

中小學生兴起的“名牌热”，急坏了靠工薪度日的家长们。

勤奋、节俭。要不要倡导一点“清教徒”精神？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

社会有识之士呼吁：加强忧患意识和挫折意识教育势在必行！

中国还不富裕。虽然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1995年我国人均国民总产值还不到400美元，而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一般已是20000美元上下，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都超过了10000美元。新加坡1995年的人均国民总产值已达到22000多美元。这个差距是巨大的，需要我们经过较长时期的艰苦努力才可能缩小这个差距。

邓小平同志很强调正确认识国情，他的发展战略就是建立在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上的。那么，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什么？早在1979年，小平同志就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还有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所以，“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

然而，眼下有些现象使人以为中国已经非常富裕了。

几百上千元一瓶的高档洋酒，人家外国人也只是偶而喝一次，而且是眯着眼睛抿着嘴地品尝，国内有些“大款”却信奉“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在桌子上放几瓶，呼么喝六地猛灌，像喝啤酒似的。

一些穷困地区的孩子在破屋烂桌上读书上课，一双双充满希望的眼睛在等待“希望工程”能早日建成。而我们许多城镇里歌舞厅、夜总会却是一个劲地盖，日日灯红酒绿，夜夜笙歌不断。在有些地方，一个“大款”在歌厅一夜消费数十万元已不是什么新闻。

一些传媒的广告也在推波助澜，什么“帝王气派”、“贵族情调”、“豪门风范”等随处可见，把奢侈消费之风渲染得无以复加。于是，在许多大中城市里，一些中、小学生也养成了对名牌的“偏爱”，急坏了不少靠工薪度日的家长。

奢风盛行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公款消费：在我们这个国度里，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的管理费支出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口子，招待、送礼、宴请、过节或庆典活动，乃至一些说不出名目的高消费项目，均可以从这个口子将公款用作个人消费。据银行统计，1993年管理费支出北京增长82.7%，浙江增长90.7%，广东增长62.1%，上海增长102.1%。用公家的钱摆阔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顽症。江苏吴江市市长曾对一位记者说过这样一席话：“我们也搞过忆苦思甜教育，现在不讲了。我观察你，好像对吃吃喝喝看不惯。可是我们没有办法，风气已经形成。我招待不好，人家会说，吴江人小气。“主雅客来勤”，为了发展此地经济，我必须和各方面打交道，就少不了吃喝。再说我们坐的车，严格

地讲，我们不够资格，也属于腐败之列。但是，风气如此，不得不如此，否则，人家会说，吴江实力不行。”从这段话，人们可以看出眼下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的忧虑和困惑。

工资外收入的增长，是个谁也说不清的事。银行统计的工资性现金支出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工资总额，差距越拉越大。工资总额占银行工资性现金支出的比重，广东 1991 年为 58.4%，1994 年上半年降为 43.9%，北京 1991 年为 72%，1994 年上半年降为 67%。有不少地方职工的工资外收入已超过工资收入。不仅如此，银行的工资性现金支出远远不能包括工资外收入。据浙江省银行典型调查，职工实际货币收入增长幅度比银行统计的工资性现金支出一般要高出 7 个百分点。有的货币收入根本不走银行的渠道，而在经营中直接坐支现金；即使通过银行，也常常借其他科目套取现金再转成消费基金。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相当薄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94 年实行新税法，个人所得税比上年有所增加，但从总体上看，现在征到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工薪收入部分，而对工薪外的高收入，征收很不容易。上海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据调查，全市个人所得税征收中，工薪所得税占 82%，股息、红利占 6.7%，而潜力很大的劳务报酬所得税只占 5.5%。显然，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薄弱，不利于调节人们的收入差距和消费行为。

人们收入差距的拉大，尤其是因不合理因素造成的拉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收入出现差距是正常的，平均主义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但某些行业、某些人员收入畸高，明显存在不合理因素。例如，一些歌星、影星的出场费高得惊人，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单位和机构的收入大大高于一般从业人员，一些凭借关系和权力捞钱的人也发了大财。对这些并非由于劳动贡献大而获得高收入的现象，民众的心理是不平衡的。

中国还不富裕，中国还需要艰苦奋斗。这不仅是个号召，这是中国国情的客观要求；

一些海外华人在“千岛湖事件”发生后，致函我国有关部门，言词恳切地说，如果大陆把民众的消费胃口吊得太高，一些青年人因为得不到实现的条件，就可能用犯罪的手段去实现享乐的目的。一个因抢劫杀人而被判死罪的青年，在坦白其犯罪动机时声称，凭什么就该我受穷？我要像“大款”那样生活，我没有别的本事，只有去抢。

中国太大，由于历史、自然的原因，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很大，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城市和乡村的差距很大。从农村情况看，不少地方由于外向型经济、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确实富裕了；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农户还是以家庭经营为主，农业人口还占农村人口的 60—70%，农业收入占全部收入的六成以上。如江西这样的农业大省，农业收入占农民全部收入的七成以上，四川省农业收入占农民全部收入的八成以上，贵州省贫困人口占全省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全国多数农民仅仅是达到了温饱水平，离小康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沿海地区的农民的富裕程度高一些，但西北、西南一些老、少、穷、边地区农民的生活提高较慢，至今还有八千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城市的不平衡也是明显的。我国目前还有相当大比例的国营企业亏损，这些企业的工人只能领取百分之七十的工资，还有些职工完全领不到工资。

而且，仅仅以工薪为生的阶层，其生活也是比较清贫的。如果社会奢风盛行依旧，人们能够心理平衡吗？社会能够安定吗？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刚刚起步，我们需要把有限的资金投入 to 生产和发展中去，需要有一点勤奋和节俭的“清教徒”精神。邓小平同志说过：“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的确是这样，我国许多民族资本家始终保持其创业时期那种节俭的生活方式，并不因为有了一些钱财就奢靡起来；国外不少大资本家也不追求奢侈的生活。相比之下，国内这些一有钱就急于摆阔的人，就显得目光短浅、小家子气十足了。

看来，对高消费之风应予以必要的控制。要实行宏观调控，社会主义的商业、服务业要立足于为大多数人服务，照顾大多数人的消费水平，对高消费要采取经济手段加以调节；要在国民中大力提倡艰苦奋斗风气，开展一些忧患意识教育和挫折教育是必要的。在宣传上要避免片面性，讲大好形势，也要讲面临的困难；讲良好机遇，也要讲严峻挑战；讲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要讲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利于我国经济和社会不断进步的良好的社会环境。

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孤军独进

民主，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

民主的发展历程沾满了血腥。古罗马角斗士的生死，由如痴如狂的市民以民主方式来决定。

实行民主需要条件。一张张选票选出了林肯，也选出了希特勒。亨廷顿认为，不具备容纳民众政治参与热情时，唤起他们的热情是危险的。

一位国有企业厂长说：没有自主权，我怎么去市场上竞争？

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需要政治民主。邓小平有些着急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

有的人主张“集中一点”；有的人主张“分散一点”。

集中与分散——摆在第三代领导核心面前的一大矛盾。

“民主比专制好”，一位资深学者说，“民主不一定得出最好的结果，但民主肯定可以避免最坏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是全体中国人的一场灾难。如果当时有民主，国家主席刘少奇不致于被“永远开除出党”，也不会被迫害致死后，火化单上竟写着不知是谁的名字——“刘卫黄”。1945年7月，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高难度的问题：共产党能不能找到跳出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办法？

毛泽东颇有信心地答道：找到了，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这个办法，那就是——民主！

然而，进北京后，我们很快就将这个办法遗忘了。最终导致了全民族的大悲剧。

邓小平也是这一遗忘的受害者之一。但他没有简单地将错误归结于毛泽东一人。在反思建国后党的重大失误时，邓小平说，建国后的失误不能都算在毛泽东一人身上，我也有份。当时全国挂七个人的像，其中一个就是我。

对历史教训痛切的反思，使邓小平得以成为书写中国新历史的伟人。

邓小平主张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革；

要改革就得全面改革，即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乃至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改革。

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就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主张。当年的其他几次讲话，进一步强调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经济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入，其孤军独进的窘境越加显现出来。

城市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多少年来搞不活，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而这些问

题绝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政企关系，从企业来说，属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从国家和政府来说，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对此是清楚的，他说：“企业改革，主要是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可以说，企业下放（亦即权力下放），政企分开等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因此，80年代中期，邓小平突出强调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他有些忧虑地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然而，政治体制改革是个敏感而又十分复杂的工程，连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谈及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也显出非同一般的谨慎。

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时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

他又说：“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

显然，在一个有着漫长封建社会历史，又长期受传统模式束缚的大国，进行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政治体制改革，困难确实是很大的，以致于使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也难以决策。

但不改是不行的。

不改革，党和国家机关就没有活力。

不改革，就不能消除官僚主义，提高效率。

不改革，就不能调动民众的积极性。

不改革，就不能用法治代替人治，防止再出现大的失误。

但这里涉及到许多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其中能否正确处理三大关系，决定着政治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成败。

一是党政关系，党在新形势下怎样起领导作用，党政如何分开？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可能出现原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教训，党与政府分开了，但也把党变成一个空架子。但党的组织在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中“管什么”，“怎么管”，即地位和作用问题却是迫切需要搞明白的。否则，现代企业制度能建立起来吗？

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原来是高度集权，中央一杆子插到底，地方缺乏活力。现在搞市场经济，分权势在必行，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分权过程。“市场+政府”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单向的放权是过时的作法。从近年来的实践看，十几年的放权让利政策，使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和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正如江泽民所说，“有的地方和部门过多考虑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部利益，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力，甚至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应当由中央集中的则集中不够，某些方面存在过于分散的现象。”显然，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因此，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明确各自的事权、

财权和决策权是十分必要的。

江泽民强调：“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但这个目的如何去实现，其中还有许多环节需要理顺。

三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是国有资产的代表，但政府不能直接经营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必须分开。怎样探索一个能够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思路和方法，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关系重大的。

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了中国的社会现代化，为了不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也为了人民群众真正能够当家作主，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大体同步。

要冷静，埋头实干，做好自己的事

政治与经济，能分开否？

美国政治家的“世界责任感”与中国国情的碰撞。

四个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1989年东欧国家纷纷改换旗号，社会主义还能坚守阵地吗？

西方大国对中国关上大门，邓小平的“韬晦”策略又把它打开。

邓小平告诫在位的领导人：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做好自己的事。

1989年是个动荡的年头。似乎世纪之交的动荡已提前到来。

1989年使西方政治家忙得不亦乐乎。

美国总统布什欣喜地说：“在过去的一年，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摆脱了共产主义统治，而跨入了民主政体的门槛。”

1989年4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圆桌会议上让步，继而在大选中丢掉了政权。

1989年9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停止活动，拱手交出政权。

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动乱，“七七宪章运动”联合一些组织组成“公民论坛”，从捷共手中夺得政权。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枪毙，救国阵线掌握国家政权。

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国也在剧烈变动之中。

也许是巧合，1989年中国也是风波骤起，搅乱了改革和发展的步伐。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了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美国对中国的状况肯定不满意。它急忙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中断了与中国的高层接触和一些大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试图压中国屈服。

中国没有变，中国没有软，中国也没有乱。这使西方很是惊奇。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专稿说：“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曾认为，中国在‘六四’后，经济有崩溃的危险，因为外国投资会下降，经济改革进程会后退，劳动力大军会感到不满和不合作。”“但这些情况一个也没有发生”。

为什么中国能在1989年处乱不变？

当时，面对严峻的形势，是仍然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是集中力量开展“阶级斗争”？国际国内都在关心中国会不会改变既定路线，会不会倒退回去。

邓小平的意志是坚定的，危难时刻方能显出伟人本色。

他在关键时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冷静地提出了处理问题的方针和策略。

他指出：“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苏联动乱我看也不可避免。”“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

“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搞下去。没有改革

开放就没有希望。”

针对西方国家对华态度，邓小平冷静地指出：“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

他强调：中国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永远不接受别人干涉中国内政。

他告诫：我们绝不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也没有好处。不当头不等于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在多极化的国际关系中，“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邓小平用三句话对当时国际形势作了概括：“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多么科学的分析！多么高明的策略！

国际形势的发展，充分证实了邓小平所提出的这些论断的正确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的“制裁”不攻自破，国内改革和发展稳步推进，中国避免了一次混乱和倒退，中国的稳定发展使世界社会主义前途又充满了希望。

“冷静”、“埋头实干”、“做好自己的事”，这些策略思想对我们处理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是多么重要啊！

在当今世界上，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常常会遇到一些特殊的干扰。这是一般小国不会遇到的。

近一个时期，从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那里传出一种说法：

“中国已是第三经济大国”，“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也可能是军事预算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军队实力正在迅速加强”。

这些说法实际上在宣扬“中国威胁论”。

素有“美国智囊”之称的美国兰德公司提出了一种“新的计算方法”，即“按照同样数量的钱在不同国家所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来计算各国的产值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用这种方法计算，中国大陆 1992 年国民生产总值为 16600 亿美元，人均收入为 1450 美元。这种“新算法”一下把原来“货币汇率折算法”的结果拔高了将近四倍。于是就有人说：中国“国力强大”，中国实际上已经是“第二个超级大国”。

显然，这里面有一些善良人们没有想到的背景。曾几何时，西方一些人还在说“中国人连裤子都穿不起”。两三年后，仍是这些人，却把中国一下捧上了天。

说中国贫穷落后，是要让人们把贫穷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得出“要富裕，只有改变社会制度”的结论。现在说中国如何强大，则是要让人体会到“中国威胁”的严重性。

邓小平早就预见到这种情况，他在 1989 年就指出：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中国就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发达国家的戒心会更大。

的确，西方不愿看到中国的强大，即使仅仅是经济上的较快发展。为此，中国每前进一步，都可能引起他们的某种“恐惧”，从而找出各种借口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干扰。

邓小平的思路十分明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任何力量也不能改变这一点。中国不会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的，在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上绝不能让步。我们谁也不怕，但我们谁也不得罪。

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战略和策略，我们还是要埋头实干，抓紧时间做好自己的事，使中国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真正成为一个世界一流强国。

中国现在还不发达，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有希望进入世界前列，但现在还没有。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保持一定的军事防御能力，理所当然。

要让世界上的人都说中国好，不可能。

要让一些人不再编圈套，也不可能。关键是不能钻进去！

不抓住机遇就要落后

世纪之交的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再也不能放过机遇了。发展慢了，老百姓一比较就要出问题。

“睡狮醒了”，各国政治家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

趁中国人醉心于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时候，亚洲几个国家和地区抓住机遇使自己成为小龙。

邓小平对上海人说：九十年代是你们最后一次机遇，不要放过。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发展的具体部署。

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经济巨头和专家都如是说。

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也向世人昭示了亚洲经济的巨大活力。中国90年代的经济新发展，表明这个东方大国也在迈开大步走向新世纪。这是一幅令人激动的场景。

然而，各国的各类人士对“太平洋新世纪”的内涵有不同的表述，也怀有不同的用心。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它使我们回忆起曾经“痛失良机”的痛感，也让我们充满“又逢机遇”的兴奋。

中国丧失的机会太多了。18世纪西欧开始进入产业革命高潮的时候，中国却沉醉于“天朝盛世”迷梦之中，闭关自守，自我封闭，终致落后而挨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搬走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然而，极左思潮使我们忙于“抓革命”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白白放过了60年代以来的大好发展机遇。

机遇只对珍视它的人存在。从60年代起，在第三次新技术革命潮流的推动下，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抓住机遇，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经过20多年的奋斗，日本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进入了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成为世界关注的亚洲经济发展明星；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曾经十分落后的农业国，也抓住新科技革命中西方调整产业结构的良好机遇，大力发展经济，踏上了追赶亚洲新兴工业群的征程。这些国家和地区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多种类的，但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立足本国、本地区实际，充分利用存利的国际环境，采取灵活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资金，从而创造了让世人惊叹的经济发展奇迹。

亚洲国家的快速发展向中国提出警告：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中国再也不能错失良机了。

中国不会再丧失机遇的。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突出强调：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建设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

从国内情况看，我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经济和社会都有了很大发展，全国政治、社会和人心稳定，具备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7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2%；全社会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9%；粮食总产量达到 4.6 亿多吨，创历史最好水平。

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外关系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也为世界和平和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改革十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群众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了实惠。人民希望改革、人民要求加快发展。

1992 年春天，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说：“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目前完全有条件上得更快一些。”“上海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民心顺，这是中国加快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从国际环境看，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是很多的。

——我国外交工作成绩显著，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也在逐步改善，并正在带动我国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

——西方经济从总体上讲已开始复苏，世界贸易出现增长势头，有利于我国发展国际贸易。

——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竞争更加突出，经济利益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为我们利用矛盾、加快发展提供了机遇。

——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继续进行，为我国吸收外来资金和技术，拓展外贸业务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亚太地区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旺盛势头，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国在亚太地区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这有利于我国的发展。

——我国从 90 年以来的稳定发展，使我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正日益显现出来，对国外工商界（包括西方大企业、知名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美国《幸福》杂志排序的全球 500 家大企业已有 50 多家来中国投资。

机遇是现实存在的。但能否真正抓住机遇取决于自身的条件。也取决于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现实的困难和问题。

加快发展，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面临不少的困难。

基础差，底子薄，人口多，资金缺乏，资源相对不足；经济发展中存在若干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经济效益不好，产业结构不合理，财政赤字大，通货膨胀的压力明显，不合理的分配格局尚未根本改善，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艰巨；国际形势动荡不宁，和平与发展两主题的实现都面临着许多困难，南北贫富差距还在拉大；同时，国际经济竞争也日益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保守主义的抬头也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新的不利因素。

只有清醒认识上述问题和困难，才能客观地把握形势，正确地提出任务，科学地制定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要充分认识到，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既充满希望又非常艰巨的开创性事业，需要有效地调动和发挥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好解决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科学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我国的“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为我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
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
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
实现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统筹全局、求真务实、系统完整 ——邓小平经济谋略的基本思路和特色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战略家，邓小平没有离开政治目的的“经济谋略”。他总是从大局着眼，从战略的高度提出和解决问题。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他总是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他的经济理论是充满活力的，一点也不苍白。

他的理论思维是多向性的，但强有力的内在联系，使其一个个“智慧火花”构筑成严密的科学体系。

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其经济谋略的基本思路可概括为：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

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线。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我国在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在我国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它肩负着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双重任务。

——根据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必须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为了更好地实现“三步走”的战略，必须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三个战略重点，并以重点带动全局。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抓住这个根本。能源和交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薄弱环节，必须集中必要的力量，高质量、高效率地建设一批重点骨干工程，保证能源和交通通讯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为了更好地实现“三步走”的战略，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隔几年使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在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使我国国民经济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为了更好地实现“三步走”的战略，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处理先富、后富和共富的关系时，

要从大局看问题，以防引起社会动荡。重要的是，要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要有开拓的精神，不要去损害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损害了对社会主义事业不利。

——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解放生产力。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经济体制，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这一新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上，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

——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包括对发达国家的开放，也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今国际经济生活一体化趋势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作为后起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必须大胆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全部文明成果，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为我所用，才能加快发展，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应当从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开始突破，逐步形成从沿海到内地的全国范围对外开放的格局。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无论怎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加上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为我们事业的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因此，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对外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加以坚持的基本国策。

——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就越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以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其根本任务和目标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邓小平的经济谋略，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是战略性。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作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袖人物，很难说在他的思想中有离开政治考虑而孤立存在的什么“经济谋略”。在邓小平看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它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关系着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因而现代化建设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的经济谋略，总是从大局着眼、从战略的高度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这一特色，无论从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把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结合起来，还是从建国以来邓小平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提出并主持“全面整顿”，乃至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等等，都得以充分地显示出来。二是务实性。所谓务实性，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现实针对性。邓小平的经济谋略，都是针对实践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来的。二是指可操作性。即邓小平的经济谋略不是空泛的说教、模棱两可的表态，而是针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可以操作并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或解决方案。这一特色，可以说在邓小平革命生涯的全部言论和行动中都一以贯之地充分地体现出来。

三是系统性。邓小平的经济谋略，不是一种支离破碎、杂乱无章、“事务主义”的东西，而是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的体系。从上述关于邓小平经济谋略的基本思路的概括中，我们可以充分地看到邓小平经济谋略的“系统性”这一特色。这一特色，与前述“战略性”相联系，也同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政治家的个性特征和品格密切相关。

四是真理性。邓小平经济谋略的真理性，已经被已有的实践所检验并得到了证明。正是由于邓小平经济谋略的真理性，才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勃勃生机，使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真正走上了一条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民族振兴的道路。

